

忆周总理 1964 年访苏

周总理与松村谦三的三次访华

记周总理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周恩来与曹禹之交

关于斯诺最后一次访华的几件史实

邓小平亲笔填写的一张履历表

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一份鲜为人知的建议书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编

65

总第六十五辑

1998 年 2 月出版

0100404

D239
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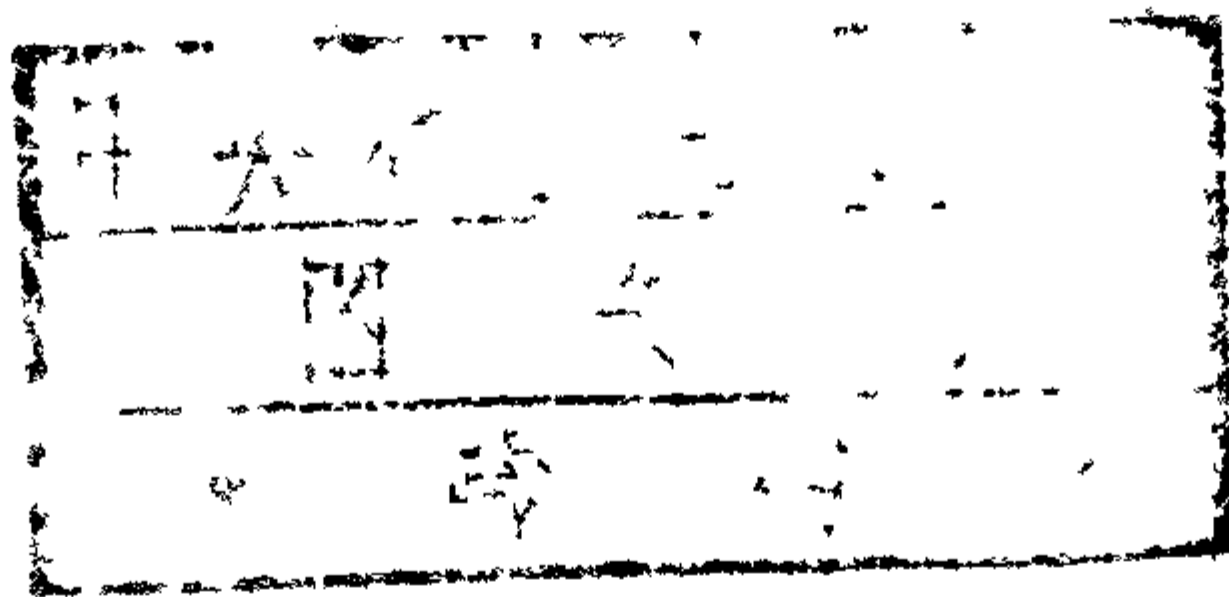


201004046

中共党史资料

第六十五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年·北京

主 编：韩泰华

副主编：杨公之
陈 夕

文献编辑：罗一恒

责任编辑：陈 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党史资料 第65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2

ISBN 7-80136-186-5

I. 中… II. ①中…②中… III. 中国共产党-党史-史料 IV. D2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04306号

中共党史资料(65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 央 档 案 馆 编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1929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35号(北门)

电话：(010)62881570 传真：(010)6288153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朝阳科普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 6.75印张 160千字

1998年2月北京第1版 199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3000册

ISBN 7-80136-186-5/K·161

定 价：8.00元

DH84/3/24

目 录

文献资料

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与朝鲜问题必须区别

- 开来解决 周恩来(1)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 周恩来(3)

回忆录

- 忆周总理 1964 年访苏 阎明复(7)
周总理与松村谦三的三次访华 刘德有(20)
周恩来与中印关系 李达南(38)
记周总理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蒋本良(54)
母亲对周总理的怀念 吴 青(60)

访谈录

在周恩来指导下做地下情报工作

- 访沈安娜、华明之 薛 钰(63)

专题资料

- 周恩来与人民军队的创建 王桢华(76)

- 周恩来与 1946 年的国共谈判 陈 浩(87)
 周恩来的非洲十国之行之行..... 周溢潢(103)

人物介绍

- 周恩来与曹禹之交..... 陈 刚(117)
 周恩来与袁雪芬..... 高义龙(132)

专 稿

- 关于斯诺最后一次访华的几件史实..... 熊向晖(148)
 我的一点补充..... 龚育之(175)

档案译介

- 邓小平亲笔填写的一张履历表..... 薛衔天(178)
 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一份鲜为人知的
 建议书..... 资中筠(181)

译文选登

- 苏中领导人眼中的 1960 年
 [俄]米·尤·普罗祖缅希科夫著 闻 一 译(191)
- 新书选介..... (211)

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与朝鲜 问题必须区别开来解决^①

(1950年7月9日)

周恩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加入联合国各组织问题必须与朝鲜问题先行区别开来解决。联合国各组织只要仍留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在内而拒绝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从而使苏联代表亦不可能出席，则其一切重大决议均将是非法的。这次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六月二十七日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当然是毫无法律效力的，并且是破坏世界和平的。为消除产生这种非法行动的根源，并使安全理事会适当地发挥其职能起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欢迎印度政府对于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加入联合国各组织，特别是加入安全理事会所欲努力的意愿。只有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个常任理事国出席之后，一切合于联合国宪章规定的问题，才能合法地被提出

^① 此件系《对印度大使关于朝鲜问题及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加入联合国各组织问题的谈话的口头答复稿》，周恩来起草，最后一句为毛泽东审阅时所加。

讨论。到那时，和平调处朝鲜问题，制止美国侵略台湾问题，也才有提出解决的可能。在此原则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赞成印度政府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见解。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

周 恩 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共同研究了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于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提出的关于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双方病伤战俘的建议之后，一致认为根据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这一问题完全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关于交换病伤战俘问题的合理解决，对于顺利解决全部战俘问题显然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因之，我们认为，解决全部战俘问题以保证停止朝鲜战争并缔结停战协定的时机，应当说是已经到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致主张，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停战谈判代表应即与联合国军停战谈判代表开始关于在战争期间交换病伤战俘问题的谈判，并进而谋取战俘问题的通盘解决。

过去一年多的朝鲜停战谈判，已经奠定了在朝鲜实现停战的基础。在开城和板门店的谈判中，双方代表除对战俘一项问题外已对所有问题达成协议。首先，对于举世关心的朝鲜停火问题，双方已经同意，“双方司令官命令并保证其控制下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海、空军的一切部队与人

员,完全停止在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此项敌对行为的完全停止自本停战协定签字后十二小时起生效。”(朝鲜停战协定草案第十二款)其次,双方还曾商定各项重要停战条件。在关于确定军事分界线和建立非军事区问题上,双方已经同意,以停战协定生效时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由此线后退二公里,以便在敌对军队之间建立一非军事区……作为缓冲区,以防止发生可能导致敌对行为复发的事件。”(草案第一款)在关于监督停战协定的实施及处理违反停战协定事件的问题上,双方已经同意由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所共同指派的五名高级军官和由联合国军总司令所指派的五名高级军官组成军事停战委员会,负责监督停战协定的实施,包括对于战俘遣返委员会的督导,并协商处理任何违反停战协定的事件(草案第十九、二十、二十四、二十五、五十六各款);双方并同意由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所共同提名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指派两位高级军官作代表和由联合国军总司令所提名的瑞典、瑞士指派两位高级军官作代表组成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并在其下配备由上述各国派出的军官为组员组成中立国视察小组,分驻于北朝鲜的新义州、清津、兴南、满浦、新安州和南朝鲜的仁川、大邱、釜山、江陵、群山各口岸,以监督与视察双方对于停止自朝鲜境外进入增援的军事人员和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与弹药的条款的实施(条款中准许轮换和替换者除外),并得至非军事区以外据报发生违反停战协定事件的地点进行特别观察与视察,以保证军事停战的稳定(草案第三十六、三

十七、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各款)。此外,双方还商定“双方军事司令官兹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的三个月内,分派代表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问题。”(草案第六十款)

如上所述,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只有一个战俘问题阻碍着朝鲜停战的实现。而且就在战俘问题上,除战俘遣返问题外,双方在停战协定草案中对于有关战俘的安排问题的一切条款亦均已达成协议。如非朝鲜停战谈判中断五个多月之久,则这个战俘遣返问题可能早已找出解决的办法来了。

现在联合国军方面既然建议按照日内瓦公约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解决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病伤战俘问题,我们认为,随着病伤战俘问题的合理解决,只要双方都真正具有互相让步以促成朝鲜停战的诚意,全部战俘问题的顺利解决,是完全应当的。

关于战俘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向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只有根据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的规定,特别是该公约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停战后战俘即予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才是合理的解决。但是鉴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是目前达成朝鲜停战的唯一障碍,并且为满足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本着一贯坚持的和平政策,本着一贯努力于迅速实现朝鲜停战,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以维持和巩固世界和平的立场,准备采取步骤来消除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以促成朝鲜停战。为此目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必须指出,我们这一提议,并非放弃了日内瓦公约第一百一十八条关于停战后战俘即予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的原则,也非承认了联合国军方面所说的战俘中有所谓拒绝遣返的人,只由于终止朝鲜流血战争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关系到远东及世界人民的和平与安全问题,所以我们才采取这一新的步骤,准备将在对方恐吓和压迫下心存疑惧,不敢回家的我方被俘人员,提议在停战后转交中立国,并经过有关方面的解释,以保证他们的遣返问题能得到公正解决,而不致因此阻碍朝鲜停战的实现。

我们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结束朝鲜战争所采取的这一新的步骤,完全符合于有自己子弟在朝鲜作战的双方人民的切身利益,也完全符合于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联合国军方面对于谋取和平具有诚意的话,我方这个建议是应该能够被接受的。

一九五三年三月三十日于北京

忆周总理 1964 年访苏

阎 明 复

1964 年 10 月，赫鲁晓夫下台，给日益恶化的中苏关系带来一线希望。中共中央派周总理率领党政代表团访苏，同苏共新领导接触，试探有无改善关系的可能。这是周总理最后一次访问苏联。我当时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随团担任翻译工作。每当回想起那次令人难忘的出访，我总是感慨万端。为纪念周恩来诞辰 100 周年，《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约我写一篇回忆总理的文章。我查阅了一些档案资料，又请教了当年参加翻译工作的王钢华，把零碎的记忆收拢起来，整理成一篇文章，供大家参考。

1963 年 7 月 14 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全面攻击中国共产党，从此中苏之间发生了一场公开论战。到 1964 年，中苏关系继续恶化，这场论战也随之愈演愈烈。在短短 1 年多的时间里，苏联报刊上就发表了 2000 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这年 2 月，苏共还召开了有 6000 人参加的中央全会扩大会议，通过了反华决议；并向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发出信函，号召开展反对中共的运动。中国共产党从 1963 年 9 月开始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连续发表文章，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

信，到1964年10月已发表了九评。

在此期间，苏共一方面连篇累牍地公开发表反华文章，另一方面却又通过信函一次次向中国共产党建议停止公开论战。我们理所当然不能接受这种不平等的“建议”，断然拒绝停止公开反驳苏共对我们的攻击。接着，苏共中央又建议召开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和会议文件的起草委员会会议；中共中央则主张经过充分准备，召开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的国际会议，而决不参加苏共的分裂会议。对此，苏共中央答复，起草委员会一定要在1964年年内召开，12月15日之前就要报到；并表示无论哪个党缺席，委员会也要开始工作。中共中央在答复信中谴责了苏共中央这种破坏协商一致原则的独裁主义，重申绝不参加分裂会议的立场。

在中苏两党的往来信函中，中共中央发给苏共中央的每一件函件除提供了中文正式文本外，还都附了俄文译本。而由苏共中央发来的函件只有俄文正本。那时，无论是把我们的中文正本翻译成俄文，还是把苏联的俄文正本翻译成中文的工作，都是我们中办翻译组承担。随着双方论战的日趋激烈，我们在翻译中也更加小心翼翼，力求准确无误，避免翻译中的用词不当造成“节外生枝”。就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前面提到1964年2月苏共中央给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发出了一封谴责中共的信，这封信并没有发给中共，但很快这封信的内容就被中共中央所获悉。于是，中共中央于1964年2月20日给苏共中央发去一封短信，痛斥“苏共领导一方面装着要团结的样子，叫嚷停止公开争

论，一方面又背着中国共产党策动新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并指出，“你们说攻就攻，叫停就得停，这种惟我独尊、蛮横无理的态度，充分暴露了你们的顽固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恶习。”这封信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起草并经他阅批后发出的。信的最后写道：我们再一次郑重地要求苏共中央把最近给兄弟党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同样发给我们……。翻译中，我和翻译组的几位同事在译“要求”一词时，为如何用俄文表达反复推敲，颇费了一番脑筋。“ТРЕБОВАТЬ”和“ПРОСИТЬ”都是“要求”的意思，前者语气强硬，后者语气谦和，大家对是用前者还是用后者意见不一致。最后是用了“ТРЕБОВАТЬ”这个语气强硬的词。第二天即2月22日，苏共中央很快就答复了。显然，这封信的内容和措词使苏共领导大怒，他们语气尖刻，并特别指出我们居然不是“ПРОСИТЬ”（请求）而是“ТРЕБОВАТЬ”（要求）他们！甚至说“难道有谁会认真地听从你们的腔调，被吓唬住而立刻跑去执行你们的任何要求吗？”“这是根据什么权利呢？”

对这封信，中共中央于2月27日给予了答复。信中除了继续驳斥苏共领导以外，还专门写道，你们说我们犯了一个错误，说我们“要求”你们，而不是“请求”你们把2月12日的信送给我们。在中国文字里，这两个词的习惯用法并没有像你们所说的有那样大的区别；但是，既然你们把这件事看得这样严重，并且成为不能把2月12日的信交给我们的一个理由，那么好吧，现在遵从你们的意思，请求你们把这封信件发给我们，是为至盼。

至于“要求”一词应该怎样用俄文表达为妥，是否由于译成“ТРЕБОВАТЬ”而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留给专家们去考究吧。只是从上述这个小插曲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中苏两党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什么程度。

1964年秋，正值中苏论战进行得难解难分的时候，我们刚发表了“九评”，从苏联方面突然传来了赫鲁晓夫被撤职的消息。10月15日深夜，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受苏共中央委托，紧急约见毛泽东，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受权在住所会见了她。契尔沃年科通报了苏共中央于10月14日召开全会，决定满足赫鲁晓夫因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提出辞去中央第一书记、中央主席团委员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并推选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推荐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消息传来，毛主席连续几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苏联的局势和我们的对策。当时苏联政局还不明朗，赫鲁晓夫下台的真正原因也不清楚。苏联新领导人的对华政策究竟如何也有待澄清。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认为，赫鲁晓夫被撤职毕竟是件好事，我们应该表示欢迎；要做工作，推动苏联的变化，争取扭转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同时，要观察一个时期，而且在国际会议上必要时还要同苏联争一争，该反对的反对，该弃权的弃权。

为此，毛主席、党中央决定采取一系列重大步骤，以便推动中苏关系的改善。

首先，10月16日，根据毛主席的决定，周总理指示外交部草拟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的名义给勃列日

涅夫、米高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柯西金的贺电,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苏共和苏联人民前进的道路上每一个进展都是高兴的;并希望中苏两党两国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这份电报当天就送给了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当晚广播,并于第二天(10月17日)见报。

第二,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派周总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同苏联领导接触;并倡议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派党政代表团去苏联,以便进行接触,交换意见。

根据中央的决定,周总理亲自会见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使节,把中共中央的建议通知他们。10月28日,周总理接见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请他转告苏共中央,中共中央建议派团去祝贺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并同苏联领导同志进行接触。10月29日,周总理再次接见苏联大使,说: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以我为团长的党政代表团去苏联,以便进行接触;并建议苏联邀请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去莫斯科。

考虑到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立场,周总理于10月29日首先接见了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古巴五国的使节,向他们通报了中共中央的倡议,说明这一倡议的目的是寻求团结。当时苏联同阿尔巴尼亚已经断交,所以,周总理还特别向阿尔巴尼亚大使解释中共中央倡议的意图,并分析了可能产生的结果。阿大使说,他将报告阿党中央,但他相信阿中央不会派人去苏联。对此,周总理表示理

解。

10月30日，周总理接见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和民主德国的驻华大使，向他们转达了同样的建议。次日，苏联大使转告周总理，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

第三，中央决定在北京破格扩大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活动的规模。11月5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给苏联领导人发出了节日贺电。11月6日，首都各界举行了庆祝大会。中共中央委员、中苏友协副主席刘宁一在大会上发表讲话。11月7日，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苏联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彭真代表中共中央讲话。即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在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8日的报纸还登载了勃列日涅夫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

11月5日，周总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副团长为贺龙，团员有康生、刘晓、伍修权、潘自力、乔冠华等，顾问有姚臻、王力、余湛等。我和王钢华、邢书钢等作为翻译随团前往。同机前往的还有以范文同为团长的越南党政代表团。

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11月6日，周总理、贺龙副总理等先后会见了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米高扬。周总理表示，我们这次来访，除了参加庆祝活动外，还希望进行接触，交换意见。我们希望这会为今后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出访前，在国内已经准备好了周总理在十月革命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呼吁中苏两党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周总理向勃列日涅夫提出希望能在大会上致

词，勃列日涅夫以大会没有安排外国代表团讲话为托辞婉拒。当天下午，周总理、贺龙副总理和我党政代表团其他同志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庆祝大会，勃列日涅夫作了报告。

11月7日，我代表团在红场观礼。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站在列宁墓的观礼台上和苏联领导人一起检阅阅兵式及群众游行队伍。当时，莫斯科大雪纷飞，天寒地冻。苏联领导人都身穿着厚厚的皮大衣，头戴皮帽子，还时不时地到列宁墓下的休息室喝咖啡、喝酒取暖。周总理穿着单薄，里面是灰色中山装，外边是一件黑色呢大衣，在凛冽的寒风中一站就是3个多小时。我站在他身后，非常担心他的身体，生怕他冻病了。周总理的卫士长高振普拿了厚厚的皮大衣在下面休息室等候。我几次建议总理换上皮大衣，总理都坚持说不冷，不用换。莫斯科市民的游行队伍走过来了，游行的人群看见观礼台上的周总理和贺龙，都高高地举起小旗帜欢呼着向中国代表致敬。

这天晚上，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宴会厅举行酒会。大厅的主席台上放着一张长方形的大餐桌为主宾桌。苏共中央领导和各国代表团的团长沿长桌站着。周总理、贺龙副总理和康生站在主桌旁，我和王钢华、邢书钢分别给他们作翻译。大厅的两边离主桌约10米处，分别摆了很多餐桌。苏联其他党、政、军及社会各界的领导人和各国代表分别站在这些餐桌旁边。主席台左边的第一个餐桌旁站着苏军的高级将领们。周总理、贺龙副总理和他们中间的罗科索夫斯基、崔可夫等都认识。酒会开始后，勃列日

涅夫致词。过了片刻，勃列日涅夫把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找来，把麦克风拉到他身边，让他祝酒。马林诺夫斯基讲话冗长，其中还抨击了美国的政策等等。不少外国记者走到前面来录下了他的讲话。

马林诺夫斯基的祝酒辞结束后，周总理建议贺龙副总理一起去看看苏军的老朋友们。周总理走到苏军将领们的餐桌旁，我紧随在他身后。苏军元帅和将军们看见周总理走过来，纷纷和他握手，十分热情。大家为中苏传统友谊碰杯。

贺龙副总理走到主席台旁，王钢华跟着去作翻译。马林诺夫斯基看见贺龙副总理，一开始就有意挑衅。他说：“我们的元帅服太浮华，我喜欢战士的短袄。我们的元帅服是斯大林胡造的，而你们的是毛（指毛主席，下同）胡造的。”

贺龙说：“你胡说些什么呀，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

说完，他就转身走向周恩来和其他苏军将领们那边去。

马林诺夫斯基跟着走过来，嘴里不住地嚷嚷着，“不要让任何鬼来扰乱我们的关系，不要耍政治魔术，不要让任何毛、任何‘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

我在旁边一边听，一边翻译给周恩来和贺龙副总理。周总理听了大怒，推开马林诺夫斯基，同贺龙一起向勃列日涅夫走去。

马林诺夫斯基仍在后边嚷着，“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而你们要把毛搞掉（УБРАТЬ МАО）”。

我听到前半句，立即翻译给总理听，却没有听清后半句。王钢华听到这句话，正要翻译给总理，我驻苏使馆翻译张大可赶过来，对王钢华讲，潘自力大使要他转告周总理，

在场的美国记者在录音。这样就把后半句漏译了。

这时，有几位苏军元帅大声地说，“我们不同意他的说法！”

而扎哈罗夫元帅则接着说，“每种蔬菜都有自己成熟的时候。”

周总理当即向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提出严正抗议。

勃列日涅夫说，马林诺夫斯基是喝醉了。

周总理说，酒后吐真言么！

总理要求对方道歉。说完，和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退出宴会厅。

代表团来到我驻苏使馆，连夜给中央起草电文，报告发生的严重事件。

为了把事情搞准确，总理还要我们几个翻译到一起，反复核对事情的经过。当我们讨论到扎哈罗夫说的“每种蔬菜都有自己成熟的时候”这句话怎么理解时，王钢华说，他是接着马林诺夫斯基“你们要把毛搞掉”的话说的。这时才发现当时我们漏译了马林诺夫斯基这句话。于是，我们立即向周总理报告了漏译的经过。总理叫我们把整个过程写出来。我和王钢华连夜赶写，并在书面材料上签了字，交给总理和代表团。

返回别墅的时候，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

11月8日，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等到中国代表团住所拜访时，周总理又向他们追问马林诺夫斯基的挑衅事件。周总理说，苏共

欢迎我们来,是不是为了当众向我们挑衅,是不是期待着中国党也撤换毛泽东的领导?周总理指出,西方国家的媒体11月8日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主席。难道这也是偶然的巧合?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中有这种思想,马林诺夫斯基敢这样胡说八道吗?勃列日涅夫等辩解说,他们是事后得知的,感到不安和愤怒。说马林诺夫斯基是酒后胡言,不代表苏共中央;他已经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谴责。现在我们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你们道歉。我们同马林诺夫斯基划清界线,等等。周总理指出,马林诺夫斯基并非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不是简单的个人行动,而是反映了苏联领导人中仍有人继续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

马林诺夫斯基公然提出“推翻毛泽东”,这不仅严重地破坏了中苏关系和缓的可能性,而且对中国国内政局的发展带来了恶劣的影响。

11月9日、11日和12日,周总理、贺龙副总理等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进行了三次会谈。在会谈中,周总理首先提出,希望苏联领导人说明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政治原因。勃列日涅夫敷衍搪塞,拒不正面回答问题,而把话题转到停止公开论战上去。周总理谈到关于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问题,这也是当时我们同赫鲁晓夫争执不下的问题。我们主张推迟召开,赫鲁晓夫则下命令必须在1964年12月15日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1965年5月召开大会。周总理说,我们认为,召开兄弟党会议的条件并未成熟;采用兄弟党协商的办法,通过双边和多边协商,开个团

结的兄弟党的会议是一回事，而坚持赫鲁晓夫下命令召开的分裂的会议是另一回事。重申我们主张开团结的大会，反对开分裂的大会。而且迄今为止，已经有7个党决定不参加12月15日的会，其中包括中国、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越南、印尼、日本等国的党。但是，在这一问题上，勃列日涅夫和苏共其他领导人却仍然坚持要在12月15日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也不讲什么道理，采取了绝不妥协的态度。在激烈辩论中，米高扬终于忍耐不住，脱口而出说：“在同中共的分歧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任何不同，甚至没有任何细微的差别。”周总理说，既然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没有不同，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谈的呢？最后，周总理正式表示了意见：

他说，在赫鲁晓夫被解职，各兄弟党兄弟国家派代表团来苏联祝贺节日的新气氛下，进行接触，了解情况，交换意见，看看是否找到团结反帝的新途径，这就是我们的全盘计划。

现在情况清楚了，既然你们同赫鲁晓夫毫无差别，共同愿望就很难找出来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挑衅使新气氛没有了。我现在正式表示几点意见：

第一，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贺词和我的书面祝辞中所表示的愿望，我们坚持不变。

第二，你们党所设想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即要在12月15日召开的非法会议，我们绝不参加。如果你们要开，你们有你们的自由。不过，我们要奉劝你们，不要走绝路，要悬崖勒马。

第三，在你们继续执行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分歧基本解决前，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

周总理继续说，尽管如此，我们对兄弟党的门还是开着的。按照1960年声明中兄弟党关系准则，创造新的气氛，寻求新的途径来确定共同愿望的办法还是有的，这就需要双方努力。如仍然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这种可能就不存在了。

在莫斯科期间，周总理、贺龙副总理还分别同罗马尼亚、波兰、古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越南的党政代表团多次接触，介绍同苏联领导人会谈的情况。周总理说，“我们这次来，是要了解背景，交换意见。”周总理谈到，“赫鲁晓夫下台是好事，这会使苏联党和政府的政策有一些变化。变化究竟有多大，我们还要观察。”“我们想做一点推动工作，推动他们向好的方面变化。”关于公开论战，周总理谈到，“公开争论是赫鲁晓夫挑起的，并指名侮辱了我们党的领袖。我们现在看不出目前有停止争论的可能。”最后，周总理谈到，“苏联新领导是要在没有赫鲁晓夫的领导下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政策”，“通过这几天的接触，我们发现情况比原来预计的更坏。现在的苏联领导软弱，内部矛盾、混乱、动荡；各方面的压力很大。这是原来没有想到的。”

10月13日，周总理和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在赴机场途中，柯西金对周总理说，我们和赫鲁晓夫还是有所不同，不然为什么要解除他的职务呢。他还提议，举行苏中两党的高级会议。周总理表示，将向中共中央转达苏共中央的

建议。

10月14日，周总理和代表团飞抵北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群众代表数千人到机场热烈欢迎。

事隔多年，直到苏联解体后，苏共中央档案陆续公开。1995年，我在莫斯科看到了1964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上苏斯洛夫作的关于赫鲁晓夫所犯错误的报告速记记录，才知道苏斯洛夫在全会上仍然坚持了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并号召“继续同中共斗争下去”。这就是马林诺夫斯基放肆挑衅的真实背景；这就是米高扬公开表示的“在同中国的分歧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任何细微差别”的含意所在；这就是勃列日涅夫坚持要召开分裂会议的原因所在。回想1964年当时代表团在我驻苏使馆研究情况时，周总理就以他敏锐的洞察力对苏联新的领导班子作出了明确结论：苏联新领导虽然解除了赫鲁晓夫的职务，但是，他们仍要继续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即他们要当老子，别人只能当儿子——继续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政策。历史果然证实了周总理的判断是正确的。

周总理与松村谦三的三次访华

刘 德 有

—

1959年，我正在山西省洪洞县农村下放劳动。9月中旬，突然接到原单位发来的电报，要我立即返京。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连忙赶回北京。返京后才知道，是为了参加建国10周年的外宾接待工作和准备迎接松村谦三一行，为总理做翻译工作。

松村谦三是日本资深政治家，战后曾任农林大臣等职，为当时执政党——自民党顾问。

这次来访是松村先生战后第一次访华。

松村先生选择那个时候访华，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当时的中日关系密不可分的。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关系虽然一直处于不正常状态，但是通过两国人民的努力，1952年6月高良富等三位日本国会议员访华，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签订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之后，中日两国的民间贸易逐步开展起来，呈现出发展的势头。但是，1958年4月长崎发生的日本右翼分子污辱中国国旗的事件，彻底破坏了中日两国间已经出现的友好气氛。这是当时的岸信

介内阁追随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的必然结果。由于“长崎国旗事件”的发生，中日两国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交往渠道几乎全部中断。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从1959年起，日本一些有远见的政界人士忧虑中日关系的现状，开始展开活动，以谋求改善中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1959年9月，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访问中国。10月，松村谦三应周总理的邀请，率团来华。

从中日关系后来的发展看，周总理邀请松村先生在那个时候访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由于当时岸信介内阁表示要“同共产主义对抗到底”，对中国采取所谓“静观”态度，并企图不顾一切地修订日美安全条约，而执政的自民党内有些人也感到困惑，认为松村访问中国是一种冒险行为，表现十分冷淡，因此松村谦三的访华显然不可能有太大的动作，他只能采取一般友好访问的形式。尽管日本各阶层人民对松村一行的访华寄予了较高的期望，但松村本人仅仅希望通过他的访问，向中方说明日本的立场，并摸一摸中国的底，以便找到打开中日关系僵局的某种契机，而根本没有打算同中国发表“共同声明”或“协议”之类的文件。

中国方面对于松村先生的访问是十分重视的。在代表团到达北京的第3天——10月21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上海厅举行了欢迎酒会。中国方面的重视程度，可以从出席这次酒会的人士囊括了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中国政界、经济界、文化界、卫生界、新闻界等各方面代表人物这一点，窥见一斑。我看到当时在场的有：郭沫若、廖承志、刘宁一、

张奚若、蔡廷锴、王震、章汉夫、雷任民、胡愈之、李烛尘、楚图南、许广平、王昆仑、侯德榜、阳翰笙、连贯、吴克坚、刘西元、赵朴初、杨煜、欧阳予倩、梅兰芳、吴茂荪、周培源、谢冰心、谢南光、区棠亮、林士笑、萧方洲、丁拓等人。

日本客人进入上海厅时，周总理站在大厅门口亲自迎接。孙平化向周总理一一作了介绍。除了松村谦三外，日方代表团的成员还有：自民党国会议员竹山祐太郎、井出一太郎、古井喜实，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常务董事田林政吉，松村谦三的二女儿小堀治子、四子平山久雄、秘书田川诚一，翻译大久保任晴。我记得还有一位是善邻通商公司的高级职员堀池友治。

那天晚上虽然举行的是欢迎酒会，但采取的是宴会形式。周总理首先站起来讲话，他没有拿讲话稿。由于我下放在山西劳动，好久没有为周总理作过翻译，难免有些紧张。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周总理说：松村谦三先生是继石桥湛山先生之后到中国来访问的。松村先生同石桥先生一样，都主张中日两国人民应该携起手来，共同为远东和世界和平，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而努力。我们希望松村先生这次到中国来能多停留一些时间，多同中国各方面的朋友谈一谈，多到各个地方去看一看，这样就可以更好地了解新中国，从而更有助于我们两国人民为远东和世界和平作出自己的贡献。

松村谦三致答词，他也没有拿讲稿，即兴讲了30分钟。松村首先感谢周总理为他举行盛大的欢迎酒会。他说：“我们能同周总理和中国各方面有影响的人士见面并交换意

见，感到非常荣幸。几年来，我一直希望访问中国并同周总理进行直接的交谈，现在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我感到非常高兴。”接着，松村强调说：“日中两国之间过去不幸发生了许多问题，这使我们深为遗憾。今天，我可以这样说，日本没有一个人愿意再重复过去的错误。日本国民希望走和平的道路，日本应当在和平的环境中随着亚洲的繁荣而生存下去。我愿意代表日本国民表达这种愿望，日本应当竭尽全力赶上世界和平的潮流。”

松村谦三赞扬新中国的发展。他说：“中国人民规模宏大的建设，以及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族振兴，是历史奇迹。在和平环境下，如果这一宏伟的建设能持续二十年、三十年，那么毫无疑问，它将改变世界的历史，这将有助于亚洲人民的自由与世界和平。”

松村还表示，他这次访华抱有多种目的。首先希望能同中国各方面人士交换意见；其次要看一看新中国的巨大建设，看一看中国的古代文物。他说，作为一个老汉学家，希望游览名山大川；作为一个曾经多年做过农业工作和教育工作的人，还希望了解中国的农业和文化教育工作。“一句话，我的最大目的是，通过这次访问，希望能够达到双方真正的理解和亲善。”

松村谦三访华期间，周总理同他进行了4次会谈。这些会谈，有的采取了会见全团的形式，有的则是“一对一”的单独会谈。每次会谈时间都很长，有时竟谈到深夜。我印象最深的是10月25日那次在前往密云水库建设工地参观的列车上进行的单独会谈。这趟专列从北京出发时就挂有一辆

公务车。列车启动后不久，我陪同松村先生来到这辆车厢。车厢内布置得像一间客厅，秋日柔和的阳光透过车窗射进来，显得明亮、温馨。我看到周总理已经等候在那里。根据双方约定，中方陪同人员只有廖承志，而日方没有安排陪见人。这是一次利用列车往复4个小时的时间在车中进行的别开生面的会谈，日方后来把这次会谈称为“车中会谈”。

4次会谈的中心，是如何改善中日关系。总的来说，会谈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但在原则问题上也各不相让。在会谈中，双方谈到的主要问题有：

(1)关于中日关系。周总理说，中日两国人民不仅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谋求改善两国关系，而且要逐步恢复两国的正常关系，实现互不侵犯。在中日两国恢复了正常关系之后，可以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而且可以把互不侵犯条约的范围扩大到远东、整个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周总理强烈谴责了岸信介内阁当时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指出日本有一小撮人包括执政的一些人，敌视中国，参与制造“两个中国”，阻挠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松村谦三表示赞同周总理对中日关系的总的看法，并认为“完全是正确的”。他说，日中两国有两千年的友好传统，两国人民不应当处于现在这样的不幸状态。我们应当使这种友谊恢复正常。他还说，现在世界吹着和平的风，我们愿意同中国一道为世界和平做最大的努力。但是，松村又极力为岸信介进行辩护，说他没有敌视中国；另一方面松村又说周总理指出的那些情况是一定会改变的。针对这一情况，周总理说：“即使松村先生等友好人士对中国再表示理解，

再表示友好，那也是代表个人。而岸信介是日本的总理大臣，一国的负责人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情况就不同了。”

(2)关于日美安全条约。周总理严正指出，岸信介内阁修改日美安全条约将使美国继续在日本保留侵略亚洲各国的军事基地，因此，修改日美安全条约不仅是日本国内的问题，也是国际问题。周总理说，战后日本处于半被占领状态，建立了外国军事基地，并受到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这是不幸的。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不幸表示同情。现在，日本人民要求摆脱这样一种束缚，反对修改并要求废除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日益高涨。中国人民同情并支持日本人民的这一斗争，因为中国人民担心在美帝国主义统治下，日本有可能进一步成为美国的军事同盟，进而复活军国主义。然而，松村却说，修改日美安全条约是为了把“不平等条约改为平等条约”，并不像中国所想象的那么严重。松村搬出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说什么“中国缔结这一条约也不是真心要同日本打仗。修改日美安全条约也跟这相类似，只要和平共处的动向和新的和平运动发展了，日美安全条约即使存在，也会变成一纸死文。”

(3)关于台湾问题。周总理指出日本确有一小撮人企图染指中国领土台湾，中国反对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反对搞“台湾独立”。周总理还举例说，日本前军人冈村宁次和辻政信被请到台湾去指导“反攻大陆”，并说我们对于这一动向不能不提高警惕。

松村则极力回避问题的实质，说台湾是日本因战败而放弃的，怎样处理台湾问题，应由获得的一方自己去解决，

而不要向日方提出。

(4)关于所谓“政经分离”的问题。日方在谋求改善日中关系时,作为第一步,想恢复贸易,但生怕涉及废除日蒋条约这一尖锐的政治问题,因此极力主张把政治和经济加以分开。周总理针对日方提出的这一论点指出,在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中,有可能随着中日关系的改善,使一度中断的中日贸易关系得到恢复,两国的文化交流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必须促进这一关系的发展,这就是政治,有人把政治和经济分割开来,这是奇谈怪论。我们邀请松村先生到中国来访问,这也是政治,因为人与人的关系,本来就是政治的关系。

(5)松村先生向周总理推荐了曾任鸠山内阁经济企划厅长官的高碕达之助。高碕曾担任过伪“满洲重工业开发公司”总裁和日本人经营的鞍山“昭和制钢所”董事长。日本投降后,为国民党留用。中国共产党接管后他又被留用一段。回日本后被整肃,1951年解除整肃,1952年出任日本电源开发公司总裁,后进入政界。1955年4月万隆会议时,高碕是日方代表团成员之一,曾会见过周总理。松村在这次会谈中向周总理说,今后他本人将侧重政治,而高碕则侧重经济,共同为推动日中关系而努力。在松村访华的翌年7月19日,岸信介内阁倒台,池田内阁成立。新内阁的政策趋向使人们看到日中关系松动的一线希望。在这种形势下,高碕于同年10月率领日本实业界人士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

我感到,松村先生的首次访华,无论从中方或日方来

说,都是表明自己立场、了解对方意图、增进相互理解的一次重要机会,并借以探索打开中日关系僵局、谋求改善中日关系的可能性。

松村结束访华时,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既未发表公报,也未发表纪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会谈没有取得成果,而是双方有意识这样安排的。有人曾经引用白居易的诗句说“此时无声胜有声”,我认为这是很恰当的。松村先生的这次访华,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为后来签署廖(承志)、高(碯)贸易协议和互换记者协议,使中日关系一举从民间往来向半官半民阶段过渡奠定了基础。

二

应周总理的邀请,松村谦三第二次访华是在1962年9月。中日双方讨论的中心问题,仍然是政治问题。日方的底牌是,谋求日中贸易进一步发展,但经济要同政治分开,即坚持所谓的“政经分离”的方针,以回避接触中日关系的根本问题。这就不可避免地酝酿一场斗争。

中国方面对松村的第二次访华,同第一次一样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代表团一行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即9月15日晚,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举行了欢迎宴会。周总理即兴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说,松村谦三先生踏上中国国土的时候,正是中国的中秋佳节,因此愿以中国的一句话“花好、月圆、人寿”欢迎松村先生一行。周总理说,中日两国人民应该友好相处,而且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他赞扬松村先生不仅努

力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而且愿意为两国人民后代的友好打下基础。周总理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得远一些,对于松村先生的这次访问,我们不仅应该看到今天,还要看到明天。

听了周总理这一席话,松村谦三很高兴。他向周总理打了个招呼,便起来讲话。由于他没有讲稿,我只好即兴翻译。我注意听他讲的每一句话,他的话里充满着感激之情。他说:“我们这一次到中国的第一天,适逢中国的中秋节日,我们很高兴能赶上这样一个吉祥的日子。刚才周恩来总理讲了‘花好、月圆、人寿’的热情话,我也希望日中两国的关系永远能够像中秋明月那样圆满和明亮。”松村强调说,我这次来中国访问,就是要和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交换意见,以便为改变目前日中两国的这种局面和促进两国的亲善关系奠定基础。他说,我们在东方的两个兄弟国家应该建立起真正的兄弟关系。

在松村这次访华期间,周总理同他进行了3次会谈。9月16日下午举行的第一次会谈历时3个小时,周总理在会谈中阐明了中国的原则立场。他针对日方坚持的“政经分离”的观点说,政治和经济是不可分离的,在谈经济问题之前,必须先谈政治问题,并强调指出中国一贯主张的“中日关系三原则”(“长崎国旗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于1958年提出恢复中日交往的政治三原则,即1、日本政府不能敌视中国;2、不能追随美国搞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3、不要阻碍中日关系朝着正常化方向逐步发展)是不变的。周总理还指出,日本在联合国继续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池田内阁的

做法跟岸信介内阁没有两样。

松村先生极力说明池田内阁不同于岸信介内阁，它对中国采取的是向前看的态度。松村说，这次他到中国来访问，也得到了池田首相的同意。松村还为日本政府的立场进行辩护，说日本并没有对中国实行敌视政策，日本之所以实行那样的政策，是由于它属于“自由主义”阵营的缘故。

9月17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从下午4时一直进行到晚8时。会谈中间，服务员还送来了一次点心。连续4个小时的会谈，对于上了年纪的松村先生来说，确实是很不易的。

这次会谈，日方原先的设想是政治问题已在第一次会谈中谈过，这次则专门谈经济问题。但周总理一开头便严正指出，昨天日本广播协会(NHK)的一条消息，说什么中日双方在第一次会谈中就“政经分离”达成了协议，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中国方面主张政治、经济不可分离这一点丝毫没有变化。于是，周总理又就中国提出的政治三原则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特别是花了很长时间谈了如何处理日本同台湾的关系，并耐心阐明中国反对制造“两个中国”和搞“台湾独立”的原则立场。

这次会谈有一点是极为重要的，那就是周总理就当时的中日关系提出了完整的观点和表述：

中日两国关系应建立在前述政治三原则基础之上，两国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既要能结合起来发展，也要能平行发展，而且这两方面要能够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而不是相反。中日两国首先是两国人民可以采取渐进的积累方式把

两国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发展起来，以利于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我认为，周总理的这一表述，是坚定的原则性与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典范。它既坚持了中国一贯的主张和原则立场，又照顾到日本的处境，充满着辩证法。例如：1、中国坚持了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的原则，但同时又说“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既要能结合起来发展，也要能平行发展”，并指出这两者要“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而不是相反”。2、日方在会谈中一直提出要实行“积累方式”发展中日关系，对此，周总理说，你们叫“积累方式”，我们叫“渐进方式”，意思是一样的。周总理在上述完整的表述中，把日方的说法也吸收进来。3、周总理强调双方要通过“积累方式”即“渐进方式”把政治和经济这两方面的关系发展起来，“以利于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这样，周总理就把中日双方努力的方向，即应达到的目标——“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点明了，把问题的核心说得一清二楚。

在这次会谈中还有一个插曲，那就是松村先生总想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中国方面完全同意了日方的主张。对此，周总理明确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人，松村先生是日本自由民主党的成员，我们对问题的看法怎能都一致呢？不一致是自然的，不可能全都一致。在这个前提下，中日两国实行和平共处，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我们是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松村先生在会谈中还表示担心中国强大后会成为威胁。他说，“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在日本有人看到中国

人口多,担心“黄祸””。周总理针对“黄祸”论说,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说这种话的人是欧洲人,而不是亚洲人。在几百年前,当时的蒙古军队曾经侵略过日本,那是历史上的事情,但是侵略军不是失败了吗?侵略者是不会成功的。日本军国主义从1894年到1945年侵略了中国,但最后也失败了。在亚洲,历史上的蒙古军和日本军国主义都失败了,我们怎么会去侵略日本呢!中国深受帝国主义的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黄祸”这种说法,是欧洲人为了破坏亚洲的团结所讲的。

政治问题谈过之后,进入了经济问题,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在当时已有的友好贸易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中日贸易。经过讨论,双方确定了几条原则:“以货易货”;“综合贸易”;“延期付款”;“长期合同”(为期5年)。

在这次会谈中,双方商定对于上述原则事项,由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协商解决。这就是后来在发展中日关系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廖、高碕备忘录贸易”的起源。

9月19日下午,预定举行第三次会谈。会谈前一天晚上,我们把中方根据第二次会谈的情况草拟的会谈纪要译成日文。19日上午,由孙平化把这份纪要送给日方,征求意见。

会谈纪要的内容大体如下:

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同松村谦三先生进行了友好而坦率的会谈,双方确认:

- 一、中国方面重申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继续有效。
- 二、中日两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必须遵守相互尊重

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三、恢复中日邦交，发展两国的经济、文化关系，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双方应采取渐进方式和积累方式，促进这一愿望的实现。政治和经济是不可分的，两国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既要能结合起来发展，也要能平行发展。双方要通过渐进方式和积累方式在发展政治关系的同时，发展经济关系。这两者的关系要相互促进而不是相反。

四、根据中日两国人民增进友好合作的愿望，在目前情况下，中日贸易除了继续以民间的个别贸易和中小额贸易这两种形式进行外，还可以考虑采取以货易货、延期付款、综合贸易、签订长期合同等方式来发展贸易。

这里，把上面出现的“中日贸易三原则”做一简要说明。池田内阁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于1960年8月为改善被岸信介内阁破坏的中日贸易关系提出了三项原则：1、缔结政府间协定；2、在缔结这一协定前，只要双方表示友好，可以签订民间合同；3、对有特别困难的日本中小企业在贸易中可个别照顾。周总理还强调指出，中日贸易三原则必须和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相联系。

尽管中方的上述方案反映了双方会谈的实际情况，同时也把周总理的完整表述包括了进去，但日方没有同意发表这一方案。因为松村谦三担心会被外界误解为这是中日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同时也担心对外造成日方已接受中方提出的“政经不可分”的主张。日方认为文字表述越简要

越好。后来，几经周折，日方提出了一个对案：

一、中国方面重申坚持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并表示政治和经济是不可分的，而且这一切都继续有效。

二、双方表示进一步促进贸易发展的愿望。双方一致同意采取渐进的和积累的方式谋求两国关系包括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在内的正常化。

日方提出这一对案后，心里一直不托底，生怕中国方面不接受。但是，当天下午4时前，日方接到了中方的通知：4时半周总理会见松村先生一行。这样，日方才松了一口气，判断中国方面基本上同意了日方的对案。

会谈准时开始，寒暄过后，松村先生首先感谢廖承志为起草会谈的“文字表述”所做的努力，并说“下一步，我建议请高碯先生来中国谈具体问题”。于是，周总理指着廖承志说，“廖承志和松村先生是中日双方的总联络人，因此这是他应该做的事”。

松村说：“这么说，我们二人今天是做了第一项工作了？”

周总理说：“这项工作已经取得了成功。会谈的内容双方将用口头发表，但是为了不引起误解，我同意整理出文字的表述，长短可以不拘。我同意这个‘文字表述’供双方口头发表用。”接着，周总理宣读了这个“文字表述”：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同松村谦三先生于十六日、十七日、十九日进行了友好、坦率的会谈。

中国方面重申坚持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并且认为这些原则继续有效。

双方表示进一步促进和发展贸易的愿望。

双方一致认为，应该采取渐进的和积累的方式，谋求两国关系包括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在内的正常化。”

这一文字表述是双方妥协的产物，它照顾了中日双方的具体情况，既体现了中国方面最起码的要求，又体现了日方能够承受的最大限度。由廖承志出面同日方多次磋商“文字表述”的工作和文字的表述内容等，都是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然而，松村听周总理宣读后仍担心这个“文字表述”会成为“联合声明”，便再一次叮嘱这是用于口头发表的。周总理明确地说，这不是“联合声明”。

会谈后，中日双方的新闻媒介都把这一“文字表述”作为“消息”予以公布。

当晚，松村谦三在民族文化宫举行答谢宴会。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约 100 人应邀出席。

松村谦三说，我认为这次访问是有意义的，并指出他同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举行的会谈，为中日两国亲善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他说，我们这次应邀访华可以说不虚此行，我们将怀着很大的喜悦满意地返回祖国。

周总理在宴会上即席讲话。他在讲话中又把中方在第一次方案中提出的关于中日关系的全面观点作了完整的阐述。

我想，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样就使人们对中国的主张以及会谈中涉及的核心问题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周总理在阐述了全面观点以后，说“在这个意义上说，松村谦三先生及其一行来中国访问，是作出了贡献的，我们

对此表示欢迎，表示支持”。周总理祝松村先生在今后的努力中，能够使中日两国人民的往来更加密切，使中日两国的关系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

经过双方的努力，如同松村所说的那样，他的第二次访华为后来的中日关系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就在松村访华后不久，1962年10月26日高碕达之助率领的一个包括22家大厂商代表共42人的大型代表团到北京。双方根据周总理和松村会谈确定的原则，就扩大中日长期贸易问题进行了具体商谈。贸易会谈很快达成一致，1962年11月9日廖承志与高碕达之助在北京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双方达成了一项为期5年（1963—1967）的长期贸易协议，并商定关于协议的具体执行每年要洽谈一次。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根据周总理、松村政治会谈所确定的原则，双方还一致确认，商业合同由日本厂商同中国有关贸易公司签订，两国政府予以保证。中国从日本进口成套设备，延期付款，卖方使用日本输出入银行的资金。这是中日贸易中从日本引进新技术、进口成套设备的开端。这些具体成果表明，经过双方共同努力，向贸易正常化、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又前进了一步。周总理对此曾给予较高的评价，他认为备忘录贸易的协议，已接近于中国提出的贸易三原则的第一项了，即政府间协定。总之，高碕一行这次来华，促成了备忘录贸易的诞生。中方成立廖承志办事处，负责处理备忘录贸易诸项事宜。日方成立“日中综合贸易联络协议会”事务所，叫“高碕办事处”。就这样，“廖(liao)、高碕(Takasaki)备忘录贸易”即取其字头的“LT贸易”正式问世。

三

周总理邀请松村谦三第三次访华,是在1964年4月。通过这次访华,中日关系从民间往来向半官半民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这次松村访华的背景是这样的:1963年当LT贸易进口总额达到1亿美元时,双方开始议论应该在北京、东京互设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从而互派代表常驻对方国家,以便加强联系,推动工作。与此同时,中日双方都深感为了增进相互了解,有必要互换记者,并且开始了这一方面的酝酿。就在中国关系日趋好转并不断向新阶段迈进时,松村再次率团访问了中国,他这次访华也得到了池田首相的支持。

当时,中日之间尚未通航,一般往来都要经过香港。但是,松村谦三不愿意绕道香港,他想直接从日本到北京来。因此,松村一行乘轮船“玄海丸”从门司启航到秦皇岛。

松村抵北京后,4月13日和18日,周总理同他共进行了长达5个多小时的会谈。周总理在解释中国的独立自主立场时说:如果不坚决贯彻独立自主的立场,就会成为从属国家。我们坚持独立自主并不排斥国际合作。不必担心中国独立气概太盛。周总理强调说,我们赞成用积累的方式改进中日关系,为建立中日邦交而努力。松村也介绍了池田政府的台湾政策。松村还同廖承志就互设LT贸易办事处和交换记者问题交换意见,并圆满地达成了协议。4月20日,廖承志与冈崎嘉平太在北京互换了《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

办事处关于互派代表并互设联络事务所会谈纪要》。《纪要》规定，中方在日本设立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日方在中国设立高碕事务所驻北京联络事务所，双方各派首席代表1人，代表2人，随员2人，共5人。

与此同时，廖承志和松村谦三还互换了《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办事处关于中日双方互换新闻记者的会谈纪要》。《纪要》规定，双方各派出通讯社、报纸、电视台记者8人（后改为9人）常驻，交换记者的具体事宜均由双方联络处负责办理。

中日双方互设办事处和互换记者，是中日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即从民间往来到半官半民阶段的重要标志。

池田内阁当时在美国、台湾和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反对的情况下迈出这一步实属不易。这件事本身表明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已经开始分化。日本政府之所以能迈出这一步，固然与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分不开，但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对日方针、政策的正确，特别是周总理高超的外交艺术，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当然，这也是日本广大人民和有识之士长期努力的结果，其中包含着松村谦三的政治远见和为此所付出的心血。周总理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准确地把握和分析形势，发挥主导性，抓住时机，成功地把中日关系一步一步从民间往来推向半官半民阶段，从而为后来中日关系的全面正常化奠定了重要基础。周总理的这一丰功伟绩将永垂史册。

周恩来与中印关系

李达南

我自1949年10月进入外交部亚洲司工作后，一直分管南亚地区事务，特别是印度，直到1979年从驻印度使馆调回国，前后整整30年。印度是与我毗邻的大国。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是同中国进行建交谈判的第一个国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在50年代，两国关系十分友好，是当时我国对外工作重点之一。印度是周恩来总理出访的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尼赫鲁总理也是第一位来华访问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虽然1959年至1962年间因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两国关系有过一段曲折，但到70年代终又得到改善，恢复友好。在中印关系的发展中，周总理积极维护中印友好，对印度以团结争取为主，对其某些消极面采取适当批评和斗争，有理、有利、有节，正确处理了两国关系，其贡献是巨大和突出的。

通过印度 警告美国

1950年4月1日中印正式建交后，印度政府很快提出了首任驻华大使的人选，征求我国同意。他就是印度原驻国

民党政府的大使 K·M·潘尼迦先生。潘尼迦先生是位学者，深得尼赫鲁总理的赏识。我把他的简历和政治态度写了个材料，供部务会议讨论时参考。乔冠华代司长（政务院正式任命的亚洲司司长沈端先即夏衍一直未上任）后来告诉我说，总理看后认为情况基本清楚，决定同意印方任命。潘尼迦大使上任后，总理指示要多做他的工作，后来外交部根据他的爱好，同意并安排他去敦煌和麦积山等地参观，使他对中国产生好感，后来他在促进中印关系上起过良好的作用。

在积极争取印度等民族主义国家上，周总理在政策思想上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1952年4月召开第一次驻外使节会议时，驻印度大使袁仲贤等一些驻外使节认为，印度等东南亚国家（当时把南亚也算在东南亚范围），形式上虽独立了，而实质上还是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总理当即提出这种看法是不切合实际的。他说：这些国家过去虽然是殖民地，而现在政治上已独立了，有自己的国会和政府，由当地资产阶级来统治，怎么还能说他们是殖民地呢。只有由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才是殖民地。东南亚国家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同帝国主义有矛盾，我们要积极争取它们，使它们保持和平中立。50年代中期，在张闻天常务副部长的主持下，外交部曾根据总理这一思想，制定了《对东南亚民族主义国家的方针和政策》等文件。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进行武装干涉，在仁川登陆并加速向北推进，威胁到我国安全。中国决定通过外交途径向美国提出警告。由于当时中美没有外交关系，就

通过印度传话。10月3日凌晨1时，周总理紧急约见印度大使潘尼迦，亚洲司副司长陈家康前往印度大使官邸陪同潘尼迦直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要印度传话的主要内容是：“美军如越过三八线，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而其中关键字是一个“管”。这个中文字眼不大好翻译，用词轻了，美方可能不清楚我方的意图。所以总理事先要译员即他的外事秘书浦寿昌斟酌，要译得恰当。浦寿昌采用了“intervene”一词，也就是说中国要介入和干预，这样把我方意图说得很清楚。总理在同印度大使的谈话中还说：“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问题地方化，也就是不使美军的侵略行动扩大成为世界性的事件”。这个谈话内容很快由印度传到美国，美方竟采取无视的态度，美军悍然于10月7日越过三八线。杜鲁门总统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说：“潘尼迦大使不是公正的观察家，他的话充其量不过是共产党的传声筒。”

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印度政府令人遗憾地采取了反对和阻挠的态度。中国政府为了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正申明：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的干涉都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力谋同印度保持友好关系，恳切地表示，中印在西藏的外交、商业和文化关系，可以循着正常的外交途径获得适当的互利的解决。这一年年底，17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移住到亚东，准备逃往印度。

1951年3月21日，周总理约见潘尼迦大使，指出：“达赖已在亚东，希望他不要离开西藏，这样对他是有好处的。我们尊重西藏宗教自由，同意达赖作为西藏的宗教、政治领袖来进行谈判。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如果达赖不走，经过谈判解决，解放军可以和平进入西藏，达赖的地位仍然可以保持。如此，中印关系亦可增进进一步。如达赖去了印度，就会在中印关系上造成一种阴影，因此，印度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对西藏和平解放是有影响的。”后来印方答复中国外交部：印度不鼓励达赖离开西藏，可劝告他不去印度，如果他决定要去，将按国际惯例给予避难。5月23日，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达赖也在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的劝说下，从亚东回到了拉萨。

但中国和印度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尚需经过谈判解决。1952年6月14日，周总理向潘尼迦大使指出：“中国同印度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的现存情况，是英国过去侵略中国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对于这一切，新的印度政府是没有责任的。英国政府与旧中国基于不平等条约而产生的特权，现在已不复存在了。因此，新中国与新的印度政府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要通过协商重新建立起来”。经过双方商量，中印谈判终于在1953年12月31日在北京举行。那一天周总理在西花厅接见了中印双方政府代表团的全体成员。中方首席代表是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印方首席代表是第二任驻华大使赖嘉文。译员是外交部情报司即今新闻司的陈辉。在这次会见中，周总理提出了后来举世闻名的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中印间）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印方同意以此五项原则作为指导谈判的原则。1954年元旦，周总理也不休息，以他自己的名义向中央写了中印谈判方案的请示报告，其中一一列出上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提出谈判要先易后难的方针，这次只谈判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谈边界问题，以便谈判容易达成协议。印度在西藏所沿袭的各种特权应该取消，但便于贸易和朝圣的惯例，凡不损及中国主权的，可以适当保留。谈判方案得到中央批准。经过双方4个月的谈判，终于在4月29日达成协议，签署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和换文。协定在序言中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

访问印度和争取达赖

1954年6月，周总理利用日内瓦会议代表团团长休会的空隙访问了印度，受到印方隆重接待和数10万群众的热列欢迎。印方提供了一份有100多部影片的名单，请周总理挑选欣赏。周总理只挑了《詹西女皇》这一部反映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的爱国影片，以表达对这位女英雄的敬意。两国总理在联合声明中共同倡议：“不仅在中印关系中，而且在一般国际关系中，都适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度共产

党机关报《新世纪》周刊以整个版面刊登了周总理在印度名胜泰姬陵前，面带笑容，脖子上挂满花环向欢迎群众双手合十致意的巨幅照片。一时印度掀起中印友好的热潮，到处响起“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中人民是兄弟）和“潘查希拉舍德巴”（五项原则万岁）的欢呼声。

同年10月，尼赫鲁总理来华进行长达12天的正式访问。周总理对这次访问十分重视，亲自作了周密安排。他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凡是同接待工作有关的人士都请到了，礼堂挤得满满的。周总理详细地谈了尼赫鲁总理这次来访的意义，我们的接待方针和注意事项。总的精神是要热情友好，同时要实事求是。整个讲话进行了近两个小时。在访问期间，毛泽东主席同尼赫鲁总理进行了四次谈话，两国总理会谈多次。凡是尼赫鲁要见的各方面人士都进行了安排。尼赫鲁来访前总理点名要外交部的乔冠华和陈家康两人起草他在欢迎宴会上的讲话稿，两人逐句口授，由我笔录。讲话稿对尼赫鲁总理作了高度评价，称他为印度杰出的政治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39年8月尼赫鲁曾作为国大党领袖到中国重庆进行10天友好访问）。这次访问对增进中印高层领导人相互了解起着了良好的作用。

1956年11月至12月，周总理应邀第二次访问印度，受到同样隆重热烈的接待和欢迎。但这时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的阴影已经初露端倪。在火车上，周总理告诉尼赫鲁，中缅将谈判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并诚恳地说明中国政府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的态度。关于中印东段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周总理说，这条界线是非法的，是从来没

有为历届中国政府所承认的。尽管如此,为了保证边境的安宁和照顾到两国的友好关系,中国军政人员将严格不越过此线,并表示希望以后能找出解决东段边界的适当办法。然而尼赫鲁对中印边界却始终采取不容讨论的态度。当时达赖和班禅也在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 2500 周年纪念活动。一些逃亡印度的西藏反动分子企图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噶伦堡组织请愿,留阻达赖,不让他回西藏。12 月底,正在访印的周总理对此同尼赫鲁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要尼赫鲁注意这一情况。尼赫鲁表示将注意防止发生乱子,如发生他要采取措施禁止。周总理立即向达赖传达了他同尼赫鲁总理的谈话,然后又会见达赖的随行人员,严正指出:达赖可以留在印度,但西藏不可能搬来印度。把达赖留在印度的想法,是害了达赖,也是害了西藏。如把达赖留下来,西藏的工作不会因此而停止。但大门是开着的,达赖什么时候回西藏都欢迎。达赖一旦留居噶伦堡,只不过是一个难民,没有了政治地位,也不能进行政治活动,只有宗教,而宗教圣地总还是在西藏,不能搬到噶伦堡来。这样,就逐渐把达赖放在一个极端困难的处境上。尼赫鲁总理已经表示印度不能支持西藏搞独立,美国离得太远,要支持西藏独立也搞不成。

经过周总理严肃而耐心的工作,达赖的情绪才稳定下来。他对我驻印度大使潘自力说:“这次出来自己没有拿定主意,是一大缺点。许多人要他留在印度不回去,讲了许多西康的混乱情况,自己曾经发生动摇。自从同周恩来总理谈话后,思想稳定了。中央完全信任他,是否回藏由自己作出

决定。但此次出访,若在印度出了乱子,印度也负不起责任”。达赖还对周总理说,“过去藏印间在宗教、文化上联系较密切,而这次来,感到印度方面对他拉的力量很大。”另外,据随同达赖出访的阿沛·阿旺晋美私下告诉周总理,达赖曾向其随行人员传达他同尼赫鲁单独会见的情况,尼赫鲁对达赖说,西藏同中国政府签订协议后,应该承认西藏属于中国,但如果中国方面的措施超出了协议(按指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 17 条协议)的范围,而使西藏方面有困难时,印度政府可以给予帮助等等。由于周总理及时亲自做工作,不但阻止了达赖第二次背叛祖国流亡印度的企图,也使中印关系不致因此而蒙上阴影。

西藏叛乱和中印边界争端

1959 年 3 月 19 日夜,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发动全面武装叛乱,被我迅速平定。3 月 31 日达赖带着一批人进入印度,并于 4 月 18 日在印度阿萨姆邦的提斯浦尔发表鼓吹西藏独立的所谓“达赖喇嘛声明”。尼赫鲁于 4 月 24 日亲自去印度北部山区穆索里同达赖会商,并多次发表干涉我内政的声明和讲话。党中央对印度采取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毛主席认为尼赫鲁是中间派,不同于右派。他有两面性,有好的一面,又有坏的一面。要肯定他好的一面,批评他坏的一面,应该争取他,不要把事情做绝。对达赖也要留有余地,争取他回来。将来他如果想回来,我们还是采取欢迎的态度,但他必须发表声明,放弃西藏独立。周总理根据毛

主席这一指示精神亲自抓报刊评论的工作，成立了一个国际问题宣传小组。新华社3月19日发表了达赖在离开拉萨前给中央驻西藏代理代表谭冠三将军的3封亲笔信，据此认为达赖是被劫持的（但事隔20年后，达赖在1979年向印度报界声称，他当时写这3封信是出走前为稳住中央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对印度干涉中国内政，为了顾全中印友好的大局，中国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开始时并未公开指责印度当局。经周总理审定于4月15日发表的《人民日报》观察家评论《不能允许中印友好关系受到损害》，只讲了帝国主义和印度非官方攻击我平叛的言论，还对尼赫鲁演说中提到“不可让中印关系恶化”，表示了欢迎。4月18日周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仍然表示希望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能继续发展，并没有对当时印方极不友好的言行加以谴责。中国只是在印度方面反华言行充分暴露后，才后发制人，在宣传上集中进行反击。5月6日发表了由胡乔木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撰写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文章全篇贯彻维护中印友好的精神，分析了西藏问题和印方态度的背景，充分说理，用词既尖锐又委婉，注意讲究必要的礼貌，掌握分寸，留有余地，尽量争取尼赫鲁同我继续合作。在撰写过程中，周总理还特别要求文章在收尾处要引用尼赫鲁1954年10月访华时说过的友好的话。

1959年8月25日，印度在中印边界东段朗久地方挑起第一次武装冲突，接着又在10月21日在西段空喀山口

挑起武装冲突。面对这种严重情况，周总理于11月7日致函尼赫鲁总理，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中印总理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1960年4月，周总理赴新德里同尼赫鲁总理诚恳商谈。但中方的真诚努力没有得到印方的响应。双方除同意由两国官员共同审查、核对和研究有关边界问题的事实材料并向两国总理提出报告外，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双方官员从6月至12月进行了三轮会晤后，各自提出了关于中印边界的报告。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方只在报上发表中印官员报告的摘要，双方报告的全文，中文本长达584页，由外交部出版，在内部发行。

为了对中印边界问题作全面的阐述，根据周总理指示，请胡乔木执笔，写了1959年12月26日中国外交部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照会。事先乔木同志要外交部就边界各段提供确切有力的材料。照会就中印边界是否正式划定过，中印传统习惯线在哪里，什么是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正确途径等三个问题，充分摆事实，讲道理，作富有说服力的叙述。照会公开发表后，阿富汗驻华大使向外交部有关人员表示：他通读了照会后，认为文字简洁生动，语气委婉，把复杂的边界问题说得又清楚又客观，这是他看过的最好的外交文件之一。

从1960年起，印度外交部陆续发表白皮书，题为《印度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交换的照会、备忘录、信件及签订的协定》，前后共出版了11册。每次发表白皮书都引发印度议会和报刊的阵阵反华叫嚣。周总理指示外交部也要编相应的

文件汇编,以供必要时使用。我们编的文件汇编,由于书的封面是红色的,我们内部戏称之为红皮书。第一册题目是《中国和印度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印边界和其他问题来往文件汇编》。当时汇编文件为便于随时送总理审定,亚洲司在中南海北门国务院临时借了一小房间。以后陆续编辑共出版了7册。为了不扩大双方分歧和争论,报上只发表一些主要的照会和信件,红皮书由外交部出版后只在内部发行,这也是周总理为缓和中印间紧张气氛的一番苦心。

1954年中印协定经两国政府批准后,有效期定为8年,按规定将于1962年6月3日期满失效。早在1961年10月,章文晋司长就对我说,总理要外交部就中印协定将期满一事提出意见。我们提出意见后,总理指示这件事要做到仁至义尽,尽量争取协定不失效,以利于保持中印友好势头。我们按这一精神,于1961年12月3日、1962年3月1日、5月11日由外交部三次照会印度驻华使馆,建议两国政府举行谈判,以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缔结一个新的协定来代替原有的协定。印度方面却无端地把协定同边界问题联系起来,说什么只有中国扭转它过去几年执行的侵略政策,才能进行谈判,再三拒绝了中国的建议。根据事不过三的原则,这个在序言中列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只好到期失效。

随着中印边境形势和两国关系的日趋紧张,双方抗议和反抗议、相互指责和辩驳的来往照会大大增加,形成了白热化的“照会战”。我方照会在发出前几乎都由周总理亲自

过目和最后审定,注意必要的外交语言。而印方来照语气却越来越横蛮无理,出言不逊。有一次周总理在接见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时说,我们的照会在发出前我基本上都是看过的,我不知道尼赫鲁总理是否也这样做。照会中语气的升级是不利于两国关系的,希望印方能加以注意。1961年6月,我随章文晋司长陪同从蒙古路过北京回国的印度外交部秘书长拉·库·尼赫鲁(前驻华大使)和印大使帕塔萨拉蒂去上海会见周总理。周总理为恢复中印友好又作了一番努力,但印方后来也没有什么反应。印大使于当年7月20日离任回国,从此印方未再派大使。中方整整等了1年,中国驻印大使潘自力也不得不于1962年7月18日离任回国。这时印军正在西段加勒温河地区深入我境内建立侵略据点,被我部队包围,有被歼灭的危险。尼赫鲁在设午宴送别潘自力大使时提出要求,希望我手下留情。潘大使将此情况以特急电报发回来后,我撤消了包围,避免国境又一次武装冲突。

中印边境冲突后妥善处理两国关系

尽管中国再三退让,中印边境的大规模武装冲突还是在1962年10月20日爆发。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三项建议,要求双方尊重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从这条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两国总理再次会谈;如印度总理不便来京,中国总理愿意前往新德里。这一建议遭到了印方的拒绝。但中国

政府仍于11月21日宣布全线停火,中国军队从12月1日起后撤,并单方面撤到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的20公里以外。这样中印边境的局势才平静下来。1963年2月28日,中国边防部队完成了主动后撤计划,并宣布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度军事人员和归还所缴获的武器弹药。12月3日,周总理在出访亚非等14国前夕,还特地接见了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班纳吉先生,指出:中印边境的局势是和缓了,除非有一方破坏边界现状,而中国是决不会破坏现状的。中印两国关系不应该再恶化下去。照会战虽然比边境武装冲突好,但双方应该通过照会想办法寻求一些共同点来促进两国关系的改善。

中印边境冲突发生后,周总理于11月15日就中印边界问题写信给亚非各国领导人,信后附有我方绘制的地图5张,参考地图6张。参考图一是加尔各答测量总局1862年出版的《英属印度斯坦北疆图》,标明中印西段边界传统习惯线是沿喀拉昆仑山脉而行的,阿克赛钦地区属于中国。参考图二A是印度测量局1917年出版的《西藏及邻近国家图》,标明东段传统习惯线是沿喜马拉雅山的南麓而行的,而且该线西端的一段还是以明确的国际边界线标出。参考图二B是大英百科全书1929年第24卷的插图,东段也是沿喜马拉雅山的南麓分界,根本没有画出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参考图六是两张英藏代表1914年在西姆拉会议外,背着中国中央政府非法绘制的麦克马洪线原图。根据这两张原图,引起1962年边界冲突的东段扯冬地区明确位于麦线以北,这说明冲突是印方挑起的。这些附图都是精心挑

选，由周总理最后审定的。

1967年6月，印度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鲁冠南和一名三等秘书擅自闯入北京西郊军事基地，偷拍军事设施，从事间谍活动，被当地值勤人员发现，偷拍的胶卷被当场查获。鲁冠南后来书面承认他这样做是错误的。中国政府因而宣布这两名印度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印方作为报复，也宣布中国驻印使馆一等秘书和三等秘书为不受欢迎的人，而且于6月17日纵容暴徒闯入中国使馆院内，焚烧中国国旗，捣毁使馆办公楼，烧毁两辆汽车，将8名中国外交官和工作人员打成重伤。消息传来后人们十分气愤，我驻印使馆曾来电报认为印驱逐我一秘是升级和不对等的，建议我应再驱逐对方相应外交官。周总理在电报上批示：此议不妥，不能这样做，如再升级有可能导致两国中止外交关系。对北京群众到印度驻华使馆门前示威，由于事先作了严密防范措施，位于东交民巷的印度使馆只是沿街儿的几扇窗户玻璃被打碎，人群未进入使馆院内，更没有发生殴打印使馆人员事件。这在当时极左思潮泛滥和情绪激动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尽管如此，周总理对印度使馆被砸事件进行了严厉批评。亚洲司一名违纪干部后来还受到调离外交部的处理。周总理这种以中印友谊大局为重的宽广胸怀，充分反映了他政治家的高尚风度。

关于翻译和出版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所著《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也是周总理亲自布置的。马克斯韦尔在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时是英国《泰晤士报》驻德里特派记者，他精心收集了印度政府的内部材料，客观叙述和分析了中印边

界问题和冲突的背景,说明冲突是印度推行“前进政策”的结果,印对此负有责任。该书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被认为是可信度很高的权威著作。毛泽东最早从《参考资料》上看到《印度斯坦时报》摘登的该书部分内容,认为很有价值。周总理立即指示外交部组织专人把该书译出并出版。1970年由柯柏年、章文晋、周南等6位同志合译,197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书的译者用了一个笔名,叫“陆仁”,也就是“六人”的意思。

1970年5月1日,毛主席为了调整被“文化大革命”干扰的对外关系,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各国驻华使节。他对印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拉杰希·米斯拉说:“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印度人民是一个伟大的人民。中印两国人民总是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嘛!请问候你们的总统和总理”。印度政府不久即传来口信:“我们准备开始对话,其目的在于消除笼罩着我们两个邻国之间关系的紧张和敌对状态”。当时一度出现中印关系好转的征候,我也被从江西上高外交部五七干校调回。不料1971年3月发生了东巴基斯坦事件,印度公然干涉巴内政,11月印又对巴发动全面武装侵略,中印改善关系的进程受此影响而被推迟。12月16日印度军队占领东巴首府达卡后,周总理要亚洲司副司长叶成章和我去西花厅起草中国政府声明,并亲自修改,对印度侵略行径进行谴责。1972年初,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曾写信给周总理,为其侵巴行径辩护。总理当时正忙于接待尼克松总统工作,但仍不忘要外交部对此信研究如何答复。后来因当时印迟迟不撤军和遣返巴战俘,拒不执行联合国

有关决议,为主持正义和对印保持压力而没有复信。

1974年后周总理长期住院,无法再多过问中印关系,不幸于1976年辞世。当时有许多印度友人来我驻印使馆所设灵堂前吊唁,英·甘地总理也亲自来馆致哀并留言。不久两国决定互派大使,结束了长达14年双方只有代办的局面。今天中印关系已恢复友好,双方领导人访问不断,两国边境已就实际控制地区保持和平和安宁以及采取信任措施达成了协议。中印友好来之不易,我们不能忘记周恩来为此而付出的心血和重大贡献。愿他首创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准则在世界各国之间得以实现,永放光芒。

记周总理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蒋 本 良

我自 1961 年从驻罗马尼亚使馆调回外交部苏欧司工作以后，一直担任中央领导的主要罗文翻译，因而经常有机会随同周总理工作，几乎三天两头，或白天或深夜，被召去为周总理会见外宾担任翻译。在陪同总理会见的无数个外宾中，周总理同罗马尼亚共产党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的会见，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这也许是因为，它是我为总理作的最后一次翻译，也是总理生前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宾。

那是 1975 年 8 月，罗党中联部长安德烈约见中国驻罗大使李庭荃，提出罗共中央执委、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要求在访问越南后，顺道访问中国，以同中国党互通情况，交换意见，发展友好关系。安德烈强调说，维尔德茨是党中央第二书记，是总书记的亲密同事。考虑到维尔德茨在罗党内地位较高，又从未来过中国，中方同意了维尔德茨访问中国。

1975 年 9 月 5 日，以维尔德茨为首、团员中包括罗共中委、国防部副部长兼最高政委会书记格奥尔基·戈莫尤和罗共中联部副部长瓦西里·山德鲁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

团从河内抵京。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中联部部长耿飏、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和中联部副部长张香山等前往机场迎接。在赴宾馆途中,维尔德茨向耿飏表示,希望亲自向周总理转达罗党政领导的问候,并要转达一个口信。当时,距总理逝世仅4个月,住在医院的周总理身体已经极度衰弱,本来不允许再进行接见外宾的紧张工作了。但此时的周总理,仍在为国家的前途命运忧心如焚,他要为此做最后的努力,履行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①,同意会见维尔德茨。

1975年9月7日上午,我正陪维尔德茨和罗马尼亚代表团在北京参观一个棉纺厂,突然中联部接待组组长邢竹芳赶来通知我们:周总理将满足罗马尼亚代表的要求,马上会见他们。这个消息使维尔德茨和代表团的成员们无比激动和兴奋。周总理住院以后,我也很久没见到他了,非常希望能有机会探望他,所以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情也非常激动。

北京的秋天清爽宜人,和煦的阳光格外令人心情舒畅。中午1点正,我随车陪同维尔德茨和代表团两名团员以及罗驻华大使格夫里列斯库,来到紧靠中南海的305医院。当我们走进医院门厅时,周总理已经站在那里等着客人。以前周总理每次会见外宾,总是先期到达会见地点,迎接客人,以示礼貌。这时重病的周总理仍然保持了这种外交礼节和风度。

^① 1973年9月,周总理在身患绝症仍朝乾夕惕工作的情况下,会见了罗共中央委员、中央常设主席团委员波德纳拉希。当波德纳拉希问到周总理身体情况时,周总理泰然地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中方参加会见的有纪登奎、耿飏、郭玉峰、张香山和我们3名工作人员(我担任翻译)。周总理同客人们一一握手以后,就在简朴的医院门厅同客人们合影留念。为了不多耽搁周总理的时间,不使他过分劳累,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按预先排好的次序,以最快的速度,让全体参加会见的人员排列好。

当时周总理的身体状况,是不允许作长时间谈话的。所以,这次会见本来只计划合影留念,握个手,简单交谈两句。但是,周总理却执意把维尔德茨请到了会客室。病魔的摧残,“四人帮”的迫害,夺走了周总理健康的体魄,我看着周总理憔悴瘦削的身影,深陷的脸颊,艰难的步履,心里觉得十分难过。后来听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已是会见外宾前整容刮胡以后的神态了,实际上还要憔悴得多。周总理当时穿的仍是原来的中山装,可是却显得空荡荡的,更衬托出里面瘦弱不堪的身体。从医院门厅到会客室短短的十几米的路程,对重病的周总理来说已显得有些漫长。纪登奎想上去搀扶,但周总理拒绝了,他坚毅地一步一步移动着走完了这段路。

记得自从得了绝症以后,周总理会见外宾时总是让外

尔德茨转达对罗马尼亚领导人的问候，从罗总统、总理到熟悉的老朋友。周总理还特别关切地询问了当时同样身染沉疴的波德纳拉希的健康情况：“他的病怎么样？听说他也很困难？”当维尔德茨说，波德纳拉希也不大好时，周总理又一次要维尔德茨回去后代他问好。接着，维尔德茨表示非常感谢能有机会会见周总理，罗党领导和总书记本人向毛主席、周总理表示最诚挚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祝周总理幸福健康。周总理表示了感谢。当维尔德茨表示，罗马尼亚高度评价罗中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关系，要采取一切措施来发展这种关系时，周总理再次表达中国人民的坚定意愿说，“我们两党、两国的关系很好，今后一定能发展得更好！”

接着，维尔德茨询问了周总理的健康情况，周总理显示了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生死问题的达观与坦然，言谈举止中丝毫没有悲戚与恐惧之情。他平静而诙谐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接着，周总理无限感慨地说：“时间过得真快！还只有10年，就在10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去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4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就连4分钟也走不了了！”往事历历，如在眼前。回想当年健步如飞的周总理，再看看现在他饱受病魔摧残的面容，大家的心情十分沉重，会客室里的气氛变得有些伤感。

仿佛为了冲淡这过于凝重的气氛，周总理无限深情而乐观地回忆起了以前访问罗马尼亚的美好印象：“我再也不能看到漂亮的布加勒斯特了。但是我还可以从电影上、从照

片上、从图画上看到她！”这寥寥数语，是一位即将告别人生的伟人抒发出的对人生的无限热爱和留念。翻译着这些话，我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周总理的话也深深地打动了维尔德茨，在返回宾馆的路上，他无限感慨与痛惜地喃喃道：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啊！

会见最后，周总理谈到了中国的接班人问题。我想，这大概是总理执意会见维尔德茨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多少年后，我才真正地理解了总理谈话的含义。

当时，中国正处在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核心年迈而重病缠身之际，周总理在毛主席支持下，已经赋予邓小平以党政军领导的重任。因此，“四人帮”又把邓小平当作最大的绊脚石，施展各种阴谋诡计欲以除之，加以各种罪名进行打击。对此，周总理既忧心如焚，又对邓小平寄托着无限希望。周总理对维尔德茨说：“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第一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这时，纪登奎插话解释说，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接着，周总理表情十分严肃地说：“具有 55 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周总理逝世后 20 多年的历史，完全验证了他历史性预言的正确性和远见卓识。后来，维尔德茨回忆这次同周总理的谈话时，意味深长地说：“经过中国后来的历史演变，我才真正理解了周总理当时说的话。”

在半个钟头左右的会见中，周总理的热诚使罗马尼亚客人十分感动，维尔德茨在回宾馆的路上激动地说，“周恩来是罗马尼亚人民的伟大朋友！在罗马尼亚也有很多他的

朋友。”周总理逝世后，罗马尼亚领导人曾满怀深情地说：“周总理的逝世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也是世界人民的巨大损失！”曾经无数次访华受到周总理接待、重病期间曾直接受到周总理的帮助、对周总理怀有无限敬仰之情的波德纳拉希，在周总理于1976年1月8日逝世后，在当月24日相继去世。

和往常一样，周总理在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中，也体现了对翻译工作人员的关怀和爱护。会见结束时，外宾陆续离去，周总理看见走在最后的我仍频频回顾，便又一次带着微笑向我伸出手来。我赶紧跑上去，紧紧握住他瘦弱的手。可是，谁能料到，这竟是他和我最后一次握手了。这是周总理赋予我一个普通翻译工作者的最大荣誉！

一代伟人，就这样匆匆逝去。但是，周总理在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中表现的对国家命运的高度责任感，对邓小平寄予的厚望，以及他对死神来临所抱的淡如水的平静态度，对普通的翻译工作人员的关怀，都深深地给我以教育和启迪，永远铭记在我心里。

母亲对周总理的怀念

吴青

凡是熟悉和了解我的母亲——谢冰心的人，都知道周恩来总理是她最尊敬、最佩服的中国领导人和共产党员。她觉得和周总理谈话就像家人骨肉的闲叙家常，她可以向他倾吐她的内心世界，总理总是诚挚而亲切的。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以后，我们家的客厅里先是挂上了一幅我当时抢购到的周总理标准像。不久中央民族学院的一位画家知道妈妈对总理的特殊感情，他就根据一位意大利摄影师给总理照的那张著名相片，画了一幅彩色油画送给妈妈。妈妈高兴极了，马上把这幅周总理的油画挂在我们客厅里，栗色的高柜上面，并不时地供奉一瓶鲜花在总理像前。从此以后在总理的像前，总有鲜花陪伴着他。即使妈妈住进了医院，总理像前仍是鲜花不断。

妈妈自1994年9月25日住进医院以后，周总理常常是我们谈话的内容。妈妈常说，“历史上，国内、国外有许多的宰相，但是没有一个宰相像周恩来总理。他通人情。他知道并了解每一个人的个性和心声，对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办法。没有一个宰相能赶上周总理的。”妈妈每一次提到周总理的时候，都流露出一种对总理特别崇敬的心情，她的眼

睛有时仍然流出怀念的眼泪。妈妈曾这样说过，“他是一股热流，一团火焰，给每一个人以无限的光明和希望。”妈妈还爱引用总理常说的，“活到老，学到老。”正因为这样，每当我从外地扶贫回来，谈起各地的变化和种种腐败现象，妇女和女童受歧视，她们的权利常常受到侵犯的时候，她很生气。她总是为国家各个方面的进步感到高兴，对社会的腐败和 不公感到气愤，正因为她仍然关注着社会上的事，她才会在她 95 岁的那天，把她全集的全部稿费捐给了“农家女百事通”杂志社下属的中国农村妇女教育与发展基金。

我们是在 1951 年 8 月回国的。第二年的一个初夏的清晨，妈妈特别兴奋地告诉我和姐姐：“昨天下午，周总理派了一辆汽车把我们接进了夜景如画的中南海，直到总理办公室门口停住。周总理从门里迎了出来，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笑容满面地说，‘你们回来了！你们好呵？’听到总理亲人般的话语，我悲喜交集得说不出话来。总理极其亲切地招呼我们在他旁边坐下，极其详尽地问到我们在外面的情况，还问到了你们。总理希望你们不要把英语忘了。因为中国今后要大力开展与亚、非、拉的外交，中国需要许多外语人才。周总理和我们谈了好几个小时。到了晚上，总理留我们和他共进晚餐。饭桌上只有四菜一汤，唯一的荤菜就是一盘炒鸡蛋。我感到又惊奇，而又高兴。惊奇的是总理的膳食竟是这样的简单，高兴的是总理并没有把我们当外人。就是在短短的吃饭期间，都有工作人员送文件，或是在总理耳边低声汇报工作。我们真想和总理多呆一会儿，但是看到总理这样忙，知道总理日理万机，不好久坐，吃了饭不久，我们就回来

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妈妈脸上流露出的那种幸福和兴奋的样子。

妈妈最不能忘记的，是总理的恩情和亲切的关怀。1958年爸爸被错划为右派，罪名之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罪名的份量有多重呀！爸爸得根据这条罪名写检查，但他根本没有这种想法。他和妈妈两人怎么想也想不通，他们说，“我们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为什么要千辛万苦地借着去美国的名义，回到了祖国来反呢？”但是妈妈还得鼓励爸爸千方百计地去“挖根源。”就在妈妈感到迷茫和困惑、不知所措的时候，周总理和邓妈妈派了一辆小车，把她接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知道妈妈的心事，但当时他们不能说什么，只十分诚恳地让妈妈帮爸爸好好改造，说：“这时最能帮助他的人，只能是他最亲近的人了……”在这关键时刻，总理还想到妈妈，把她接到家里去谈心，这么深入细致的，知人知心的，也就只有我们的周总理。这就是为什么直到现在，每当提到总理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感到妈妈心中无限的怀念之情。周总理永远是我们全家最最敬爱的人。

在周恩来指导下做地下情报工作

——访沈安娜、华明之

薛 钰

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艰苦斗争历程中,隐蔽战线无数忠诚于党的事业、智勇双全的优秀共产党员,在危机四伏、极为险恶的白色恐怖下,深入龙潭虎穴从事地下情报工作,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特殊贡献。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沈安娜、华明之就是这样的隐蔽战线上的老同志。他们既是夫妻,又是曾在敌人营垒并肩战斗、风雨同舟的战友。当年,在中共隐蔽战线主要开创者、领导人周恩来的指示下,沈安娜打入敌人要害部门——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华明之的协助下,为党侦获了大量核心机密情报。在敌人心脏长期埋伏、艰苦卓绝的14年中,是周恩来的教导鼓励他们坚持斗争,在受到敌人怀疑追查的突发事件前镇定自若、处乱不惊、化险为夷。华明之现年已84岁,沈安娜也已82岁。回忆起当年的情报生涯和周恩来的谆谆教诲,两位老人仍万分激动、感慨良多。

记者:华老,听说您是沈老参加革命的引路人,请谈谈您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从事情报工作的?

华:1933年我在上海南洋商业高级中学读高二时,认识了高三的刚加入共产党的舒曰信同学。那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大肆“剿共”的政策。舒曰信在和我的交谈中,了解到我对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反共政策非常不满,就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入党介绍人、1924年入党的老同志鲁自诚。1934年7月我高三毕业时,他们两人介绍

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那时由周恩来创建的中央特科已发展到一定规模,我入党后的直接领导人就是中央特科从事情报组织领导工作的王学文,上级领导是当时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之一王世英。参加革命后我的公开职业是在上海国际无线电台当业务员,同时党组织安排我做情报、交通、接送外地邮寄的密信等秘密工作。

记者:那您是我们党早年的情报保卫专业机构的老前辈了。沈老,您是怎样认识华老和参加地下情报工作的?

沈:1932年冬天,我姐姐伊娜反抗封建包办婚姻压迫离家出走,我很同情,随她从江苏泰兴到上海求学、谋生。我在南洋商业高级中学读完高二时,认识了校友舒曰信和华明之。在家乡读书时,我和姐姐受到老师的启发,已具有一定的反帝救国思想,所以立即接受了舒、华两人所讲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1934年伊娜参加革命,同舒曰信结婚,1939年秋入党。这时我因经济来源断绝,改进炳勋中文速记学校半工半读,以求速成谋生。同年底,我在速记学校快毕业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向该校招收一名速记员。当时我不愿意到国民党机关衙门工作,舒曰信、华明之的上级王学文指示他们做我的思想工作,要我利用这个好机会,争取打入浙江省府做情报工作。因为我的速记技术和中文水平符合要求,顺利地进入了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秘书处任速记员。接着王学文对我进行了一系列情报工作教育,并批准我1935年1月参加革命,开始了我的情报工作生涯。老华则按照王学文指示到浙江杭州浙赣铁路局工作,就近协助并指导我的工作。1935年秋,我俩结为终生伴侣。

记者: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工作的这两年,是您从事党的地下情报工作的最初阶段,一定有不少收获和体会吧!

沈:是的。在这一段情报工作生涯中,我逐步掌握了国民党机关的一般情况和办事规律,广泛结识了一批国民党中上层政府官员,初步摸索到情报工作的一些基本做法,获得了一些有参考价值

的情报。这些都为以后长期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打入国民党最高指挥机关的有利条件。

记者：后来你们怎样从上海到武汉的？

华：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不久，战火扩展到沪、杭一带，杭州沦陷。这时，我们同上海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辗转西撤。后来，我们从报纸上看到国民党中央党、政机关已迁到武汉，我们党的一些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等也到了武汉，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于是我们商量，由沈安娜先去武汉找党。1938年5月，她在汉口的马路上巧遇我的人党介绍人之一鲁自诚。经鲁自诚指点，沈安娜到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同志。

记者：沈老，请您谈谈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情况。

沈：我第一次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是孟庆树接待的。她听我说要求见周恩来、董必武两位领导汇报我们的情况，并要求分配工作，就让我把自己和爱人的情况作了简单介绍，并问了我的地址后说：“以后约时间见领导。”过了几天，我应约去“八办”，一位青年同志引我进去。想到马上见到党中央的领导了，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很快，一位慈祥的长辈走过来，他就是董必武同志。我一看董老和我父亲年龄差不多，马上喊他“伯伯”，董老笑笑点点头，亲切地对我说：“你和华明之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恩来同志也知道了。”我感到很奇怪。后来得知，鲁自诚是由董老直接秘密联系，打入国民党军队做情报及统战工作的老同志。他已向董老说明了我和老华的政治经历。董老说：“你过去做过情报工作，又有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的关系，现在朱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你可以用老部下的身分要求进国民党中央党部，为党做情报工作。”还说：“你越打入国民党上层核心，危险性越大，一定要格外谨慎，凡事慎重。”

接着，周恩来同志也进来了，我立刻起身表示敬意，当时我想鲁自诚要我去“八办”要求见领导，于是马上向他说“领导好！”恩来

同志顺手拍拍我的肩膀,让我坐下。他亲切地询问:“多大了?”我说:“23岁。”恩来同志又问:“你为什么一个人来呀?”我说:“我已辞去浙江省政府的工作,华明之暂留浙赣铁路局拿工资维持两人生活,等我找到组织,他马上就来。”恩来同志向我谈了当时的形势,并教导我说:“目前我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族人民一致抗日。但蒋介石抗日是被迫的,为了防止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党有必要搜集国民党的情报,及时了解其反共意图和活动,进行有针对性的斗争。”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要我抓紧打入国民党中央机关,并再三叮嘱我:“你要机警灵活,注意隐蔽,既要大胆,又要谨慎。”最后他还让我通知老华立即到“八办”恢复党的组织关系,并就近指导、协助我做好情报工作。因为夫妻两人一起工作、生活,更有利于掩护和隐蔽。

记者:在当时形势下,国民党中央核心机关一定防范得很严密,您是怎样顺利地“打”进去的?

沈:在接受周恩来、董必武指示的第二天,我去国民党中央党部找朱家骅秘书长。我按老习惯仍称呼他“主席”。他首先问我:“你从浙江来吗?”我说:“是啊,我千辛万苦来到武汉,请主席分配我工作,我要为党国效劳啊。”朱家骅说:“容易,容易,中央党部正需要速记。”接着他问我:“你是不是国民党员?中央党部工作人员一定要是国民党员。”我心里一惊,这一点我原先不了解,该怎么办?随即我想到,周、董两位领导不是都要我抓紧打入中央党部吗?于是我立即随机应变说:“我在浙江省政府时年纪还轻,没加入国民党,现在加入可以吗?”朱家骅当即吩咐旁边的秘书:“你们给她办‘特别入党’。”后来我才知道,所谓“特别入党”,就是由3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作介绍人,这样手续简单,批准时间很快,而且在国民党内部被认为有来头。我就是由朱家骅和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甘乃光等3人作介绍参加国民党的。在等待批国民党党证期间,朱家骅特别关照,安排我在他主管的一个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的办事机

构里做临时工作，并在该会的女宿舍暂住。第二天，我马上去八路军办事处向董老汇报，并对未经请示办了参加国民党的事作检讨。董老笑着说：“没有错，做得对嘛！伪装自己是情报工作的特殊需要，有了国民党党员身分，就能骗取信任，长期立足。情报工作人员应当有这个灵活应变的能力。”

1938年8月，华明之来到武汉，与党组织接上关系，董必武指示我们两人离开武汉去重庆机房街八路军办事处报到。我们到了重庆不久，国民党中央党部就通知我，“特别入党”的党证已经批下，安排我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的机要处当机要速记。机要处的处长、科长和一位老速记都是在武汉时，由朱家骅安排我担任国民参政会速记员时认识的。由于我是朱家骅亲自安排进中央党部工作，又是他的“老部下”，所以上上下下的人都很信任、器重我，立即要我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从而使我获得了蒋介石及其他国民党军事首领的讲话等重要情报。

记者：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周恩来、董必武就洞察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把您派进国民党核心机关，真是深谋远虑、远见卓识。

华：对。后来我们得知，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总方针是：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党的情报工作就是为这个总方针服务的。当年周、董两位领导对我们的教导中已蕴含了这一总方针的基本精神。他们给我们布置的今后的情报工作任务，也是为配合党的总方针的。

记者：沈老，后来您又见过周恩来吗？

沈：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后，我就去“八办”汇报，董老和博古同志一起接见了。两位领导没想到我这样顺利地打入国民党中央核心机构，并且很快取得了重要情报。后来，我再次去“八办”，恩来同志知道我已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并看到了我送去的情报，非常高兴，他要我今后更加小心谨慎，获取信任，鼓励

我站稳脚跟，长期工作下去。从此以后，我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的高层秘密会议上担任速记，向党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

记者：您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时，正是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美、英政府加强对国民党政府的劝降，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也日益严重。您在国民党核心机关任机要速记，一定能为我们党获取许多这方面的情报吧？

沈：是的。举个例子说吧：1939年1月，蒋介石在重庆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会前，材料、文件一批批送到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我看到了大会议程和附件，发现其中有两个绝密文件非常重要，是供五中全会讨论用的。一个是《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后改为《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另一个是《关于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都是由国民党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起草的。中统局局长当时由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兼任。

为了争取时间，早些让党组织了解敌情，我在晚上偷偷溜进八路军办事处，向董老、吴老和博古同志汇报情况。我每次去都很谨慎，注意防止敌人盯梢，出来时由董老派人送我一段，因此没有出过问题。董老、吴老见到我，也总是亲切地说：“啊呀，小速记来了！”他们仔仔细细地听我汇报国民党五中全会即将讨论的问题，并要我继续详细了解会议情况，及时汇报。

五中全会开始后，我担任会议速记。蒋介石主持会议，我坐在主席台旁边记录蒋介石的报告。他在大会上口口声声讲“国共合作”、“抗战到底”，却秘密策划如何限制共产党部队的发展，借日本的力量一步步包围我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和江南的新四军，还同汪精卫傀儡政权遥相呼应，密谋勾结。会议期间，我抽空去向董老、吴老汇报。他们认为情报很重要、很及时，表扬我工作积极，有成绩。他们还帮助我分析敌人动向和形势变化，指示我重点搜集国民党党务、政治、军事、特务和人事方面的情报。但要我以后尽量少去

八路军办事处，防止暴露。后来，组织决定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吴克坚联系领导我们的工作。

我得到国民党五中全会上讨论的那两个反共的文件草案和正式通过的文件全文后，都交给老华，由他及时交送党组织。党中央后来从其他渠道也获得了这两个反共文件，曾据之编写成《磨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揭露国民党反共阴谋，教育我党指战员和全体人民。1939年秋，毛泽东、周恩来曾就《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向国民党提出抗议，指出国民党秘密下达的这个文件是造成各地国共磨擦的根源。

记者：你们送交党组织的这些情报，不仅对党中央制定军事斗争有重要参考作用，而且配合了党的政治斗争，真是太有价值了。可是这些情报都是冒着随时可能被察觉、逮捕、坐牢、杀头的危险弄来的。沈老，您在国民党中央机关的龙潭虎穴中做情报工作10多年，有过换换环境和工作的想法吗？

沈：也有过。为这个周恩来还亲自开导过我。那是在1938年冬天，我看到一批批青年通过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延安参加革命，心里非常羡慕。我长期身处国民党官僚衙门，十分厌恶那种环境，又觉得自己没有系统学习过革命理论，想到延安一边学习马列，一边痛痛快快地干革命。一天去“八办”时，我先向博古同志提出去延安的要求，未获同意，随即我又向董老请求，更是遭到了斩钉截铁的拒绝。我没敢再去找恩来同志，而他却为此找我谈了话。他语重心长、严肃而又亲切地告诫我：“你已经有了很好的工作条件，也获得了重要情报。你有速记专长，别人无法像你这样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关。你在国民党中央核心机关，能参加各种重要会议，接触许多机密文件，搜集党所需要的情报。这项秘密工作非常重要，你要从革命大局着想，以大局为重。党很需要你坚持在这个重要岗位上继续努力。”一席精辟的话语，使我茅塞顿开。但是我仍觉得在国民党机关里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区里生活，无法学习革命理论，又向恩

来同志提出让我去延安学习一年再回重庆做情报工作的要求。这一幼稚的想法,引得恩来同志哈哈大笑,他说:“去一天也不行。你去了延安,就不能再回国民党中央党部了!”接着他进一步开导我:“在国民党统治区一样可以学习,你可以从国民党的报纸上,从反面的材料中,学习到不少东西。你拿秘密材料和公开报导相互印证,不就可以看清国民党的反动本质了吗?”邓颖超同志也在旁边劝我说:“要服从组织,不能只考虑个人的愿望。”恩来同志和邓大姐都强调:“为了情报工作需要,你要甘当无名英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无名英雄”这个名词,而且出自我所敬仰的两位领导人之口,深感这词的份量,也更深刻地认识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我当即表示:一定在国民党机关扎下根去,一辈子为党做好情报工作。此后,我一直牢记着周恩来同志对我的谆谆教导,在这特殊的岗位上尽心尽力地工作了一辈子。

记者:你们在离休前一直从事着隐蔽战线的工作,真正实践了当年的诺言。地下情报工作非常艰巨危险,在敌人营垒十几年中,你们遇到过突然事变和危险吗?

沈:当然。在那次谈话中,恩来同志还又一次教导我要细致、谨慎,以防万一,并特别对我进行了革命气节教育。他说:“在敌人心脏里工作,危险性很大,要随时准备应付意外事件。遇到突然事变,共产党员要有骨气,做到临危不惧,从容镇定;既要有为革命献身的决心和勇气,又要沉着冷静,想尽一切办法对付敌人,保存自己,以争取长期埋伏。我相信你一定会为党作出更大贡献的。”恩来同志的教导字字千钧。我转告老华后,我们始终铭记在心,成为我们革命道路上的指路明灯。在后来的经历中,完全证实了恩来同志要我具有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准备和正确态度是多么的重要。

华:那是1942年夏秋之交发生的事件。以前我和安娜的先后直接领导人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吴克坚、卢竞如,后来改为徐仲航。那时,徐仲航打入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总管理处工作,要有

国民党员的身分作掩护。我们商量，由安娜用“特别入党”的办法为他办理党证，但党证还没发下，他就不幸被捕了。由于老徐没有按规定时间来联系，我们又不知他的地址，我同意安娜以国民党机关同事身分给他写信，寄到正中书局总管理处，信里借口称孩子生病，借他的钱等下月才能归还。

沈：几天之后，两个不明身分的年轻人来到中央党部，说是徐仲航出事了，要找我谈话。我意识到可能是恩来同志所说的突然事件发生了，想起他“临危不惧、从容镇定”的教导，我立刻镇定下来，设法对付。这两个人说：“徐仲航是共产党”，并拿出我写的信问：“你为什么借他的钱，是不是他拿钱收买你？”我一听，他们只是就我信上说的事提问，便装出气愤的样子批驳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证据说人家是共产党？”两人抢着说：“徐仲航的抽斗里全是反动的书。”最后，我抬出“大招牌”压他们说：“你们有什么事去向朱秘书长（朱家骅）报告好啦。”我说完，把这两人撂下扬长离去。

记者：那后来又怎样呢？

华：安娜回家后对我说了这些情况，我知道事情的严重性，首先认为用硬顶的办法对付小特务做得好。但问题毕竟没有了结。于是我们做了若干设想，以后如再追查，硬的怎样对付，软的又怎样对付。我们分析敌人知道安娜是朱家骅的老部下，是朱介绍加入国民党并安排在中央党部工作的，当时朱虽已调任组织部长，但他的讲话和部务会议还由安娜兼任速记。而且当时朱家骅还兼任中统局局长。如老徐能坚决顶住，用朱的“大招牌”是有利的。这时我们用恩来同志“共产党员要有骨气。要从容镇定，想尽一切办法对付敌人，保存自己”的教导互相勉励。安娜又回忆起1939年她入党介绍人卢竞如传达南方局组织部长博古在批准她入党后的指示：“做一名共产党员，要经受各种考验，始终坚贞不屈。”我们决心不动声色，静观动态。

沈：过了一段时间，中央党部财务处长兼正中书局董事长找我

谈话,他说:“你随便介绍人人党,多危险呀,万一钻进一个共党来怎么办?”又说:“你年轻不懂事,还帮人搞特别入党,以后这种事不要做了。”我听他有规劝的口气,就顺着说:“我还以为介绍别人入党是好事呐!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他听后换了温和的口气安慰我说:“好啦好啦,这件事不要挂在心上了,以后好好工作。”谈话就此结束。但我和老华始终未曾放松过警惕,焉知敌人不是放长线钓大鱼?

记者:由此可见,临危不惧、冷静沉着的素质在地下情报工作中是多么重要!只有处乱不惊,才能化险为夷。

华:是的。此后敌人虽然没有再找麻烦,可也不见组织派人来联系,日子一长,我们不由得渐渐焦急起来。作为党的地下情报工作者,失去与组织联系,比失去亲娘还难受;有重要情报送不到党的手里,更是如坐针毡。然而我们清楚地知道,皖南事变后,敌人对“八办”的监视更加严密。怎么办?这时恩来同志“争取长期埋伏,耐心等待”的教导,又在我耳边响起。我们互相鼓励,在困难时期,一定要沉着冷静,保住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速记这个重要情报岗位,坚持不搬家,守住这个联络点,要装做忠于职守的公务员。相信党组织一定会来找我们的。

1945年10月一个夜晚,老领导吴克坚突然推门进来,我们激动得愣住了,含着泪水欢迎亲人。安娜急忙向他汇报徐仲航被捕后的情况。克坚同志说:“情况组织上已知道了,你们应付得好,坚持了岗位,3年了,也真不容易呀!”当我们得知吴克坚这次是根据恩来同志的指示,来同我们接关系的,心里感到无比温暖和振奋。从此,克坚同志再度直接领导我们的工作。这时我们才知道徐仲航是以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捕的,1944年已由党组织派秘密党员阎宝航设法保释出狱离渝。回顾我们那次能够坚定沉着地对付敌人的盘问,争取保存自己,长期埋伏,继续为党工作,全靠了恩来同志在1938年的教导。

记者:听说国共和谈期间你们也为党获取了很有价值的情报,请谈谈那时的情况。

华:1945年8月15日,经过8年艰苦斗争,中国人民在付出巨大代价后终于赢得了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国民党政府迫于我党和全国人民呼吁和平的压力,更出于拖延时日以便调动部队,准备内战,消灭我党的企图,提出国共和谈,“共商国是”。国民党原先预计我党不会,也不敢到重庆会谈,以此把内战的责任推给我方。因此,他们很被动地在毫无准备谈判的情况下于1945年10月在重庆举行了国共和谈,并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商讨实施《双十协定》的方案。

记者:那沈老是不是又在政协会议上见到周恩来了?

沈:是呀。在政协会议期间,我白天担任大会和分组会的速记,晚上担任国民党“党团会”(即国民党代表的小组会)速记。两党会谈时,我看见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走入会议室,就像看见多年不见的亲人,心情十分激动。恩来同志悄悄地向我使了个眼色,邓大姐则故意从我面前走过,一只手放在背后摆了两摆。我明白他们在暗示我,让我不要打招呼,我心里感到一阵温暖。会议期间,国民党政协委员每夜举行“党团会”,部署第二天的谈判决策。我担任速记,把“党团会”商定的“底牌”连夜由老华写成情报交吴克坚转送恩来同志。因此,恩来同志和政协我党委员出席会议时胸有成竹,据理力争。

周恩来在政协会议上全面论述了“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的相互关系,特别详细地论述了“政治民主化”问题。针对国民党代表高唱“保证人民权利”、“政治必须民主”等虚假口号,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请政府当机立断,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尽快给人民以言论自由。几句话就戳穿了国民党的谬论和主张,使国民党代表张口结舌、十分狼狈。正因为真理本来就在我们这一边,又

有充分的准备,经过激烈斗争,政协会议终于通过了改组政府、军事问题等五项协议。虽然会后不久国民党就撕毁了协定,并掀起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大规模内战,但这次会议揭露了国民党玩弄假民主、真独裁的手法,教育、团结了中间派人士,也使广大人民了解了我党的政策和主张。

大会休息时,有些会议工作人员拿了纪念册请国民党和我党委员题词留念,我觉得这办法好,也想借这个难得的机会,请我党领导同志题词,作为教导激励我们的纪念品。老华替我装订了一个本子,封面写“纪念册”三个美术字,四周加上花边框框,还写上了我的姓名。我跟在同事们后面,先请国民党委员题词,他们分别写上“端庄贤淑”、“温柔敦厚”等字样,抬头都称我为“同志”。随后我请周恩来题词。他微笑着说:“写什么呢?”然后不加思索,挥毫写下“致力于中国妇女解放事业”,抬头则称我为“女士”。我非常高兴,向他道谢。彼此心照不宣,没多说话,而我却心如潮涌,难以平静。事后我和老华琢磨,觉得这一题词含义极深。我们深知,要妇女解放,就必先争取民族解放、阶级解放。恩来同志的意思就是要我努力做好地下情报工作,为革命多作贡献。接着,我又请董必武、吴玉章、王若飞等同志一一题词。他们都写了些勉励的话,也都称我为“女士”。

记者:这些题词中,国民党代表称您“同志”,自己党的领导人却只能称您“女士”,确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在多年的情报生涯中,您们夫妻二人又是怎样互相配合工作的?

沈:老华和我是亲密合作、互相勉励、帮助,风雨同舟的战友。比如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这是一次有计划、有步骤的准备策动全面内战的阴谋会议。大会借调几个速记员轮流记录,我只能参加一部分会议的速记。为了更多地搜集会议的重要内容,我征得中央党部机要处长、速记科长的同意,把老华借调到大会速记室,协助速记长做整理和编校工作。但老华在速记室里只

能看,靠脑子记不住多少东西。我就借口家有两个孩子,晚上需要照看,无法同其他速记人员一起“开夜车”,请求速记长同意每晚让我把一部分材料带回家去整理。他同意了,还叮嘱我注意保密。我和老华挑选有用的材料,带回家里,由老华摘抄后连夜送交吴克坚再转送恩来等同志。这一时期我们所送的情报,连同其他同志送的情报,被恩来同志评价为“迅速、准确”,给予了表扬。

华:1946年5月,我和安娜分别随国民党机关转移到南京,继续由中央社会部派吴克坚领导我们工作。周恩来曾指示:解放战争时期主要搜集国民党军事战略情报,并由我继续指导、协助安娜的工作。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们两人完成了党所交付的地下情报工作的历史使命。上海解放前夕,中央社会部经周恩来批准,通电给在吴克坚领导下的情工人员予以嘉奖。这是党对我们情工人员的莫大鼓励。

记者:在民主革命时期,你们有幸多次得到周恩来的指导和教诲,这不仅对你们,也是对中共隐蔽战线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最后,请谈谈在多年的情报生涯中,你们体会最深的是什么?

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仍在党的情报战线工作,还多次见到恩来同志,他继续给了我许多指点和教导。总的来说,我们从事情报生涯的一点深深的体会是:党的领导是做好情报工作的根本保证,情工人员必须不断加强党性锻炼,才能承受住各种考验;恩来同志对我们的教诲,以及他对我党情报干部关于党性修养和工作原则的教导,是他对我党情报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作为隐蔽战线的领导人,周恩来关于情报战线工作的指导思想、他的精神风范体现了我党情报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今后我们党和国家情报工作及情报干部必须遵循的重要思想。恩来同志高贵的品德风范和谆谆教诲,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周恩来与人民军队的创建

王 桢 华

周恩来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外交家，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我们从周恩来早期革命活动的轨迹中，不难看出他对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推动和发展，对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壮大，在理论和实践上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一、周恩来培育了我党领导的第一支军队，为创建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石

1920年底，周恩来到达法国巴黎，参加勤工俭学活动，并同其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旅欧总支部”。他虽客居异域，却不忘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22年8月，他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写道：共产主义“在中国，实负有变更经济制度的伟大使命”，目前中国“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主义革命外，实无法可解”^①。同年12月，他在《评胡适的“努力”》一文中又说：“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②可见，周恩来很早就认识到了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拉开了国民革命战争的序幕。同年6月，黄埔军校创办。7月，周恩来奉中共中央之命离

^①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6页。

^② 《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4页。

开巴黎回国后,即被派往黄埔军校工作。

在认真总结孙中山从事军事斗争屡遭失败的原因、研究苏联革命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周恩来认为:“革命数十年尚未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一支真正的革命军”^①。因此,在黄埔军校期间,他除利用自己工作岗位的便利条件,推荐一大批有能力的共产党人到军校和各军中担任重要职务外,还负责创建了第一支由我党直接领导和掌握的革命军队。

1924年11月初,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的周恩来利用国共两党合作的有利时机,征得孙中山的同意,在广州大沙头主持建立了“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铁甲车队下属成员的配备与调动,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及后来的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决定,其主要工作和活动也直接向他们请示报告。铁甲车队的队长徐成章、副队长周士第、军事教官赵自选就是周恩来从黄埔军校教官和毕业生中选调的共产党员。队员则由广东区委从黄埔军校和工农青年中抽调积极分子组成。铁甲车队成立后,曾和彭湃一起到广宁县援助农军,大败地主武装;1925年2月,参加了第一次东征,担任先锋;在援助省港罢工、和工人纠察队一起封锁香港及平定滇系军阀杨希闵、桂系军阀刘震寰的叛乱中,也起了重大的作用。铁甲车队是我党领导下的最早的一支革命武装。

1925年11月中旬,周恩来等人征得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同意后,以铁甲车队的100多名队员为基础,在广东肇庆成立了第四军第三十四团,次年改称独立团,由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叶挺任团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周恩来还从黄埔军校调来不少共产党员到该团任营长、连长和各级领导。从团到连都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团干部任免、调动、人员补充和军政工作活动等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尔后作出决定。周恩来还为独立团制定训练计划,编写政

^① 袁小伦:《周恩来与蒋介石》,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

治教育提纲,向广大官兵进行政治教育。这支部队完全是由我党直接领导和掌握的第一支正规军队。

在北伐前夕,周恩来把独立团从肇庆调回广州,并号召大家要英勇作战,不怕牺牲,担负起北伐先锋的任务。他嘱咐叶挺:“要加强中共的纪律,发挥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扬牺牲精神,与友军亲密合作,打好头阵,为北伐开路”^①。1926年5月下旬,叶挺独立团的2100多名壮士,高擎团旗,头戴铜鼓帽,脚穿草鞋,向湖南省中部挺进,首战渌田,大获全胜,从而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随后,攻攸县,克醴陵,破平江,断粤汉,勇夺汀泗桥,占领贺胜桥,为北伐军扫清了重重障碍,建立了卓越的功勋,赢得了“铁军”的美誉。

独立团占领武昌后,我党趁国民党部队扩编的机会,将该团扩编为一个师、两个团,使这支部队完全置于我党的掌握之中。对此,朱德曾有过语重心长的评价:大革命时期,周恩来等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②。历史将永远铭记周恩来在创建人民军队中的作用和功绩。

二、周恩来亲自领导打响了武装 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国共两党的合作,促进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引起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的恐惧。从1926年3月起,蒋介石发动了一系列危害革命的活动。对此,周恩来进行了抵制,并提醒共产党人在精神和行动上应当有所准备。但由于陈独秀占统治地位的

① 袁小伦:《周恩来与蒋介石》,第60页。

②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6页。

党中央，唯恐同国民党新右派的斗争会导致国共合作破裂，主张单方面退让，企图缓和矛盾，并指责周恩来等人的意见是一个“极大的、极危险的根本错误”，“将发生极大的恶影响”^①。

1927年3月，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蒋介石进入上海，使得局势陡然逆转。3月30日，周恩来在党的特别会议上揭露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指出蒋介石到上海准备打击的目标有四个：中国共产党、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和国民党左派。他指示：“如果右派军队要来缴械，我们绝对武装抵抗”，“要随时随地准备与右派军队发生战斗”^②。他一直留在闸北总指挥部，组织整编工人武装，扩大纠察队，命令各路纠察队通宵值班，加紧训练和戒备，以防不测。

当时，由于处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缺乏处理复杂问题的足够经验，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之下，因而从思想上、行动上都远远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其中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毛泽东后来指出的：“在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我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③周恩来虽然早已洞察蒋介石包藏的祸心，也作了一定的斗争准备，并向中共中央提出东征讨蒋的建议，但未被采纳，致使革命力量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损失，33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血的教训，使我党深刻认识到创建革命军队，进行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恩来在出席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时提出了“反帝反蒋并行”的策略。此后，他在起草的致中共中央的意见书中，也建议乘蒋介石在沪立足未稳之际，“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再不前进，

①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2页。

② 袁小伦：《周恩来与蒋介石》，第7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7—1258页。

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①。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正式同共产党决裂。随即,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组织民众武装起义的新策略,决定在湘、鄂、粤、赣4省举行秋收暴动。在这次紧急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举行南昌起义的建议,并分析了起义的有利条件:驻南昌的朱培德部队,大部分在吉安、进贤一带,城内兵力单薄,而受我党影响和掌握的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等,正从武汉开到九江准备集中南昌。党中央审时度势,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并委派他担任领导武装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

周恩来遵照中央的指示,于7月下旬从武汉出发,秘密赶赴南昌。到达南昌后,他很快了解了敌我双方的情况,积极运筹起义事宜,并于7月27日成立了起义总指挥部,他委任贺龙为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

7月30日晨,正当起义按计划即将举行之际,张国焘奉党中央之命来到南昌,召集周恩来、叶挺、谭平山等举行会议。在会上,张国焘曲解中央决定和国际电文,说如无把握,就不能起义。周恩来等与之进行了辩论。周恩来明确表示:还是干,同时告诫张说,你的意思,与中央派我来的意思不符,我辞职不干了,今天特别委员会我也不出席了^②。由于出现了争论,原定于30日起义的计划不得不推迟。

7月31日上午,起义特别委员会继续开会,张国焘列举出起义不成熟的理由后,再次坚持推迟起义。周恩来听后,气愤地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

^② 张国焘:《张国焘致电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的信》,1927年11月8日。

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罢^①。在周恩来等人的力争下,会议最终决定于8月1日凌晨4时举行起义。7月31日深夜,由于起义部队一名副营长叛变,在前委坐班的周恩来等果断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到8月1日凌晨2时。

8月1日凌晨2时,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下,由我党直接掌握下的军队2万余人,举行了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守敌3000多人,占领了南昌城。这次起义虽然没有达到挽救大革命失败的目的,但却以实际行动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同时也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共产党人不畏强暴、继续坚持革命的坚定信念和决心,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树起了一面鲜艳的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三、周恩来最早领导创立了革命 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制度

在革命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是我党在国民革命战争时期军事活动的主要内容。在我党的历史上,最早卓有成效地开展这项工作的则是周恩来。

黄埔军校作为国共合作的产物,在办学上借鉴了列宁、斯大林创建苏联红军的经验,实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的方针,学校特设党代表和政治部。政治部的第一任主任由国民党中宣部部长戴季陶担任,由于戴反对国共合作的政策,歪曲三民主义,孙中山对他甚为不满;继任邵元冲,满脑袋封建思想,根本不懂得革命的政治思想工作,因而这段时间政治部的工作成了

^① 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1927年。

摆设,使得学校的教育方针无法落实,孙中山对此忧心忡忡。为了挽救黄埔军校的政治危机,孙中山经与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商定,于1924年11月任命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受命后,雷厉风行地对军校政治工作进行革故鼎新。第一,加强了政治部的组织建设和领导力量。一方面增设机构,将“部内组织,分为指导、编纂、秘书三股”^①,分工负责,以统率全校的政治工作。一方面从毕业学生中调杨其纲、王逸常等共产党员来政治部工作,分别担任各股主任。第二,创建了一套新的政治工作制度。不仅制定了政治课程训练计划,对学生进行反帝反封建和革命纪律教育,而且发行刊物、编制歌曲、成立剧社、组织俱乐部,陶冶学生情操,提高部队军政素质。第三,建立了中共党组织。当时党组织叫中共黄埔直属支部,其主要工作是进行党的宣传工作,扩大党的影响,并做好党团员的思想工作。第四,注意发挥革命群众组织的作用。通过“火星社”、“青年军人联合会”等组织,积极宣传革命主张,传播马克思主义,团结教育广大学生。在周恩来的主持下,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卓有成效。

周恩来在东征、北伐等从事政治工作的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苏俄红军建设的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革命军队的性质、宗旨及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方针和原则等作了系统的阐述。他认为:“在军队是一种工具”,“是实现革命的先锋”,“是党的军队”^②。他指出:“要使军队成为被压迫阶级可以用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工具,就必须在进行军事教育的同时,实施政治教育,讲清中国如何受到列强压迫、军阀压迫,以及解除压迫与痛苦的途径。使每个军官士兵均能了解此理,明白士兵之打仗是为人民

① 《一年来本校政治部之概况》,《黄埔潮》第24期,1926年1月。

② 廖国良等:《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第一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而打的。这样,才能使军队成为人民的武装”^①。如此深刻、明确地阐明军队的性质、宗旨和政治工作的任务,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此外,他还强调:“在军队里做政治工作,要以身作则,严守纪律,常常表示勇敢的态度,比士兵更要勤苦”^②,明确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法。第一次东征后,周恩来在总结战时政治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又明确提出瓦解敌军、组织民众、壮大自己的三项任务,完善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内容。

可以说,周恩来在这个时期关于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实践活动和理论上的探索,不仅对于提高革命军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保证东征和北伐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来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发展有着奠基意义。如在我军建设中的党代表制度、政治委员的设立、政治机关的设置、党的组织建设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重要制度,以及“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等政治工作原则,就是对这个时期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继承和发展。对此,毛泽东曾评价道:“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③。

四、周恩来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找到了一条新的途径。但是,由于工农红军是以农民

① 袁小伦:《周恩来与蒋介石》,第22页。

②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95—9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页。

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参加红军的有受革命影响的北伐军指战员，有从国民党军队中起义或解放过来的官兵，他们必然要受到来自农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其中比较突出的表现是：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等等。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极大地妨碍了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在农村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如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工农红军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根本性的问题。

1928年8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生“八月失败”后，红军内部出现了“红旗到底打多久”的疑问。党的主要负责人头脑中仍充满着以城市为中心的观念，共产国际也要求红军分散。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从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出发，认为中国革命有割据的可能，提出“对于南中国的几省中，在目前就应该开始割据局面的准备，因为这与全国的准备工作是有极大的关连”^①。1929年4月，当中央起草要求朱、毛离开红军的指示时，周恩来指出，朱、毛出来问题，原则上是如此，但现在实际情形要写得活一些。最后，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调朱毛出来的事，实际上不了了之。

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当时是全国红军中一支最重要的部队。1929年6月，毛泽东打算利用打下福建龙岩城这个比较安定的环境，召开红四军党的第7次代表大会，总结建军以来的经验，纠正红军内的各种错误思想。因为条件不成熟，这次大会在有关党的领导、思想政治工作、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任务等问题上发生了争论。由于一些受旧军队影响较深的同志，坚持旧军队的一套经验；而有些从苏联回来的同志，又主张照搬苏联军队的一套经验，前委领导之间意见也不一致，因而争论的问题未能得到解决。红四军前委原系中央指定，此次大会在中央没有指示改组前委的

^① 周恩来在中共六大政治报告讨论会上的发言记录，1928年6月27日。

情况下,改选了前委。经过选举,毛泽东仍为前委委员,但没有当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到闽西养病并指导地方工作,没有随军行动。由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使得这支部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这时的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到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并作报告。当时担任中央军事部部长并主持军事委员会工作的周恩来,在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后,联系红军建设的经验,针对红四军存在的问题,作了十分详尽的指示,并指出: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应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接受。

陈毅按照周恩来的谈话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经周恩来审定后,带回红四军。这封指示信,就是9月28日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这封信,对国内形势、红军任务、红军发展方向与战略、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与经济、红军中党的工作等重大问题,做了全面阐述。指示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建军问题上的正确主张和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明确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①。信中还强调指出,红四军前委要维护朱德、毛泽东在群众中的信仰,他嘱咐陈毅:“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②周恩来还要求其它地方的同志学习毛泽东开创井冈山根据地和建设红军的经验。他指出:“这里面有许多宝贵的经验”,“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的,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都要学习朱、毛红军的经验。”^③

周恩来如此鲜明地肯定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此之前,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页。

② 《周恩来传》(1898—1949),第195页。

③ 转引自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97页。

在党内高层领导人中是没有先例的。众所周知，在党的六大以前，党的主要负责人为陈独秀和瞿秋白，他们一个推行右倾投降主义，一个推行“左”倾盲动主义。这两种错误的路线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都是格格不入的。党的六大以后，党中央主要负责人是向忠发，由于缺乏组织领导能力，在中央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六大以后的两年，党中央的工作实际上主要由周恩来主持。这个时期正是中国革命从遭受严重挫折走向复兴的关键时期，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逐步发展形成的重要时期。是周恩来在斗争实践中认识了毛泽东杰出的军事才干，在关键时刻支持了毛泽东。又例如在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宁都会议，集中火力批评了毛泽东，并剥夺了他的军权。周恩来认为中央局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因而在处理毛泽东的问题上采取了温和的态度。为此，中央局批评他：“不给毛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我们认为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①。几十年后毛泽东回忆说：“宁都会议期间，我的批评者们都想开除我，但是周……不同意。”^②

在以后几十年的峥嵘岁月中，特别是党的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始终如一地支持毛泽东，在实现共同理想的奋斗中，两位伟人肝胆相照，结下了情同手足的革命友谊。韩素音曾感叹道：“周恩来发现了毛泽东。他发现了一个高瞻远瞩的天才，在这个天才的身上，他倾注了自己对中国深挚的感情。”^③

①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34页。

② 转引自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第108页。

③ 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60页。

周恩来与 1946 年的国共谈判

陈 浩

周恩来在 1947 年 11 月 10 日转战陕北时，嘱将 1946 年“政协及三人会议的谈判材料，由文晋、陈浩两同志整理出一个有系统的档案为最好，……如章、陈两同志在整理时有意见提出，作为经验心得，写成笔记或讨论记录，不怕提反面意见，这对于今后的国际斗争也许会有裨益。”^①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就是遵照这个嘱咐于 1996 年 4 月编辑出版的。我这份学习笔记也是遵照这个指示，试从周恩来怎样进行谈判取得胜利这个角度来写，希能将其精彩之处存真万一。

国共谈判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一种特殊的斗争形式，从 1936 年西安事变开始，经历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直到 1946 年底共进行了 10 年之久。1945 年日本投降后，消极抗战的蒋介石却要从峨嵋山上“下山摘桃”，不惜用内战来来夺取中国人民八年抗战胜利的果实。于是民族矛盾解决之后，阶级矛盾又突出为主要矛盾：内战与反内战的激烈斗争，中国两种前途的决战又开始了。

当时，促成国共谈判的国内外形势是：人民强烈要求和平民主；而蒋介石也需要时间来做内战的准备；国际上美、苏、英等国不希望中国内战。在这样的国内外形势之下，1945 年 8 月，蒋介石不得不邀请毛主席来重庆谈判，不得不同意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会谈纪要》中，他承认了共产党的地

^①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版，第 403—404 页。

位；承认了各党派中的地位；决定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且承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地位和数目。但是蒋拒不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民主政权；不许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受降。这就埋下以后蒋继续在各地打内战、破坏国共谈判的根源。

—

1945年10月11日毛主席返回延安，周恩来等留下继续进行谈判，直到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执意召开一党包办的伪“国大”，使谈判破裂。11月19日周恩来返回延安。

这一年的谈判可分3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5.10—1946.1)是国共直接谈判，没有结果，打了3个月内战。

《会谈纪要》签订后不久，蒋就密令国民党军队沿着平汉、同蒲、正太、平绥、津浦5条铁路线，向解放区进攻，企图割裂华北解放区，抢占平津，进而夺取东北。当即遭到上党战役、邯郸战役等沉重的打击，证明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于是又重新唱起“和平”高调，继续进行谈判。这时美国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处”，开始插手中国事务。

第二阶段(1946.1—1946.6)各党派协商，得到结果：签订了一月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二月整军协议、三月东北停战协议。内战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了一个时期。

但是，接着蒋就在3月召开的国民党二中全会上全面破坏政协决议，发出反共叫嚣。同时，在美国第七舰队集中力量将国民党5个军的精锐部队运抵秦皇岛后，3、4、5月国民党就在东北地区大打起来，只是在占领长春后，兵力分散，才不得不提出东北6月休战。

第三阶段(1946.6—1946.11 蒋召开非法“国大”)谈判已成烟幕,实际上已开始大打,证明谈判失败。

蒋军于6月下旬围攻中原解放区,开始了全面内战。10月占领张家口。接着,蒋介石国民党向共产党提出八项条件的最后通牒,公开宣布要用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11月15日召开国民党包办的非法“国大”,使谈判完全破裂。

在这期间美国更公开援助蒋介石打内战,已经成为中国内战的制造者和鼓动者。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1年多的谈判斗争中,彻底揭露了蒋介石国民党坚持内战、独裁、卖国的反动面目,完成了教育人民的一课,使党赢得了人心,为军事上解放全中国打下了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

二

在这样情况复杂、变化多端的形势下,周恩来是怎样进行谈判斗争的?

(一)谈判的总方针。

周恩来在1945年12月5日向中央的报告中,根据他和蒋介石国民党以及方方面面长期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对形势做出了科学的辩证的分析。他首先分析了美国、苏联、国民党和各方面的态度,然后提出了今后谈判的总方针。要点如下^①:

美国的态度:抗战时是“扶蒋用共”;战后是“扶蒋压共”。支持中国统一,好便于美国取得优势或独霸。

苏联的态度:不得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方而坚守中苏条约。对

^①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13页。以下未加注的引文均引自此书。

中共的援助只能是不公开的、暗示式的。绝不愿美国军队开入东北，也不愿国民党派过多的兵驻扎长春铁路，而政治上更愿看到民主解决。

国民党的态度：蒋介石在和战之间摇摆，目前是偏于战。要蒋放弃反共思想和灭共企图而自动地做到国共亲密合作，这是不可能的。边打边谈“会成为今后相当时间的国共关系的特点”。

各方的态度：人心厌乱，兵心厌战，反内战求和平，是大众的呼声。各党派一般地倾向于开政治协商会议，可使他们取得合法地位，联合政府可使他们有份。

工商业家反内战是积极的，但不敢作左袒，尤不敢批评美国。而批评美国，文化界较勇敢些，青年自更积极，且有罢课运动。

地方实力派及杂牌部队是倾向于以内战求和平的。

我们的方针：应本着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基本方针，实行政治进攻、军事自卫的原则，确定《会谈纪要》我方提案为基本底线，来进行“边谈边打”的谈判。

反内战必须与人民争民主的运动联系起来。

我们对美国的方针是：“力求在某种程度上中立它，不挑衅”。对其错误政策必给以适当批评；对其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必给以严正抗议；对其武装进攻必给以坚决抵抗。这样，方可使其知难而退，重新考虑政策。

谈判的前途会存在着严重的复杂的斗争，一直斗争到最后。

问题的解决系于美苏的关系和力量的对比，但掌握时机，进退攻守，仍为政治战、宣传战的应注意的规律。

周恩来就是在这样的总方针指导下进行 1946 年的谈判的。

(二)高举反内战、要和平的旗帜，维护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以“和平方针为矛，坚决抵抗为盾”，进行“边谈边打”的谈判。

1946 年 1 月签订的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谈判中，坚定地贯彻党的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基本方

针，奋力争取的结果。但是，对蒋来说，由于是被迫接受的，总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推翻。周则坚持原则，百折不挠地捍卫这些协议。这些协议成了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期揭露蒋、美，和他们进行斗争的强大武器。

1、停止内战问题。停止内战，一直是1946年谈判的斗争焦点。

停止内战就是要国民党军停止侵犯解放区，保卫8年抗战中在共产党领导下从日本侵略军铁蹄下解放出来的大片国土和人民政权。这是蒋介石国民党绝对不能容忍的。周恩来说，蒋早就有意识地走向战争，但作法尚保存两面，其原因：

(1)由于我方力量强大，国方有越打越乱而且前途有垮台危险。

(2)由于民穷财尽，人民反对战争。

(3)由于国际形势不许。

周恩来提出我们的方针：应“把握住……蒋之两面派弱点，用全力打击其反动一面，使一切问题都不能模糊哄骗，要其明确地回答和解决问题，否则便扩大斗争，以影响全局”。“应据实揭露蒋之内战方针及挑战阴谋，放手动员群众，坚决准备自卫并实行还击，但同时也应避免挑战，不受挑衅”。

周恩来在各种场合反复申明中共关于停止内战的根本立场，主要有4点：

(1)“首先要做到停战，这是全国全世界人民都在等待的”，“只有停止冲突后一切才好谈”，“停止冲突应是全国性的，不管任何区域、任何部队，都应停战”。

(2)停战应是无条件的，“我们对停战从未要过先决条件，无论在何种情形下，我们从未要条件，无论我们是取得了或是失去了一些城市”。

(3)“我们衷心主张用和平协商的办法解决问题，以求中国之民主、安全与统一”。

(4)“我们从不拒绝谈”，“我们是要解决问题的”。

周恩来在多次谈判中，在记者招待会上，据大量事实揭露蒋的内战方针及挑战阴谋。例如：

(1)1月10日停战令应在全国有效，1月东北还有冲突，美方和中共都主张派遣小组到东北去，但国民党政府始终不愿派遣小组，不愿在东北停战。因之，停战协定，首先为国民党方面所破坏。

(2)停止冲突应是全国性的，可是国民党政府“只承认了东江抗日纵队，而与东江纵队同样坚持八年抗战的海南岛中共部队仍未被承认，这是没有理由的。我们甚至对政府收编的毒害了中国人民的伪军，都停战了，而国民党政府对抗战部队竟不承认，还在进攻，这完全违背停战协定”。

(3)“国民党当局正借口‘接收’领土主权，在东北进行对中共军队的公开战争。东北民主联军不得不起而自卫，抵抗那些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

(4)8月27日周致电中央说：“马上次由庐回京时曾云，蒋允先谈改组政府事然后停战。我当时即知其为拖中大打为取得美国更多援助，故一方告马、司欲谈组府必须蒋承认谈商后停战，放弃五项要求及按政协组府；另一方揭穿蒋之欺骗，反对美之援助。”

10月1日周恩来在上海对中外记者谈话时，针对蒋美不敢承认全国内战的阴谋，举出大量事实，指出“现在，国民党军队动员了二〇八个师，即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兵力来进攻解放区，出动飞机八百多架轰炸解放区，就是沿海的军舰，也在许多海口巡弋，并担任运输。中国政府在抗日战场上，从来没有用过这样大的兵力。……这样大规模的残酷的内战，怎能还说规模不算大，甚至说中国并没有内战以欺瞒国内外的人民？”

接着，关于内战责任应由谁负问题，周举出几个关键问题，有力地证明了“全面内战的一切责任，都应由国民党政府担负”。

2、东北问题。东北地区一直是蒋介石国民党打算夺取并抢占

的重要战略目标。美国从遏制苏联势力的战略出发，也一直期望蒋能够独占东北。于是，国民党精锐部队被美帮助运送到东北后，就随着苏军的撤退，进驻沈阳，随后，即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

2月24日周恩来指出：“东北问题仍将为斗争焦点”。6月20日又分析说：蒋“要把我们赶出铁路线和大城市以外，分成一块一块，包围起来，将来第二步再消灭我们。”

其实，东北地区在抗战胜利前，并没有国民党军队，只有中共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而蒋介石要独占东北，便扬言：东北只有“土匪”，所以那里只有“剿匪”，并无调处。他去那里是按照中苏条约，要从苏军手中接收被日本侵占的城市、铁路线和大片土地。

周恩来首先从东北的历史事实来批驳国民党的谎言。4月4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质问：“究竟是谁把东北断送了？谁又在东北组织了游击队，发展为抗日联军，坚持了十四年的抗日战争？谁在抗战中主张恢复七七事变时的国土就够了？谁又坚决主张打到鸭绿江边？中共在东北的抗战，连日寇也承认。八路军二十七年（即1938年——引者注）打到热河，二十八年（即1939年——引者注）打进辽宁，创造了冀热辽军区，谁能抹杀这许多事实？谁还能说十四年来中共未在东北抗过日？未组织过抗日联军？没有共产党员被敌人捕杀？甚至敌人投降前，东北并无中共部队？这些问题，社会上尤其是东北人民，自会回答。”

关于民主政权问题，周说，“伪满政权被推翻后，中共号召人民起来，组织民主的地方自治政府，自己管理自己，这有什么不好？……对于现在这些推翻伪满政权的临时性的地方民主政府，应奖励之不暇，有何非法可言？难道维持伪满政权才算合法么？”

周恩来还针对国民党的阴谋说：“如说解决东北问题，必先外交而后内政，必先军事而后政治，那就是有一种想法，想以外制内，以军压政，拿武力打下东北，再谈政治。这将不知何年何月！东北人民其何以堪！”

接着,周恩来提出:“在东北也要停止一切军事冲突”,要把停战协定用于东北。要把政协一切决议,尤其是和平建国纲领,适用于东北。不能把东北特殊化,造成独霸东北的局面。

实际上在东北大打中,没有美国的积极帮助和火上加油,国民党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周就从这方面首先抓住美国无限制地帮助蒋向东北运兵的问题,一再批评和警告美国是在“助长东北内战的危机。”

3、围攻中原解放区问题。蒋介石国民党早就选中了地处豫、鄂两省交界狭小地带、孤悬在那里的以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做为进攻的目标。本来,国共双方于1945年10月即已达成协议,共产党把部队撤出该地区。但是,国民党方面却偷偷地调集了30万大军进行包围。

5月3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从重庆飞抵南京的当晚,就在记者招待会上驳斥国民党当局散布的“中原无战事”的谎言,揭露出这个阴谋,要求首先协议停止中原内战,以免牵动全局,发展成为全面内战。

5月4日周恩来又告马:延安得自极机密方面的消息,“政府将对中原军区(即新四军五师——引者注)发动全面攻势,”“计划在五月四日至五月九日间发动挑衅”。周恩来建议三人小组去看看,“最好能自行去阻止”。在周恩来的坚持下,美方和国民党方面被迫接受这个建议,于5月5日组成三人小组去中原解放区视察,8日抵宣化店。当晚周恩来即听取了李先念等五师负责人的汇报,向他们传达了中央关于五师战略转移的决定,说:“你们拖住了几十万蒋军,有力地支援了东北战场,也配合了华北战场。”^①并连夜与他们一起研究制定了突围方案。三人小组于10日签订了停止中

^①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64页。

原内战的协议。这样,就打乱了国民党的部署,使中原部队赢得了一个多月准备突围的宝贵时间,并趁机合法转移出两千多伤病员到太行解放区。

6月26日国民党军开始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军即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和周恩来在宣化店时一起研究的作战部署,以主力向西,分三路全部突出重围。

4、进攻张家口问题。进攻张家口是蒋发动内战的一个严重步骤,它表明国民党已决心最后破裂。于是周恩来离开南京去上海。10月1日周恩来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讲:“全国内战越打越大,现已打到察哈尔大门。……南京中共代表团已向蒋主席提出了最严重的抗议,我个人已向马歇尔将军提出备忘录,……这一切抗议和备忘录都指出:如果政府军不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军事进攻,我们便认为蒋主席决心破裂,最后放弃和平谈判,一切严重的后果和责任,都应由国民党政府负之。”最后严正宣告:“如果国民党政府不改悔,仍继续向张家口进攻,如果美国政府仍旧公开地或隐蔽地帮助国民党政府打仗,继续保留军队驻华,那么,中国的内战是无法停止的,中国必将是一个全面破裂的局面。”

10月11日国民党打下张家口,蒋即下令召开“国大”,并提出八项条件,而且要挟中共提出参加“国大”的代表名单。

10月26日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时,严厉指责蒋的八条是“哀的美敦书”,“全面破裂的局面已定,因这是蒋造成的”。“他们认为,占了几个城市已有很大胜利。其实,共产党是从不屈服的。一九二七年时我们一支枪也没有,都未屈服,何况现在。”

同一天,周恩来和民主人士谈,愤怒地说,我们要回延安,从此以后不再谈了。蒋和我们打了十几年的交道,并不了解共产党。共产党从无到有,从最底层翻上来,哪怕国民党的压力?怕压力,当初

就不会有共产党！^①

中国共产党断然拒绝了蒋的八条。

由国民党一手把持的“国民大会”开幕了。下午，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声明，指出：一党“国大”“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同时也很快地彻底揭穿了政府当局十一月八日‘停战令’的欺骗性。……进攻解放区的血战方殷，美国政府援蒋内战的政策依然未变，假和平假民主绝对骗不了人。我们中国共产党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和平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

（三）争取团结教育“第三方面”的工作

当时的政协会议，在国共两大力量外，还有民盟、九三学社、民建、民进、青年党、民社党、社会贤达，统称“第三方面”。关于“第三方面”人士的工作，周恩来和董必武等中共负责人从抗战以来，就一直亲自出面和他们交朋友，启发他们认识蒋介石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以及假和谈、真内战的反动面目，认识中共的和平民主的方针以及解放区军事自卫原则是以人民利益为重、真诚求和平的。

1946年1月在中共、“第三方面”和全国人民奋力争取下胜利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国民大会、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这些协议虽然还不是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但它在实质上是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的否定，是得到全国人民拥护的。

但是，政协决议签订不久，国民党就背离了政协决议。周恩来在3月18日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愤慨地指出：“在政治协商会议之

^① 《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56页。

后召开的国民党二中全会，我们曾寄以很大的希望。但二中全会的结果实令人失望，因二中全会的决议动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国民党内为数不少的顽固派利用二中全会通过了很多重要的违反政协决议的议案，这不足为怪，而可怪的是这两个会议的决议既如此相反，却都是在蒋主席主持和领导之下通过的。”

政协开幕时，蒋介石曾作了保障人民权利的四项诺言，但在政协开幕后，就接连发生了沧白堂事件、校场口事件、《新华日报》和《民主报》被捣毁事件等一系列破坏政协决议，针对民主人士，镇压民主运动的暴行。中共方面立即挺身而出，愤而抗议。在并肩战斗、患难与共中，“第三方面”人士认清了共产党是他们可以依赖的挚友，有为和平民主奋斗的决心和力量。

周恩来对民主人士一向充分信任，只求大方向一致，不强求做法一律，尽可能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从不包办他们的工作。周恩来态度坦诚、热情，不苛求，不急躁，摆事实，讲道理，耐心说服。但是，对朋友的原则性错误也从不迁就。下面仅举两例加以说明：

1946年10月国民党军占了张家口，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梁漱溟等提出一个所谓的折衷方案，内容是要求双方就地停战，在当时蒋大量侵占解放区的形势下，这一就地停战方案对蒋极为有利。周恩来对此十分气愤，他说：“我们是打出来的，我们可以去打游击，你们怎么办？我们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不是多一块地方，少一块地方的问题，蒋介石要把我们打倒在地下，你们还要踩上一只脚！”^①经过周恩来等对他们的严正批评，他们都觉得错了，立即设法收回了这一方案。

11月上旬，蒋介石在即将召开一党包办的“国大”前，又耍了一个花招，单方面宣布停战。同时“加紧了对第三方面人士的逼迫”。在这种情况下，“十一月十一日，第三方面人士又背着我们给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48页。

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建议国大延至十二月一日开，还以‘弟等先交名单’为建议之第一条。”^①对此，周恩来对他们讲了一番很恳切的话，他说：“有国共谈判才产生政协，有政协才有第三方面，现在国民党要我们交名单，就是要分化中共与第三方面。昨天有人答应交名单，事前我们完全不知道。事情牵涉全体，变成中间人避着我们去跳火坑，违背了政协决议。……我们必须坚持政协决议。国民党的用心很清楚，请大家进国大，为的是在脸上搽粉，而把中共踢开。我们共事了多年，现在临别了，我们对将继续挨打无所畏惧，我们党就是在围剿压迫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我们有武装，可以同国民党周旋，而诸位将难免受压迫，希望有一天仍能在一起为和平民主奋斗。……蒋介石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与共同决议，对这个独裁者，我们是要同他斗争到底的。”^②这样，终于劝阻了民盟。11月14日民盟主席张澜发表谈话，表示“民盟决不参加一党国大。”^③这就孤立了国民党，充分暴露了“国大”完全是一党包办的实质。这也使民盟在群众中赢得了政治声誉。

(四)谈判中对美策略

马歇尔初到中国时，周恩来即向他表示：“我们欢迎外来的友谊协助”，“同时也希望盟国能恪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诺言”。

马歇尔本质上是助蒋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某种程度上中立它”是有可能的，我们可以“利用其客观上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约束国民党的一面”^④力求其少偏袒蒋一些。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马歇尔初来时，为了显示公正，提出三方一致协议的办法，这对双方是公正的，使中共在与马歇尔进行调处的活动中，与国民党处于平等地位，对我们是有利的。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650页。

② 同上，第651页。

③ 1946年11月15日《新华日报》。

④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642页。

随着马歇尔越来越公开露骨地援助国民党进行内战，周恩来在谈判中就采取了相应的不同的对策，先是“争取为主，批评为辅”，然后是“又批评又拉”，最后是严正抗议为主，但仍留有余地，不与马歇尔的关系弄僵。

4月周恩来向马歇尔呼吁，希望他仍能以过去处理中国问题的公正精神采取必要的步骤。周恩来给马的备忘录中说：“在执行小组中发生美方人员在处理问题时有不公正的事实……我甚表遗憾。”

后来随着马歇尔袒蒋扶蒋程度逐步加深，周恩来对马歇尔加重了批评的分量，如6月3日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时指出，美国政府对华有“二重政策”：一面表示要赞助中国的和平民主，一面却又在帮助国民党进行内战；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有“比较黯淡的一方面”。“美国是偏于国民党，有助长国民党内战的趋势，至少在东北如此。”

6月20日周恩来致中央的电报说：“马仍在想打开避免谈判破裂的出路。我仍采取又批评又拉的办法”。“决今上午再与马谈一次，以拉其做到停战和休战延长。”周恩来并建议中央“如有针锋相对的批评，请暂保留对马的部分。”

安平事件发生后，8月9日周恩来对马歇尔说：美国帮助国民党打我们……我们和美国的关系正处在一个歧路上……希望仍能“按照杜鲁门的声明走下去……这是最正确的道路……我以为你和司徒大使应有公道的主张，对中美人民好有交代”。

当司徒威胁说，他只能退出谈判。周恩来说：“美既为调解人，应主持公正，判明内战责任在蒋，好向美政府及世界报告，不能形式上不管，实际上驻兵、助械、借款，仍是参加内战，故马、司不能卸脱责任。”

8月间，美国准备将价值20亿美元的军用剩余物资以低价售给国民党政府。获此消息后，8月26日周恩来受命致电马歇尔，向

美国政府提出抗议，指出：“在此时交割剩余物资实等于火上加油”。但是这批买卖竟不顾中国共产党的抗议而于8月31日签订协议。9月14日周恩来致马备忘录说：余今复受命代表中国共产党及解放区一亿四千万人，对于此项交易，经过阁下向美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周恩来指出：“这种火上加油的办法，不能不使中国人民感到极大的不安与愤怒。……并要求美国政府在中国和平团结及联合政府未实现时，将该约所列之物资、船舶等全部冻结。”

10月1日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讲了一大段话，尖锐地批评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他说：“在整个谈判中，我们认为杜鲁门总统去年十二月十五日的声明是好的，马歇尔将军根据这个声明在第一阶段的调处是有成就的，他促成了停战协定、整军方案及恢复交通协议，并促使政协成功。但马歇尔将军回国后再次来华，情况就变了。首先在东北停战问题上，美方不是站在调解的地位，而是帮助国民党运军队运军火，大打东北，压迫中共。六月后，关内大打，情形更坏，美国政府以海军船只送给国民党政府，向国民党提议对华租借法案延长十年，以八亿二千五百万美元的美军剩余物资转让给国民党政府，这都是更露骨的帮助国民党进行大规模的全面内战。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国民党要进行像今天这样大规模的内战，是不可能的。”然后，他列举了大量事实说：“这一切都证明没有美国的帮助，国民党军队连动都不能动，更没有可能打这样大的内战。”“还有人说，美国军队驻在中国是为了中国和平。我看，相反的是摧毁中国和平。”最后提出：“必须立即撤退驻华美军，停止任何片面的援助，以便有助于制止中国内战。否则，表面上是调解，实际上是倒在一方，帮助国民党政府大打内战，必使马歇尔将军、司徒大使陷于今天这样困难的尴尬地位。撤军、停援，不仅中国人民如此要求，美国人民也在这样要求。解决这个问题，就落在美国政府及其代表的身上。”

后来，由于国民党侵占张家口，召开一党的“国大”，终致谈判

破裂。

12月28日周恩来在延安答新华社记者问时更进一步指出：“美国政府这种露骨的援蒋内战政策，其目的在想压服中国人民将中国完全变成美国附庸。我们从最近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航空协定’及美国军事顾问团与各种军事训练的协定看来，即可证明国民党政府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给美帝国主义的行为，是与美国政府援蒋内战政策相适应的。不管杜鲁门如何强辩，说美国政府‘避免牵入中国内争’，实际它已是中国内战的制造者与鼓舞者。”

1947年1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代表声援全国学生爱国运动及纪念政治协商会议一周年大会上发表《评马歇尔离华声明》的演说中说：“一年前，全中国人民都在欢迎杜鲁门总统的对华声明与马歇尔将军的来华调解，但是为时不久，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已原形毕露，蒋介石政府的卖国外交亦暴露无遗。于是全中国各大城市，从几十万学生一直到广大市民，都喊出‘美军退出中国’、‘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反对奴才外交’、‘反对中美商约’等口号”。

以上就是在这一年的谈判中，周恩来对美方采取的策略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步变化的过程。

三

南京谈判是重庆谈判的继续。从抗日战争胜利，1945年8月毛主席偕同周恩来、王若飞亲赴重庆谈判，直到1946年11月谈判破裂，周恩来返回延安，这一年多的谈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达到了教育人民的目的，赢得了人心。经过这一年多的谈判斗争，保卫了八年抗战取得的成果，“使党的和平民主方针与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方针被群众所认识”。也揭露出美援蒋内战，企图殖

民地化中国的帝国主义实质,打破了人们对美的幻想,教育了人民,赢得了人心,掌握了政治主动权。同时,也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2、“争取了朋友”,教育、团结了民主党派、中间分子,促使民盟不参加“国大”,孤立了国民党,扩大了反蒋反美的统一战线,使他们越来越明确地跟着共产党走,也为解放后建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打下了基础。

3、谈判斗争紧密配合了军事自卫斗争。周恩来领导军事斗争几十年,有着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与国民党政府也打过数年交道,有着丰富的谈判斗争经验。这种经历使他能够把军事斗争和谈判斗争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斗争艺术,对革命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4、取得了和美斗争的初步经验。周恩来与美国高级官员马歇尔正式打交道,谈判接触近一年,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外交活动的一次前哨战。《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和致马歇尔备忘录一百多篇文献,就是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同美方进行机智、果敢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宝贵记录。通过谈判斗争以及三人小组、军调部、执行小组与美方人员打交道的的工作,我方取得了初步的外交工作经验,也锻炼出一批外交工作干部,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打下了基础。

周恩来的非洲十国之行

周 溢 潢

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4日，周恩来总理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十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邀请，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对这些国家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非洲，是当时中国外交的一次战略行动，其目的在于打破美苏对我国的孤立，大力支持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增进同非洲国家之间的友谊，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发展反对美苏两霸的统一战线，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1963年12月14日中午，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一行抵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并于15日下午和17日下午与纳赛尔总统进行了两次会谈。会谈中，纳赛尔回顾了阿拉伯国家的历史，介绍了阿联、苏丹、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的概况，并着重谈了巴勒斯坦、以色列问题。

听完纳赛尔总统的介绍，周总理说：“感谢总统阁下两次向我介绍阿拉伯各国和非洲有关国家的情况，使我们得到新的知识，增加了新的了解。可以说，从万隆会议那时起，我们才对阿拉伯国家情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开始注意了解。

“万隆会议后不久的苏伊士运河斗争，引起中国人民对阿拉伯人民的注意和钦佩。其次是阿尔及利亚的武装斗争，使我们有机会向人民介绍阿拉伯情况。以后，中国同阿拉伯各国政府和人民之间往来就日益频繁，我们同阿拉伯国家建交的也多起来了。再加上亚非团结组织的推动，中国同阿拉伯各国关系日益发展。但是抱歉得

很,尽管我们八年前就有了关系,但我国政府负责人到西亚、非洲来访问,还是这一次才开始。可以说是比较晚的。我们希望这次访问能成为一个新的转折点。我们对总统阁下所介绍的情况甚感兴趣。通过我们的实际接触加上总统阁下的介绍,使我们对这一地区有进一步的了解。

“同总统阁下在万隆会谈后,我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和方针,一直坚持以下几点:

一、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

二、支持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中立的不结盟政策。

三、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

四、支持阿拉伯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

五、主张阿拉伯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一切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

“以上五点,是以我们在万隆会议以前所倡议的五项原则为指导的,也就是著名的‘潘查希拉’。它的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后来在万隆会议宣言中被采纳了。”

接着,两位领导人就不结盟会议和第二次亚非会议交换了看法。

19日下午5时半至10时,周恩来总理与纳赛尔总统举行了第三次会谈。周总理着重谈了台湾问题。他说,1949年下半年,美国总统杜鲁门曾经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蒋介石同中国大陆之间打的是内战,美国不加干涉。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乘机用海军舰队占领了台湾,把台湾变成它的保护地。这说明,在美国参加朝鲜战争后,占领台湾是美国的一个预谋。朝鲜停战后,美国第七舰队一直留在台湾海峡不走,霸占着台湾。美国在靠近新中国的地

方,制造台湾海峡、南朝鲜和印度支那三个紧张地区,实行反华。1954年下半年,美国还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国家包围和对付中国,对中国形成半月形的包围圈。此外,两国领导人还就国际形势和东南亚形势以及中、阿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

12月21日,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开罗飞往阿尔及利亚,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首都阿尔及尔从机场到人民宫的20公里长的道路两旁,30万群众夹道热烈欢迎中国客人,整个城市回荡着响亮的欢呼声和阿尔及利亚妇女以传统方式欢迎贵宾的“哟—哟—哟……”的欢呼声。

22日、23日、24日下午和26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和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举行了四次会谈。

前两次会谈中,本·贝拉总统详细叙述了阿尔及利亚革命发展过程,着重谈了阿尔及利亚独立后的形势和政策。他说,1962年7月1日,阿尔及利亚实现了独立。一年多来,我们进行了阿革命的主要任务,土地改革。把270万公顷土地交给劳动者农民。其他各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在工业、商业方面把一些主要的企业国有化、把它们交给工人自给管理。对外方面,我们奉行和平政策,但认为必须先消灭殖民主义。尽管我们还有财经困难,我们支持解放斗争。在亚的斯亚贝巴会议上建立了协调委员会,我们提供了一亿旧法郎的财政援助。同时,我们也负责培养了近千名非洲的军官,这是由国家人民军负责的,这一千人有的已回去,有的还在培养。许多解放运动在阿尔及尔有代表处。例如,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这里设有代表处。我们对越南南方人民的斗争的支持是明确的。我们给安哥拉解放运动以武器、物资和财政援助。

第三次会谈中,周恩来总理高度评价了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革命战争胜利的意义,称它“是继中国和古巴革命后,60年代的伟大事件,也可以说是奇迹”。最后一次会谈中,周总理介绍了我国国内形势,然后谈了中美关系、中印关系以及不结盟和亚非国家会议

问题。最后谈到中阿两国关系，周总理指出，两国关系的发展有几个问题：

“（1）军事问题。上次答应给一批军援并已签订协定，国内在我出来时告诉我，在一、二月内即可运来，第一批二个星期后即可运到。这个援助很有限，但这是第一次援助。昨晚我又谈到，如果你们还有新困难，我们还可以尽可能帮助。我们也很愿意接受你们派军事人员去中国训练。

“（2）经济合作，金额已定，项目还未定下来。我建议你们派出一个经济代表团去中国考察，看看我们的重、轻、化等工业，可以发现哪一些是你们真正需要的，又有原料，哪一些是你们短少的，等等。这样援助的项目就可更广一些，阿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就可更高。或者在中国就地确定项目，或者回来报告后再定。

“（3）我们曾同农业部长谈起，可派个考察团去中国考察，看看哪些作物对你们合适的，如茶叶、大米和其他。我们可帮助试种，如有效，再扩大。

“（4）贸易需要发展，但哪些中国商品是你们的确需要，而别的国家又不能供应或价格较高的，如何选择？我们每年在广州举行两次出口商品展览会，明年4月就要举行一次，建议你们派个贸易代表团去参加，看看哪些是对你们合适的商品。当场成交也可以。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你们这里进口，可一起谈。”

对此，本·贝拉总统深表感谢，并说：“我希望1964年能去中国访问。”

周总理说：“希望不仅总统能访问中国，也希望其他兄弟到中国去。中国的其他兄弟也要来，陈元帅已经发生兴趣，想再来。

本·贝拉高兴地说：“欢迎。”

陈毅说：“是呀，我希望再来，少一点仪式，到处走一走，到沙漠去看看，我都很有兴趣。”

周总理又说：“他的夫人也很热情，可惜你们很多兄弟还没有

夫人,她来不方便。”

本·贝拉说:“她可以来,那时我已经结婚了。这还可以促进我早些结婚。”

周恩来说:“那好,公事私事都可促进。”

会谈在双方领导人亲切诚挚友好的笑声中结束。

12月27日,周总理一行飞抵摩洛哥访问。28日上午、下午,周恩来与哈桑二世国王连续举行了会谈,双方就二次亚非会议、二次不结盟会议、中摩两国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2月29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前往王宫向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告别。国王向周总理赠送了一把宝剑,宝剑的剑鞘镶有闪闪发光的宝石。哈桑二世告诉周总理说,这把宝剑曾经在过去困难的时刻帮助过我们。哈桑二世还向陈毅副总理赠送了一把短剑。

1964年1月9日,周恩来总理抵达突尼斯,并于当天下午同布尔吉巴总统在总统府迦太基宫举行了第一次会谈。由于当时中国和突尼斯还没有建交,布尔吉巴对中国的情况和中国的政策还不太了解,因此在会谈中出现了意见分歧。

布尔吉巴说:“我现在要向您提出一个任何国家领导人因礼貌关系不会向您提出的问题。中国政府使非洲国家感到吃惊的,不是它们反对美国的政策,是你们自知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竟然对第三世界的印度采取武力来解决边境问题,侵占印度的领土。

“另外还有莫斯科三国条约问题,这个条约使要求和平的人民产生了小小的希望,而中国竟然反对,这也使人感到吃惊。我们是尊重中国的,因此中国的态度使我们感到不安,特别是因为敌人极力宣传中国要战争,要使用核武器。我相信,在联合国有许多国家想投人民中国的赞成票,只是因为他们对中国到底有些什么打算有疑惧,所以不敢投赞成票。中国表现自己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反对其他的强国,这使许多国家不敢和中国一道走。我们欢迎您开在开罗、阿尔及尔及拉巴特的讲话,因为您表

现得同我们原来了解的中国的态度有些不同。但是不应该使人们感到你们对非洲国家用的是一种语言，到阿尔巴尼亚用的是另一种语言。不应使人们感到你们不严肃。希望中国能够考虑人们对中国的疑惧情绪，改变一下情况，不要给人们一种印象，好像中国是孤立的和好战的，不要抵触世界人民要求和平合作的心情，这样中国就会获得世界人民的支持。”

周总理说：“谢谢您把这种想法告诉我，但是我也要直率地回答您，因为事实不是那么简单。中国的政策是一贯的，我们出国访问，也从未在态度上表现两样。我们愿意同所有的和平友好相待的国家友好。中国从来没有发动战争侵占别人的领土，更没有这个动机。但是中国有一个不幸的遭遇，即她一直被置于联合国之外，因此没有可能在联合国的讲坛上解释自己的政策。同时，中国长期遭到封锁，使中国的实际情况很难为外界所知。如果总统感到中国不严肃，是不是指的对三个国家的态度？我先说第一个国家，美国。美国历来敌视中国，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在联合国指挥其他国家不承认代表六亿七千万中国人的新中国，继续使已被中国人民唾弃的蒋介石占据安理会的席位。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在万隆会议之后一直主张和平谈判。从1955年开始在日内瓦举行中美会谈，一直到现在，仍在华沙继续会谈，虽然未得到什么结果，中国却一直避免用武力解决中美争端。而美国却动用全国的力量和宣传机器，诬蔑、敌视和攻击中国。您要是处在中国的境地，恐怕也不得不采取中国现在对美国的政策。我们这次到非洲是为了寻求友谊与合作。但是为了不使我们访问的非洲国家为难，我们在联合公报中没有强调反对美国。这并不是说，我们在会谈中没有把美国敌视中国的情况告诉非洲的朋友们。我们在会谈中都讲得很清楚。美国记者在开罗向我提出问题，我也做了严肃的回答。阿尔巴尼亚是受美国欺压的国家，反对美帝国主义对阿尔巴尼亚并不造成任何困难，所以我在那里更多强调反美，就好

像我在北京时强调反美一样。

“第二是印度。不是我们侵占印度的领土，而是印度侵占我们的领土。我在1962年11月致各国首脑的公开信很详细地讲述了中印边界冲突的情况。您也收到了这封信。中印边界问题是英帝国主义侵占印度时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边界问题复杂在两点上。东段是英国麦克马洪和当时西藏地方政府达成的秘密协定规定的边界线。中国历届政府都未承认过。英军也从未到达这个地方。只是印度在独立后才派军队进驻这个地方。我国政府不承认这条边界线，主张谈判和平解决争端，同时我们也从未越过这个边界线。西段边界有传统习惯线。印度现在硬说阿克赛钦地区是印度领土。但是她历来都未管辖过这个地区。新中国接管了旧中国对这个地区的管辖，修了一条从新疆通往西藏的公路，并派了边防人员驻扎该地。印度在1958年前从未提出过这个问题，忽然在1959年就这个地区提出领土要求。我们说我们愿意和平解决。在1960年我四次到新德里会见尼赫鲁总理，主张在维持现状的情况下进行和平谈判。但尼赫鲁一再拒绝谈判。1960年以后，情况恶化了，印度在1961年从西段边界入侵，占据了43个据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不得不派军队进行监视，保证我们的安宁。1962年印度又从东段边界越过麦克马洪线。那时正值老挝问题日内瓦会议，陈毅外长和梅农会了面，提出了由双方发表关于中印即将开始谈判的公报。但印度不干。梅农说必须由中国事先同意把那些领土交还印度才举行谈判。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种先决条件。我从北京又三次致电尼赫鲁总理，提出在不动现状的情况下进行无条件谈判。当时的情况对印度是有利的。因为她已占领了我国的一部分领土。但是尼赫鲁却在国内宣布一定要把中国军队全部赶掉，并动员了全国的力量，说要组织新的军队。印度为何要拒绝谈判？那就是为了能够得到外援并在国内镇压进步力量。”

布尔吉巴问：“中国为什么不接受科伦坡六国的建议？尼赫鲁

要求的是中国接受这些建议。”

周恩来说：“我们在实际行动中已超过了六国建议的主张。我们在中西段都主动后退了 20 公里，使中印双方脱离了接触。我并提出以六国建议为基础进行谈判，如果尼赫鲁感到来北京不方便，我也可以再到新德里去。可是印度却在国内掀起了反华的歇斯底里，制造战争空气。您可以到中国去看看，在中国没有任何敌视印度的歇斯底里。科伦坡六国都承认这点。六点建议中只有第三条中的第二款我们不能同意，因为其中主张在西段争议地区双方派民政人员去，而我们已从该地区撤退 20 公里，使该地区成为无人地区，这样可以避免双方接触。如果双方再派民政人员去，势必容易再引起冲突。六国也同意我的意见。印度一定要中国接受印度对六国建议的解释，这是不可能的。六国建议不是仲裁。我们认为在六国建议基础上进行谈判，印度可以在会议桌上提出任何建议和主张。阿联萨布里先生前些时访问中国时，我已同他讲得很清楚。他也同意我的意见。他说他去印度时要说服尼赫鲁谈判。但他去印度后，尼赫鲁还是拒绝谈判，说要等待时机成熟时才能谈判。萨布里问他何时才算时机成熟，尼赫鲁说要再等三年。萨布里先生告诉我，这使他非常担心，因为三年的时间内，不知形势要发展到什么情况。我这次到开罗时，纳赛尔总统也承认尼赫鲁不愿意谈判。我可以告诉总统阁下，中印边界的形势现在已经缓和下来了，而如果印度再进攻，我们也暂时不回击。我们先把情况报告给六国。”

1 月 10 日上午，周恩来在第二次会谈中回答了布尔吉巴提出的莫斯科条约问题。他说：“莫斯科条约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条约的本身，一个是世界各国人民要求减少核战争的威胁，这是两回事，应该予以分开。亚的斯亚贝巴会议在公报中提出成立非洲非核区的主张，我们是支持的。应该由大国保证不在非洲使用、输入和试验核子武器。但是莫斯科条约却不能减少核战争威胁。就在条约

签字后不久，美国进行了地下核试验，美国当权人士自己也承认，美国目前需要的不是进行大气层的试验，而是进行地下核试验，因为这更有利于他们发展战术核武器。这个条约毫不禁止美国向其他国家扩散核武器。事实上，美国已经在和西德讨论成立多边核力量的问题，并且和日本讨论派原子炮和原子潜艇到日本去的问题。美国的军费在不断增加。美国如果有诚意，为什么不先保证非洲成为无核区作为第一步？所以说三国条约没有减少核战争威胁。核战争威胁来自哪里？中国没有核武器。这种威胁显然不是来自中国，只能说三国条约是对世界人民的骗局。”

布尔吉巴说：“说条约是一个骗局太重了。但是条约的确没有解决全部问题，因为还在进行核试验，核武器还未销毁。不过我认为应承认条约是向前迈进了一步。今后以条约为起点可以做更多的努力。”

周恩来坦然地说：“将来事实会证明我们的看法。”

布尔吉巴说：“是的，让历史去证明吧。”

周恩来说：“我们这次访非是为了寻求友谊与合作，我们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愿意和突尼斯发展友好关系。”

布尔吉巴表示赞同：“是的，大的国际政治问题暂且放一边，将来我们建交后，应着重发展两国经济文化关系，这是最主要的工作。”

1月10日，中国和突尼斯发表联合公报，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周恩来非洲之行的重大收获。

10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突尼斯总统事务和国防部长伯伊·拉德哈姆的陪同下，前往塞朱米瞻仰了那里的烈士纪念碑，他们在纪念碑前献了花圈。在花圈的绸带上写着：“在突尼斯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周恩来访问加纳前夕，恩克鲁玛总统遇刺，加纳国内局势混乱，是否如期往访成了一个问题。周恩来接到黄华的报告后，说：

“愈是在人家困难的时候愈是要去”，并派随行的黄镇副外长先去加纳带去关于访问安排的三点建议：一、为了两国领导人的安全，一切外交礼节可以从简；二、不去外地参观；三、请加方指定安全保卫官员与使馆联系，具体布置安全保卫工作。1964年1月11日周恩来一行如期抵达加纳进行访问，一切交谈、宴请活动都在恩克鲁玛住地克里斯兴城堡进行。当周恩来总理和他的随行人员到达城堡拜会恩克鲁玛时，等候在那里的恩克鲁玛总统同周恩来和其他中国朋友热烈拥抱，连声说：“欢迎你，欣赏你能来。”

在访问期间，周恩来总理同恩克鲁玛总统举行了三次正式会谈，两次单独会谈，就广泛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恩克鲁玛介绍了黑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加纳的非洲政策，两国领导人还谈到了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问题。在谈到双边关系时，恩克鲁玛介绍了加纳七年发展计划，要求中国予以支持。周恩来首先介绍了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强调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注意经济建设中的工农业比重问题和适当的发展速度问题。然后坦率地指出，七年计划的农业投资似乎少了，要增加粮食、棉花及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对加方的援助要求，周恩来原则上答应再增加长期无息贷款800万加纳镑，连同1961年已承诺尚未使用的700万加纳镑，共1500万镑，以支持加纳七年发展。

会谈中周恩来第一次提出并阐述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并于1月15日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回答加纳通讯社记者提问时首次公开宣布。这八项原则是：①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②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③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④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

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⑤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增加收入,积累资金。⑥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规格和质量,中国保证退换。⑦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⑧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1月16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马里共和国访问,马里首都巴马科市民几乎倾城出动欢迎周恩来总理,从机场到总统府长约10公里的大路两旁,簇拥着密密层层的身穿节日盛装的人群。当周恩来在凯塔总统陪同下乘车前往总统府时,整个城市被雷鸣般的欢呼声所震动。人们高呼:“中国万岁!”“中国——马里友谊万岁!”“欢迎周恩来!”所有的青年男女们,都随着节奏强烈的马里鼓的鼓声,兴高采烈地跳起民族舞蹈。每隔20来步就有一个小型乐队,用各种马里乐器奏出动人的乐曲欢迎中国客人。

1月18日至20日,周恩来总理和凯塔总统共进行了6次会谈。

在前三次会谈中,凯塔总统详细介绍了非洲的情况,特别是西非国家的情况,马里对内对外政策以及马里的党、政、军和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的情况。

在后三次会谈中,周恩来向凯塔介绍了我国革命的两个阶段——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我国对外政策等。周恩来对马里奉行反帝反殖的不结盟政策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表示钦佩,并说相信马里人民一定会克服困难,走上他们期望的进步道路。事后,凯塔总统激动地对马新闻国务秘书戈洛果说:“像周总理那样坦率地与我们谈社会主义问题的人是我接触过的政府首脑中唯一的一位。”

1月21日,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马里飞往几内亚。当周恩来总理在塞古·杜尔总统亲自陪同下从首都科纳克里到达拉贝市访问时,受到20万人——5倍于这个城市人口的热情欢迎。拉贝在科纳克里东北500多公里,位于福塔贾隆高原,是几内亚中部的最大城市,也是一个畜牧业中心和风景胜地,全市人口约4万人。这天欢迎中国贵宾的群众,除本市居民外,大部分是从几内亚中部的其他城市和村庄来的,有许多人甚至在两三天以前就从200公里以外的地方来到这里。中国客人走到哪里,那里夹道的人群就形成欢迎贵宾的人海,有的甚至站在树上和屋顶上,向中国客人们挥手致意。到处是“塔姆塔姆”鼓声、木琴和可拉笛的演奏声。几内亚人民能歌善舞,乐声一响,人们就自然而然地跟着音乐的节奏跳起各种各样的民间舞蹈。

“感谢您,毛主席!

感谢您对我们真诚无私的援助,

是您,派来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专家,

是您,今天又派来了这样重要的中国代表团来访问我们的国家。

……”

这是几内亚富拉族艺术家们为欢迎周恩来总理访问几内亚而写的一首歌,当这支歌由4位女歌唱家于1月24日在拉贝城举行的晚会上演唱时,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和塞古·杜尔总统热烈鼓掌。出席这次晚会的一千名观众也发出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在两国领导人的会谈中,杜尔总统全面介绍了几内亚的国内情况和非洲政策。周恩来赞扬了几内亚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民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并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着重说明“如何使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不遵守这个原则,革命就要失败”。

1月27日,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苏丹首都喀土穆,并作短暂停留。其间,周恩来与苏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阿布德举行了会谈。两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和国际局势等问题交换了看法。

1月30日,周恩来总理应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的邀请对埃塞俄比亚进行友好访问。当时中国和埃塞俄比亚没有建交,而美国却在埃有巨大的影响。1953年埃美即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和一系列军事协定,美国给埃塞俄比亚以大量“军援”,埃方平均每年输进的武器弹药价值1500万美元以上,相当于美国每年向非洲提供“军援”总量的一半。美国获悉埃塞俄比亚邀请中国总理访埃时,曾竭力加以阻挠,后来埃方还是坚持邀请,美国则施加压力不让塞拉西皇帝在埃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接待周总理。埃塞俄比亚迫于美国的压力,把接待和会谈地点安排在远离首都的阿斯马拉。周总理体谅埃塞俄比亚的困难处境,说:“没有关系,外国对他们有压力,我们应该体谅他们。”并欣然前往阿斯马拉。埃塞俄比亚方面深受感动,接待规格逐步升高。塞拉西皇帝亲自安排,将周总理的住地由别墅改到皇宫,并亲自陪同去外地参观。周总理所到之处,埃方均组织群众夹道隆重欢迎。

1月31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同塞拉西皇帝围绕中埃建交问题举行了一次小范围会谈,我方陈毅副总理、埃方首相沃尔德、代理外交大臣伊非鲁参加。

会谈中,塞拉西皇帝一再表示发展埃中关系的愿望,称埃塞俄比亚原则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需要做些准备工作来应付美国的反应,美国有可能断绝对埃塞俄比亚的所有援助,而埃塞俄比亚的军事物资和其他器材要全部靠美国,因而不能使埃中关系立即正常化。周恩来表示,中国方面能够理解也能够谅解。周恩来这种从加强两国人民友谊的大局出发、体谅小国困难处境的政治家风度获得埃塞俄比亚领导人的赞誉。周恩来访埃之行在埃塞俄比亚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两国正式建交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月1日,周恩来抵达了他非洲之行的最后一站——索马里。

2月2日、3日上午,周恩来与舍马克总理举行了会谈。

第一次会谈中,周恩来畅谈了访问非洲的观感:“到非洲以后,我们感到非洲觉醒了,站起来了,当然还有一部分国家未独立,正在为独立而奋斗,毫无疑问整个非洲大陆各国一定会独立,不管时间长短,最后都会取得胜利的。”

在第二次会谈中,两国总理就广泛的国际问题包括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问题、增加亚非国家在联合国主要机构中代表席位问题、部分核禁试条约问题、中美关系问题、中印关系问题、不结盟国家会议问题等交换了意见,并就两国经济合作深入进行了探讨。至此,周恩来的非洲十国之行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周恩来总理这次对非洲国家的友好访问,达到了寻求友谊、增加了解、互相学习的目的,不仅大大加强了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之间的团结,也为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的国际关系树立了良好的范例。因而,这次访问不仅是亚非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亚非人民的团结和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所引谈话内容均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藏周恩来非洲之行的谈话记录)

周恩来与曹禺之交

陈 刚

周恩来和曹禺的交往,是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的。

1938年在武汉,邓颖超应友人之邀看了一场话剧《日出》。事前,她并不知道这个戏是谁写的,也不清楚戏剧的内容。在剧场中,她深深地被这出戏所吸引,被它展示的丰富的生活内容与鲜明的人物形象所激动。听友人介绍,这个戏的作者叫曹禺,很年轻,以前曾是天津南开学校的学生,还是南开新剧团的活跃人物,以后在北京清华大学文学院毕业。23岁写出《雷雨》,26岁发表《日出》。他的戏剧作品已经在不少城市和学校演出,很受青年人的欢迎,是戏剧界和广大观众都很看重的青年作家。

邓颖超惊异地发现,一个作家这么年轻,竟能写出如此成熟的戏剧作品,确实出手不凡,她来看戏,没有想到会发现一个新人,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回去以后,她向周恩来作了介绍,并建议他抽时间也去看看。

不久,邓颖超陪周恩来去看了《日出》,以后又看了《雷雨》的演出。对曹禺的这两部成名之作,周恩来和邓颖超都非常欣赏。从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他们就都喜欢话剧。周恩来是南开新剧团的中坚分子,还在南开校刊上发表过《吾校的新剧观》,主张将戏剧活动同救国救民的斗争联系起来。对话剧的关心和热爱,成为他们两人在紧张的、艰苦的革命生涯中的共同爱好。

周恩来珍视曹禺的作品,还因为这些作品对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生活的反映,是真实而深刻的,作家敢于直面人生,尖锐而直率地揭露生活,抨击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黑暗与丑恶,

显示出作家正直和真诚的艺术良知。同时，曹禺的戏剧，艺术上都很有讲究，人物写得饱满，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矛盾冲突尖锐、紧张，扣人心弦，让人看了一遍就难以忘记。周恩来觉得，曹禺不仅熟悉生活，而且熟读了古今中外的戏剧名著，掌握了前辈文学艺术大师的真谛，是一位十分难得的、卓有艺术才华的人材。他对邓颖超说：“曹禺是个难得的人才，又是我们南开的同学，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呢？要打听打听。将来有机会的时候，要和他见个面，和他谈谈，交个朋友。我们很需要这样的朋友。”

大约在1939年6月，曹禺在重庆收到周恩来托人辗转交给他的——一封亲笔信。周恩来以老校友的身分，用十分亲切的口吻问候他，并且邀请他在方便的时候，到八路军办事处去做客。

收到周恩来的亲笔信，曹禺惊喜交加，当他第一次来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时，心情格外兴奋。一位穿着灰布军服的青年领着他走进一间简朴的屋子，周恩来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了。周恩来面带笑容，伸出手来，同曹禺紧紧相握。曹禺激动地说：“周先生，您好！”周恩来亲切地微笑着说：“欢迎你来坐坐，我早就想认识你了。”两人初次见面，却有一见如故之感。

周恩来关切地询问了他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也问到他的创作情况。那时，曹禺还不到30岁，在这位著名的政治家面前，还不免有些腼腆和拘谨。周恩来谈起邓颖超和他在武汉看《日出》和《雷雨》的情景，热情地赞赏这些作品。言谈之间也流露出对曹禺的喜爱，对他的艺术才华的赞赏。周恩来和蔼亲切，谈笑风生，很快就缩短了两人初次见面的距离，互相都不感到陌生，并增强了亲和感。曹禺有一颗作家特有的敏感的心，职业习惯使他时时刻刻在观察和感受着人和事，并以他真诚的心灵去分析和辨别。此刻，他感受到周恩来待人的真诚，同时也感到少有的心灵的沟通。虽然这是他和周恩来的第一次见面，却深深地被周恩来的风采和魅力所倾倒，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

他们的谈话进行到一半时，空袭警报声响了。周恩来要曹禺和他一起去躲一躲。他们从曾家岩沿石阶而下，在山路上看到日本的飞机向山城狂轰滥炸，浓烟四起。面对敌人凶残屠杀，周恩来的面容严峻而愤慨，心情沉重地说：“国难当头，我们中华儿女必须团结一致，奋起抗日。”这情景使曹禺感触良多，永远难忘。他从周恩来身上感受到巨大的精神力量，他相信共产党是坚决要抗战到底的。从那时起，他就坚定地靠近了共产党。在他一生追求光明，追求进步的道路上，这是一个重大的新起点。

那时，日本飞机经常轰炸重庆，国立剧专被迫迁往距重庆300里路的小城——江安。在这里，曹禺时常想起同周恩来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想起周恩来对他的鼓励和期望。1939年秋冬，他在江安教课之余，奋笔写出《蜕变》，并和导演张骏祥率国立剧专剧团到重庆准备演出。不料，却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冷遇和刁难。潘公展、张道藩提出多处无理的意见要求修改，经过据理力争和部分妥协，于1940年4月15日才得以在重庆演出。《蜕变》受到广大观众的热情欢迎，人们说这是抗日战争戏剧中“最成功的一部作品”。报纸上发表了一些肯定的文章，也发表了一些比较偏激的评论，如说这是宣扬“好人政府主义”、“反现实主义的倾向”等等。曹禺自然感到沮丧，困惑不解。周恩来看过戏以后，非常高兴，立即约请曹禺到八路军办事处去吃饭。那虽是一顿延安式的粗茶淡饭，但主题却是为祝贺曹禺的《蜕变》演出成功。周恩来说：“歌颂抗战是艺术家的良心，我们只有保护和引导的责任，没有挑剔和损伤的权利。”曹禺听了深受感动。他觉得，周恩来是从抗战这个全局出发，第一个发现和肯定《蜕变》主题价值的人。

完成《蜕变》之后，曹禺在江安又埋头写出了《北京人》。1941年10月26日，在重庆抗建堂首次公演，即引起轰动。第一期就演了20多场。该剧导演张骏祥，主要演员有张瑞芳、沈扬、赵韫如、耿震等。1942年，再度公演，依然场场客满。

周恩来第一次去看《北京人》，是阳翰笙陪同去的。他们自己买的票，座位比较偏远。导演张骏祥得知后，深感不安，亲自来到场内，想给调换两个较好座位，周恩来婉言谢绝，坚持坐在原位看完。周恩来对《北京人》印象颇好，认为这是曹禺写得最好的一个戏。看完以后，他和阳翰笙一道到后台去向作者、导演、演员们表示祝贺。他还风趣地对曹禺说：“你还在向往原始共产主义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延安。”

对于曹禺的作品，周恩来好像对《北京人》格外偏爱，情有独钟。在重庆时就看过几次，到50年代，中央广播剧团在北京演出《北京人》时，他又去看了，兴味依然不减。有一次，周恩来因招待外宾到剧场时戏已演了一半。看完以后，观众散去，他又请剧团把其中的一幕重演一遍，还对导演蔡骧和演员谈了些意见，希望把这出戏搞得更好，成为剧团的保留剧目。

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绝大多数的公教人员生活十分清苦。曹禺虽然是大学教授，又是著名作家，因有家累，仍然不能摆脱贫困的折磨，甚至有的时候，吃两个烧饼喝碗白开水，就充作一顿午餐。周恩来知道他生活困窘，有时就和邓颖超一起邀请曹禺到曾家岩共进午餐。有时请老舍来吃饭时，也请曹禺来作陪客。重庆的冬天，十分阴冷，周恩来看曹禺穿着单薄的棉长袍，特地送给他一块延安纺织的灰色粗毛呢，让他缝衣御寒，使他得到温暖。

在抗日战争刚爆发不久，曹禺从南京到长沙，曾从友人处得知，延安欢迎茅盾、巴金、曹禺等一批作家到延安去。沈从文为证实此事还特地到长沙，约曹禺去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见徐特立。因徐特立外出，没有见到。曹禺一直把这件事记在心里。在重庆见周恩来时，他旧事重提，表示，想离开国统区丑恶的环境，到延安去。周恩来要他留下，并语重心长地说：“这里需要人，国统区也一样有重要的工作要做，你的笔就是一种用来战斗的武器，要继续努力。”他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

一次，周恩来约曹禺一起去重庆郊外南渝中学看望老校长张伯苓先生。他们虽是前后同学，相距有10年，但对于培育自己的母校都怀有深厚的感情，对于自己的恩师老校长，依然抱着崇敬的心情。张伯苓喜出望外，热情地欢迎他们。

张伯苓还记得，南开中学的创办人严修（字范孙）先生十分器重周恩来的人品和才学。当周恩来从南开中学即将毕业时，严修曾向张伯苓提出，推荐周恩来和另一学生去法国留学，认为这样有才华的学生不继续深造太可惜了。为此，严修同天津名律师刘崇佑各出资500元，慷慨地资助周恩来赴法国学习。时间过去了20年，老校长看到眼前的周恩来已经成为国家民族的栋梁之材，深感欣慰。也深深钦佩严修先生的远见卓识。

张伯苓留周恩来、曹禺吃午饭。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也来参加。张彭春是南开最早留学美国的学生，回校后任南开新剧团的领导人，曾任南开学校代理校长，后任国民党政府驻外使节。他见到周恩来与曹禺，也十分高兴。阔别多年，老友重逢，是非常难得的聚会。

席间，周恩来回忆起在南开求学期间，休息日常到校长家中求教、长谈，校长常常留他吃饭，吃的是玉米面贴饼子，小米粥，熬小鱼，其乐融融。张彭春常年在海外，对共产党的主张不以为然，颇有微词，和周恩来的见解相左。周恩来泰然处之，心平气和地向他解释，用不少事实来说服他。张伯苓在一旁不置可否，只是注意倾听。这次聚会给曹禺留下深刻印象：周恩来对老校长十分敬重，对张彭春的意见，耐心倾听，气度恢宏，以理服人，政治家的风度和宽阔的胸怀，使人不能不心悦诚服。

曹禺搭乘周恩来的汽车回市区，在车上，曹禺说了他在江安教书时，曾有特务到他住处搜查的事情。周恩来提醒他，国统区特务横行，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在曹禺的心目中，周恩来是良师益友，像一盏指路明灯，照亮

了他前进的路程。在茫茫的人海中，周恩来像一块磁铁吸引着他。他常常感受到一种巨大的人格力量在鼓舞着自己，激励着自己，成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后来，他曾到美国去讲学一年，在上海等地教书、创作、编导电影，他的心里始终是明亮的，乐观的。1949年2月，他根据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到达香港，随后和一批爱国民主人士一道，转赴解放区。

曹禺等一行人从香港乘船到烟台，又乘汽车到达济南。邓颖超特地从北京到济南欢迎这一批爱国民主人士。曹禺激动地同邓颖超紧紧握手，亲切地称邓颖超为“邓大姐”，并把方瑞介绍给邓大姐。邓颖超说：“欢迎你们。恩来同志让我来欢迎你们到解放区来，到北京去共商国是。恩来让我问你们好！”曹禺紧握着邓大姐的手，一声“谢谢”没有说完，已经热泪盈眶，难以自抑。

由济南乘火车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曹禺立即投入到筹建新中国的繁忙工作中，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政协委员；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被选为全国文联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以后又被任命为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他经常处于繁忙的会议、工作和外事活动中，他感到生活得很愉快。在政协会议、文代会和外事活动中，有时见到周总理，曹禺知道他很忙，日理万机，不便去打扰，常常是略作寒暄，互致问候，未能有机会深谈。

那时，曹禺才40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面对着一个新的世界，一片新的生活，他迫切地感到需要学习，充实自己。过去，对于政治理论书籍，他读的比较少，现在感到需要充实营养。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学习毛泽东著作。

通过阅读政治理论书籍，曹禺一方面感到在思想上确有不少收获，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有了更多的理性认识，思想上有了进步；另一方面，他也常常陷于一种困惑与矛盾之中。

从30年代的《雷雨》、《日出》、《原野》到40年代的《蜕变》、《北

京人》，都有一些评论家从社会学的观点，分析与批评他的作品在思想内容上的缺陷。他从内心里是困惑的，有些评论是难以接受的。曹禺不赞成用社会学的观点，机械地评价艺术作品；他也不赞成以简单的阶级分析，代替现实主义的要求。可是，这些文章又都说的是大道理，头头是道，振振有词，他无力反驳。现在，他常常发生困惑和苦恼，难道那些批评意见是对的？是不是自己确实是由于没有认真学习过马列主义，缺乏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因而对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认识与反映，出现了失误呢？……他回答不了自己的问题。

这一时期，他在思想上渐渐陷入了一个误区，对于自己在创作上已有的成就，也发生了动摇，缺乏自信。那时，很多青年文艺工作者对曹禺非常敬仰，请他讲讲创作经验，他常说：“我的那些作品写的不好，不要提了吧。有时，我想应当把那些作品都烧掉吧！”这也反映出他当时的一种复杂的心态。

1950年10月，曹禺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对自己过去的创作，主动地提出批判。在此前后，开明书店出版《曹禺选集》时，他对《雷雨》、《日出》都进行了修改，特别是《雷雨》改动的相当大。他在主观上是想克服过去评论家们指出的有“宿命论”的思想，增强人物的阶级意识与阶级特征，但是，这种改动，客观上破坏了原来作品的整体构思。他的这次努力，事与愿违，引起了文艺界的议论纷纷。

曹禺是一个真诚的人，也是一位真诚的艺术家的。他过去写作品时是真诚的，此时作自我批判也是真诚的。一个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从旧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人们在这种变革中不能适应，在思想感情上或行为上，发生了摇摆或偏颇，都是可能和正常的。

1951年，周恩来听说曹禺学习很努力，勇于自我批评，表示了赞赏，欢迎他的思想进步。同时，也语重心长地劝告他，不要妄自菲

薄,要有自信,要有主见。“你的那些作品,合乎当时进步作家的思想水平,你的作品,反映了历史生活的真实,今天有价值,以后也有价值。现在是希望你能写出新的作品来。”接着,又询问了他的生活和创作情况。曹禺说,生活是愉快的,工作也安排得很好,过去教书,工作忙碌,为生存终日奔波,写作大都靠业余时间,是没有法子。现在生活有了保障,创作就没有了后顾之忧。谈到创作,曹禺有些为难和迟疑了。从1947年在上海编导电影《艳阳天》后,已有5年没有创作了。进入解放区以后,面对着一片新的天地,新的生活,他也很想投入新的创作,也曾去过工厂、农村,到过治淮工地,搜集了不少材料,可是,总感到对工农生活熟悉不够,难以下笔,成了他非常苦恼的问题。他觉得,对知识分子生活还比较熟悉,想写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但还定不下来。他把这个想法提出来,请求帮助。周恩来认为,这个主题很重要,很值得写,曹禺对知识分子熟悉,写起来可以驾轻就熟,希望他重新拿起笔来,大胆地写。谈话中周恩来还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特点,知识分子的发展道路等等。这次谈话使曹禺增强了信心。

以后,曹禺到北京协和医学院深入生活,同教授、专家、学生和职工交朋友,作了认真而详细的调查,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曹禺对自己创作的要求历来是十分严格的,不愿意仓促动笔,写得很慢,很认真,直到1954年7月才写出《明朗的天》。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立即投入排演,由焦菊隐导演,刁光覃主演,1954年12月18日公演。第一期就演出了60多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文艺界专家纷纷发表评论,观众也提出一些意见,曹禺又作了一次大的修改,把四幕七场改为三幕六场。北京人艺将修改后的《明朗的天》进一步排演加工,于1956年3月参加全国话剧会演,荣获剧本奖、导演奖、演出奖等六项奖励。周恩来观看《明朗的天》演出后,非常高兴,给予热情的鼓励,并希望继续努力。

《明朗的天》是曹禺奉献给新中国的第一部戏剧作品,受到各

方面的肯定和观众的支持以后,使他逐渐恢复了创作的信心,也给予他继续创作的勇气。他在继续寻找适合自己表现的题材和人物,寻找新的创作灵感。

1959年,我国进入3年经济困难时期,全国上下都在节衣缩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曹禺觉得作为一个作家,不仅应当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而且应当为人民奉献一些精神食粮,从精神上激发人民度过困难、战胜困难的热情。于是,他想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

这时,他已经50岁了,长期身体多病,精力不如以前,他只得请梅阡、于是之来合作,查阅史料,翻阅民间故事,阅读多种写卧薪尝胆故事的戏曲剧本,然后进入酝酿和创作的过程。他不满足于同类故事已经达到的水平,他要在历史题材中发掘出新意,另辟蹊径,他要以新的时代精神去认识和表现这段历史故事,塑造新的艺术形象。《胆剑篇》显示出曹禺创作个性的复归。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于1961年10月公演《胆剑篇》。周恩来看了以后,热情地肯定它在主要方面是成功的,也指出创作思想上仍有某种束缚。

1962年2月17日,在中南海紫光阁,周恩来对在北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中说:“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们不敢写了,帽子很多,写得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曹禺同志是有勇气的作家,是有信心的作家,大家很尊重他。但他写《胆剑篇》也很苦恼。他入了党,应该更大胆,但反而更胆小了。谦虚是好事,但胆子变小了不好。入了党应该对他有好处,要求严格一些,但写作上反而有了束缚。……所以举曹禺同志为例,因为他是党员,又因为他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对他要求严格一些,说重了他不会怪我。”

紧接着,3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陈毅、陶铸都讲了话。

陈毅说：“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是经过了考验的。他们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应当为他们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这充分体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新的估计，使大家深受鼓舞。

曹禺在回顾“广州会议”时说：“解放后，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是努力工作的。虽说组织上入了党，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帽子，实际上也是背着，实在叫人抬不起头来，透不过气来。这个帽子压得人怎么能畅所欲言地为社会主义而创作呢？那时，也是心有顾虑啊！不只我，许多同志都是一样，深怕弄不好，就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广州会议，一下子把人们的思想解放了，把帽子脱掉了，建国后十三年那隐隐约约时显时隐的怪影，终于在心头消失了，怎能不让人由衷地感谢党呢？怎能不令人愉快呢？”

在广州会议上，曹禺心情舒畅。他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结合自己30多年创作甘苦和经验教训，谈了他的想法和看法。他说：“我以为必须真知道了，才可以写，必须深有所感，才可以写。要真知道，要深有所感，却必须花很大的劳动。我写过一点东西，常是写不好。写不好，可以列举很多原因，但主要的还是因为自己不真知道，不深有所感。”他还讲了戏剧创作中的情和理的问题。人们都说，他的见解是深刻而独到的。

广州会议以后，曹禺开始着手写《王昭君》。

谈起《王昭君》，还有一段序曲。那是1960年冬，在北京政协礼堂一次集会，会后吃饭时，一位内蒙古自治区的同志向周总理反映，在内蒙古的汉族姑娘一般不愿意嫁给蒙族小伙子。周恩来说，不要大汉族主义，古时候就有一个王昭君是这样做的。接着，周恩来对曹禺说：“曹禺，你就写个王昭君的戏吧！”他还提议大家举杯，预祝曹禺的《王昭君》早日写成。这之后，曹禺到内蒙草原上深入生活，搜集流传于蒙古族民间的传说故事。田汉从电视上看到曹禺在

内蒙草原骑马扬鞭的情景，兴奋不已，大笔一挥，写下七绝一首：“一鞭大漠马如飞，青冢黄沙带笔归，为教全华团结好，再抛心力写明妃。”曹禺深感不能辜负人们的期望，从广州会议回京以后，伏案而作，开始写出第一幕和第二幕。

谁能料到，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骤然降临，使曹禺陷入一场灾难。北京人艺的造反派把曹禺当作“文艺黑线”人物，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来批判，剧院外的大专院校甚至部分中学里的红卫兵们，轮番地来批判他，要他交待，写材料。这突如其来的袭击，使他陷于极度的痛苦之中，精神上蒙受着难以忍受的折磨。他仿佛感到“天塌下来了！”

曹禺自幼丧母。母亲薛夫人生下他的第三天便与世长辞。他是由他的姨母——薛夫人的妹妹，后来成为他的继母抚育长大的。继母没有生育，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在他身上，呵护着、关怀着他。尽管这样，母亲的早逝，造成了曹禺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忧郁，孤独，多愁，善感，伴随着他长大。他从3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和继母去戏园子看京戏，他坐在继母的怀抱中，睁大眼睛看舞台上五光十色的表演、听继母讲故事，在他幼小心灵里，埋下了热爱戏剧的基因。上小学读书以后，认识的字逐渐多了，回家以后，他常常一个人躲在小屋里读书，从那些书里认识了历史，认识了生活，认识了世界；孕育了也培养着他对生活中各种人物的鉴别能力和对艺术文学的鉴赏力。他从古今中外的名著中，感受到世间人们所经受的种种苦难，也感受到人们在被压迫中奋起斗争，执着地追求着光明和幸福。在中国戏曲丰富多彩的故事中，贯串着忠与奸、善与恶，是与非的斗争，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中，培育着他的艺术才能茁壮成长。以后在天津南开学校的7年和北京清华大学的5年所受的系统教育，把他推上了一个为时代、为民族、为人民呼喊的作家的道路。

曹禺的大脑，就像一个巨大的海绵体，具有充分的吸纳能力。

他读过的书,那些有意思的人物形象、性格、语言、情节和细节,都被它吸纳进去;而没有意义的,则被它扬弃掉了。他进南开中学后,早饭前的自习,就是在校园的树丛中,朗读和背诵莎士比亚作品,既学习英语,又熟读诗歌和戏剧,齐头并进,常年不辍。他的大脑,又像一盘精密的微型机器,经常在不停地运转。对于他读过的、看到的、听到的大千世界的形形色色,这盘机器总在筛选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过滤着,储存起来。到他进入创作酝酿和写作状态时,又不断地帮助他集中,提炼,组合,寻找一个曹禺所喜爱并独有的形式表达出来。

曹禺常常处于孤独状态。他的大脑机器经常兴奋地运转着;有时和朋友在一起,他“心不在焉”,陷入自己的沉思,表面上的静掩盖着脑海里的动。所以,他很累。从青年时代就经常失眠,靠服安眠药才能睡觉。长时期的药物渗入血管,影响肾脏,使他的身体日渐衰弱多病,苦不堪言。

“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猛烈地袭击着他病弱的身躯,他强打精神支撑自己,不能在混乱的困境中倒下。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仅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共产党员,要在这种局面下站得直,挺得住。

但是,一件又一件意外的不幸事件发生了,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灵。

1966年8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女儿放学回家悄悄地告诉他:老舍先生不堪忍受红卫兵的凌辱,在太平湖投水自尽了。这犹如一声晴天霹雳,震得他目瞪口呆。怔了一会儿,他的眼泪夺眶而出,心中仿佛像撕裂一样的疼痛。他和老舍有20多年的友谊,老舍是他敬重的朋友。他们曾一道去美国讲学,朝夕相处1年,无话不谈,亲如手足。老舍写的《龙须沟》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茶馆》使北京人艺走向辉煌。老舍是支撑北京人艺这个艺术殿堂的顶梁大柱,倾刻之间坍塌了,怎么能不让人痛心和惋惜

呢？曹禺苦苦思索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怎么也弄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呵？

更没有想到，1966年12月的一个深夜，曹禺、方瑞和小女儿万欢，都睡下了，突然有一群红卫兵闯进大院，冲进他家，把他从床上拖下来，装进汽车押走了。曹禺从来都处事谨慎，与世无争，胆小怕事，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这样突如其来的、不明不白的绑架，惊吓之下，两腿发软，由两个红卫兵架着，带进一个大厅，安置在一个小床上躺下。他吃的安眠药药效已过，在这张小床上辗转反侧哪能睡着，他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天亮时，才依稀看到同时被关押的还有彭真、万里、田汉、吴晗、林默涵等数十人。红卫兵看守着，他们不能说话，只能用目光相视，传递彼此珍重的意思。这次的被绑架，也就是红卫兵为了标榜自己“革命”的所谓“活捉彭陆罗杨”事件，震动了京城。

周总理得到这次突发事件的报告后，极为震怒，立即命令卫戍区把红卫兵头头找来，十分严厉地批评他们。他在讲话中曾提到一句：“曹禺算什么？他又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嘛！”这句话可能对曹禺起了一些保护作用。次日上午，红卫兵就将他释放，送回家中。

北京人艺的造反派又把曹禺、赵起扬、焦菊隐及一批著名演员，关进“牛棚”，让他们半天劳动，半天学习，写检查，写材料。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还在他们编的《文艺革命》刊物上出了“打倒反动作家曹禺专号”，罗织罪名，颠倒黑白，上纲上线，乱骂一通。这种精神上的折磨，使他心力交瘁，痛苦不堪。

到处都是强烈的、刺激的标语口号，到处都有红卫兵喧闹的声音，这对曹禺的心灵撞击巨大。睡梦中，他仿佛总感到红卫兵穿的皮靴践踏着他的大脑神经；仿佛总感到红卫兵的皮带要挥舞到他的大脑上。梦魇总是缠绕着他，梦醒时，浑身是冷汗。他的心脏病不时发作，身体更趋衰弱。他几次想过自杀，想过跳楼，想过用电

击,也想过服安眠药。他还哀求过方瑞帮助他脱离苦海。可是,家里还有风烛残年的岳母,有病弱的妻子,还有4个女儿,最小的还在上中学,他怎能撒手而去呢?

他患有心脏病和神经衰弱症,在协和医院住了一阵以后,又被造反派召回,让他在首都剧场——北京人艺的传达室看守门房,管来往客人登记,打扫院子,这在当时就算是最轻的劳动了。一位外国记者从北京发出一条消息:“中国的莎士比亚在传达室看大门”。这自然使那些造反派感到难堪,毕竟首都剧场是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是闹市的中心,让一位戏剧大师看守大门,岂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辛辣讽刺吗?可是,造反派又不甘心放过曹禺,那不是有损他们的形象吗?于是,又派曹禺到灯市东口北京人艺舞美工厂院里看守传达室,接收信件,分发报纸,传呼电话,傍晚时刻还要兼做倒垃圾的事。以后,又将曹禺、赵起扬、焦菊隐等一批艺术家发配到京郊团河农场劳动。

1972年,周总理在一次接见外宾以后,特地叫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张颖留下,问:“你知道曹禺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张颖说:“我从干校回来还没有见过曹禺,听说他还没有解放,身体也不好。”听后,周总理指示张颖:应该让他快点出来嘛!你去看看他,也代表我去向他表示慰问。”过了两天,张颖到了铁狮子胡同三号曹禺的住处,三间普通平房,方瑞病在床上,家中一片凄凉,曹禺受了一连串打击,突然像衰老了10年,精神颓唐,终日昏昏沉沉地仰坐破沙发上,沉默不语。曹禺突然看到张颖来访,非常激动。他和方瑞紧紧拉着张颖的手,不愿放开。寒暄几句以后,张颖说:“周总理很关心你,听说你身体不好,让我来看看你,向你表示慰问,希望你保重身体,要有信心。”然后,又轻轻地重复了一句“要有信心。”曹禺会心地露出一丝笑容。

张颖向周总理如实地作了汇报。周恩来皱紧双眉,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在寻找办法。不久,有一个外国代表团来访,周恩来立即

决定,让曹禺参加接见外宾,直到看到新华社准备发出的新闻稿上有了曹禺的名字,才放下心来。在那个岁月,只要名字在报纸上刊出,就意味着已经得到“解放”和“复出”了。曹禺就是这样在周恩来的解救下获得了自由。

方瑞的身体一直都很虚弱。她文静、贤慧,能写一手好字,在曹禺《北京人》的愫方和《家》的瑞珏形象中,都可以看见方瑞的影子。她和曹禺同甘共苦,相依为命生活了多年,养育了万方、万欢,含辛茹苦,操持家务,使曹禺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创作,没有后顾之忧。这几年,曹禺坎坎坷坷,她也积劳成疾,终于在1974年逝世。曹禺丧失了贤内助,非常伤心。周恩来获悉以后,又派张颖前去,代表他和邓颖超表示亲切的慰问,并询问曹禺有什么困难?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曹禺听到广播后,号啕大哭。一件件往事涌上心头,他感到刻骨铭心的痛苦。他随着人群到北京医院去向自己衷心爱戴的一代伟人告别。他在周恩来的遗体前,恭恭敬敬地鞠了5个躬,比同行者多鞠了2个,表达自己的心意和感激。第三天,他又柱着手杖,领着小女儿,在凛冽的寒风中,目送周恩来的灵车,缓缓驶过十里长街。他忽然悲哀地感到,他心中点燃了30多年的一盏明亮的灯,熄灭了。……他在寒冷的长安街上久久地呆立着。

周恩来与袁雪芬

高义龙

1946年5月,以袁雪芬为首的“雪声剧团”在上海演出了根据鲁迅名著《祝福》改编的《祥林嫂》,受到进步文艺界的好评。袁雪芬却因此遭到反动派的迫害。8月27日,流氓在光天化日之下对袁雪芬抛粪,继而又寄来夹着子弹的恐吓信。9月10日,袁雪芬举行记者招待会,悲愤陈词,呼吁社会各界主持公道,郭沫若、田汉、洪深、许广平及文艺界、新闻界200余人出席,给予声援。9月14日,周恩来作为参加国共和谈的中共代表团的团长来到上海,听地下党的同志讲起袁雪芬演出《祥林嫂》并受到迫害的情况,十分关切,打算亲自去看看“雪声剧团”的演出。民主人士史良先生担心他的安全,劝他不要去剧场,但他还是决定去。15日晚,周恩来不顾特务的盯梢,乘黑色“纳喜牌”小轿车到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下车,然后徒步走过狭窄的碎石子路的小弄堂,绕过日本人留下的碉堡和铁丝网,来到青岛路上的明星大戏院,不动声色地坐在后排看戏。这天“雪声剧团”演出的是辽代历史悲剧《凄凉辽宫月》。

看完戏后,周恩来把地下党文委的于伶约来,谈起“雪声剧团”。他说:“应该很好地注意这个剧团,我晓得有绍兴戏,不晓得绍兴戏在上海有那么多观众,影响很大。”“在国统区,在没有党的领导的情况下,演出《祥林嫂》,出乎意外。”在听于伶介绍了越剧演员的遭遇后,周恩来又说:“她们都是穷苦的女孩子,没有生路学唱戏,一到上海唱红了,过房爷、过房娘都来找她们,社会上的恶势力包围她们、腐蚀她们。她们中间少数人有了觉悟,认识到被侮辱、被剥削的地位,追求进步,靠拢地下党所领导的进步话剧工作者。你

们应该动员党员从戏剧艺术入手，主动地接近她们，尊重她们，帮助她们，耐心地引导她们逐步走上革命的道路。她们有观众，这就是力量。”他嘱咐于伶：“不能性急，要全盘考虑，抓住重点。这件事，如果我们党不去关心，就会被敌人利用。”

国共两党和谈濒于破裂，10月21日周恩来离开上海。离沪前，他向于伶、刘厚生部署了戏剧方面的疏散、隐蔽和今后的工作。他说：“地方剧观众多，影响大，我们应当重视。要挑选正派的同志去，以便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对地方戏曲艺人能有所帮助。”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地下党加强了对袁雪芬和其他越剧界人士的工作，陆续派了党的外围组织的吴琛、党员钱英郁到“丹桂”、“玉兰”、“少壮”剧团担任编导，后来又派刘厚生到“雪声剧团”担任导演和主持剧务部。于伶对袁雪芬也很关心，遇到重大问题（如《山河恋》联合义演等）常给她出主意；田汉亲自给“雪声剧团”写了借古喻今、抨击四大家族的剧本《珊瑚吟》。上海几个主要的越剧团都在党的影响之下，剧目内容表现出较为鲜明的政治倾向。上海解放前夕，许多剧种、剧团处境艰难，而这些越剧团却生气勃勃，深受观众欢迎。解放军进入上海当天，五大越剧团即组成5个宣传队，冒着流弹上电台宣传。这些都与地下党根据周恩来指示所做的行之有效的作品是分不开的。

解放后，周恩来以及邓颖超在政治上、艺术上、工作上、生活上给予越剧工作者更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

1949年6月28日，邓颖超受党中央委托，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专程到上海迎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国是。这月底，以袁雪芬为首的“雪声剧团”在九星戏院演出越剧集锦，展演了越剧发展各阶段的5个剧目的选场，总名《雪声进行曲》。一天，邓颖超在许广平的陪同下来到“九星”的后台，看望袁雪芬。她握着袁雪芬的手说：“你们受委屈了！你们在国民党统治区能展开斗争，我们都晓得了，这是不容易的。这次来对你们慰问，周恩来同志叫我带信向

绍兴大班有什么不同,在听袁雪芬唱过之后说:“绍兴大班我也会哼哼,唱一句给你听,叫绍兴高调。”说罢,他就兴致勃勃地唱了一句。袁雪芬说越剧吸收了大班不少东西,周恩来说:“是应该吸收。”

周恩来关心着袁雪芬的进步,循循善诱地做着思想工作。他对袁雪芬说:“年轻人,给我们写写信吧!有什么想法,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给我写。我们交个朋友嘛!”袁雪芬觉得自己的字写得不好,说想请人代写,周恩来便说:“我不是看你的字写得好不好,你自己写的才有真情实感。我知道你们都是苦孩子。”袁雪芬在参加政协会议期间受到生动的教育,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她把自己的想法对周恩来讲了,总理说:“很好。你过去在旧社会有过斗争,但要做个党员不光是为了个人。有这要求可以回去向当地组织提出。”这等于给袁雪芬上了第一次课。

1950年2月,袁雪芬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她是越剧界第一批入团的成员之一。她把这消息写信告诉周总理和邓颖超。4月20日,邓颖超给她写来一封信,字里行间洋溢着深厚的感情,并在信中转达了周总理的致意:

雪芬妹:

接到你的信很久了,因为我忙,身体又不好,所以耽搁下来。知道你加入了团,很高兴!但从上海来的同志那里,听说你病过一时,又很挂念你的健康!你追求进步的热情和朝气是很好的,也是十分宝贵的。可是,一定要照顾自己的身体,因为革命的工作、建设的工作,长期需要着我们。身体是我们参加工作的资本,爱护他,也同样是为了革命的利益。我常觉得如果我身体更健康些,那我就可以做更多的工作,而现在呢,身体健康限制了我,常常使我力不从心。因此,希望你热情工作中要适当地注意身体。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力求进步。

最近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婚姻法,这是使广大的男女群众从封建束缚的婚姻制度里解放出来的大法。为了使它能贯

彻执行,在群众中需展开宣传教育工作,我们正在开始做。但这是一个长期的教育工作,需要各方面配合宣传教育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在戏剧方面是可以做更深入的宣传的,我想你们一定已注意到配合了。最后,送你一张恩来同志和我的合影,留作纪念。他更忙,要我附笔致意。

专覆 祝

健康!

邓颖超

四,二十

1950年10月底,袁雪芬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到波兰华沙出席第二届世界和平会议,接着去维也纳参加世界青联理事会,然后参加中国青年访苏团在苏联各地参观。出国3个月,她大开眼界,同时深感懂得太少,需要学习。回国后,她向周总理提出,希望像孙维世那样,能留在苏联学习戏剧理论。周总理摇摇头说:“你应该边演出边学习,你的工作是演出。你和维世情况不一样,从科班出来,有演出实践,在社会上也有影响。”

1952年10月,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越剧获得的奖项之多引人注目。周总理非常关心越剧演员得奖后的思想状况,他把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请到自己家中,意味深长地提出一个问题:“得奖是不是好事?”他说:“如果不小心,金牌会压塌人的。得奖的是你们,但是你们背后有多少无名英雄?”“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任务很多。只有搞好团结,才能做好这许多事情。”他对越剧作了分析,说道:“你们不要只看到越剧优美的一面,还要看到它的缺点和弱点。你们的底子 is 薄弱的。”“女演男,男演女,都是封建社会的产物。男女合演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他还指出越剧音乐不够丰富,是否可以吸收浙江民歌和绍兴大班的音乐来丰富自己。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上海越剧工作者在全国会演后,掀起了学习兄弟剧种的热潮,促进了越剧的提高。

1953年初,袁雪芬曾回家乡一次。家乡在解放后的巨大变化,使她深受触动。她给周总理和邓颖超写信汇报了自己的感受。4月3日,邓颖超抱病给她写了回信,信中说:“在我得病以前,听夏衍同志说你回浙江去了,这次看到了二月的来信,知道你这次故乡之行得到很大收获,我真为你高兴,相信人民群众的需要和人民艺术欣欣向荣的发展,一定会带给你很大的鼓励和力量,一定使你坚定地坚持岗位发挥创造,努力工作的。”邓大姐怀着真挚的感情写道:“我们相识虽久,但总苦无谈心畅叙的机会,你愿意给我很大的信任,心里有话要同我商量,我当然是很乐意的。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信告我,我当尽我所能协助你。”

周总理、邓大姐对袁雪芬政治上的进步十分关心。50年代前期,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非常严格。袁雪芬虽然早就提出了入党申请,但直到1954年2月才在支部通过。据一位当时在华东局负责组织工作的领导同志后来说,周总理对袁雪芬的入党问题十分关心,袁雪芬的材料在京沪线上跑了好几次,周总理曾说:“袁雪芬同志解放前的情况我们都了解,发展她是不会辱没我们党的。”袁雪芬在党支部批准她入党后,马上给周总理和邓大姐写信作了汇报。邓颖超正生病在京郊疗养,6月1日她给袁雪芬写了一封长信,提出新的希望和要求:

记得我在接到你告诉我们在二月十四号党批准接受你成为共产党员的那封信时,我抱着极大的喜悦心情拿着你的信去给恩来同志看,他和我共同感受到很大的欣慰。的确,这是我们对你关心中最最关心的一件事。从而亦就引起了我们对你的新希望和新的要求。从那天以后你已站到光荣的共产党员的岗位,首先要加强党性的锻炼,不断的克服有违党性的个人主义;还要经常的学习着运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客观的去观察分析,如何去正确的对己,对人,对事,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从而提高自己的水平和觉悟。现在,在目前你能很好的对

待你的病,善于处理你自己,把病治疗好,就是你在党性方面锻炼的实践哩。

她得知袁雪芬也因生病住院,谆谆嘱咐:

你在病中的心情,我是完全可以设想和理解的。但是,亲爱的雪芬,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唯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与疾病作斗争确是“必须用心”而要充分的休息,并非“无聊”的生活,正是蕴蓄着生活的意义。现在安心治病,是为了今后更好的工作。我深深地希望你,盼着你如你来信所说的“听医生的话,安心治疗”,抛开一切,不去想那许多事。一个共产党员当着工作的时候,应该锻炼着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着患病的时候,就应该锻炼着自己全心全意的去取得对疾病的胜利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更快的回到工作的岗位又继续为人民服务。着急,是无助于治疗的。害了慢性病是急不得的,不是急求能好的。总之,“没有了健康,就没有一切”,我是深深体会到这一点的,我望你亦能考虑这一点,进一步认识你乖乖治疗、争取早日的痊愈和恢复健康的重要意义。如果你肯加考虑的话,那么在病中,学习绘画,既可陶情亦可消遣,万不要去忙着搞创作啊!你说对不?你能同意吗?

她在信中诚挚地请袁雪芬到北京疗养:

你的病如果治疗得有进步,可以行动的时候,我很盼望你能转地疗养,到北京来好吗?如果在病体能够和你愿意来北京的时候,望你立即告我,我当帮你在北京作一些安排。作为同志的关系,作为一个热爱你的艺术的观众,而为你服一些务,是义不容辞而乐为的,请你不要客气才好。

信最后的署名是“你的大姐邓颖超”。这封信情真意切,既体现着老革命家崇高的思想境界,又充满同志式的感情。

1955年1月5日,周总理亲笔给袁雪芬写了一封信:

雪芬同志:

在这一九五五年开始的日子里,祝你身体健康,精神快乐,工作顺利,学习进步。五年来得到你不少封信,恕我从未函复。现在总答一句:愿你为人民艺术事业努力前进。

周恩来

一月五日

周总理、邓大姐的关心可谓无微不至。袁雪芬的三妹想报考中央戏剧学院,袁雪芬觉得她缺乏基础,不很赞成。周总理、邓大姐知道后鼓励她到北京来报考,并说可以住在自己家里。袁雪芬的三妹到了北京后,考期已过,袁雪芬写信给周总理和邓大姐,希望他们动员三妹回沪。周总理和邓大姐了解到还有补考的机会,就让袁的三妹住在自己家里,一住一个月。总理空暇时督促她读书,有时还看她表演小品。最后,袁雪芬的妹妹通过正常手续参加考试,没有被录取,在离开北京时,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她认真地谈了一次话,指出了她的不足,鼓励她继续努力。邓颖超还为此专门给袁雪芬写了一封长信:

亲爱的雪芬同志:

在今年年初,收到你同时分别写给我们的两封信。我没有照你的意见马上劝三妹回去,亦没有立刻回信。因为我还需要等待一定的时机,在三妹补考中央戏剧学院表演干部训练班得见分晓以后,才好采取上述的步骤。你不会为我的迟延而责怪我吧?我请你给予谅解。

现在让我将帮助三妹投考的经过,以及我们对她所采取的方针和得到的结果,简要告你。详情由三妹面报你。望你亦详询她一切。

当三妹来京报考,得知考期已过,准备离京返沪以前,她来看我。当我俩知道情况以后,认为有尽力帮她的必要。首先探询一下不久可有一补考的机会,再和三妹谈好约定:如果不能考取,则必须放弃只凭热情和喜欢出发的不踏实的好高骛

远的一定要学戏剧的愿望,而转到进正规学校,提高文化,学习一般科学的切实的学习,以便打下深造的基础。在她肯定表示同意以后,我们则用一切可能做到的办法帮助她,支持她专心的准备考试,为的是让她通过考试的实践(考上,或者考不上)去认识她自己,去弄通她的思想,而使她的学习得到切实的解决,不要一误再误的耽误过去,辜负了正好学习的年华。我们对她学习的热情和学习的迫切愿望,不是给以简单的泼冷水的办法,亦不是在她没有通过实践认识、依然坚持她的意见时,去做那不可能收效的说服,劝她去进正规学校。对于一个热望得到学习的青年,我们要给以热诚的最大的和有效的帮助。我们俩商定了以上的方针和作法,决定要她搬到我处来住宿,以便使她得到安定的生活,充分的准备补考的功课。同时,我们亦可亲自对她作一番观察和了解。果然,一个月的相处,使我们在看到她的长处以后,又发现了她的缺点,对她有了进一步较全面的了解。

虽然,我们尽了最大的力量帮助她,而她亦作了最大努力的准备,但考试的结果,是未被录取而落榜了(这点是我们预料到的,但不经过考关,她是不肯正视自己,一改其热情出发不踏实的想法的)。未被考取的原因,主要就是她的基础差,不踏实的缺点的后果。正如你来信所说她不踏实,担心她的程度的看法是一致的。她在对我做的检讨中,亦开始承认了这一点。

三妹在考试受到挫折,经过极度激动和苦恼痛苦以后,在她心情慢慢平静下来的时候,我和她又谈了一次话。用启发、解释兼批评的热诚坦率而又严肃的谈话,帮助进一步搞通思想,更明确的正确的解决问题,并给以鼓励。同时给她看了你给我的信。她同意我要她回去向组织上、向你报告她以后对于学习的意见,并在得到组织和你的同意下,再力争得到学习的

机会。我希望你和组织帮助她能够得到严格的系统的正规的学习。

这次我们对于三妹的帮助，不过是在我们为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中的整个工作上的一件极小的具体工作，我们不仅引以为己任，而且很愉快去做它。只要能给三妹一点助益，那我们更为欣慰了。希望你不要感到麻烦我们而引为不安。

关于三妹留京考试的情况，希望你转告你院党和团的负责同志，作为我帮助其所辖的一个成员的情况的汇报罢。

有关三妹学习的问题，就写到此。

* * * *

你和三妹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你们姊妹是情长深厚的，彼此是极其关心爱护的。她应该向你的长处学习，因为正是她的短处。而你要有效的帮助她克服短处，同时亦能鼓励发挥她的长处。你们除了深厚的感情以外，还必须加上政治的条件，就是在相处中必须有政治性。这对于作为一个党员的你和一个团员的她的关系相处中更是不可缺少的。我和恩来同志将满卅年的夫妻关系，能够相处得比较好，能够巩固至今，最主要的一个条件亦是一条经验，那就是感情与政治相互渗透，相互结合起来，而且以政治为主导加以处理，加以发展，在不断地改进着而得以巩固的。特附告你，供你参考。

* * * *

你的病虽已获得痊愈虽令我亦至感欣慰，但我仍很关切的祝福你能巩固下去，望你在工作中时刻注意保健，预防发病才好。我的病体已较前好多了。现还不能恢复正式工作。你从这封信上看到文句脱落之多，并且是分三次写成的。你可推知我的体力和工作效率了。不过我仍是满怀信心的注意调养和锻炼身体，争取能够恢复工作。

我在期待着你的回信！
紧紧的握手，祝你健康！

你的大姊邓颖超

一九五五年二月七日

邓颖超给袁雪芬的信，多达四十几封（其中多半包含着周总理的意见），对袁雪芬思想上的进步影响很大。如1958年11月，邓颖超在得知袁雪芬深入福建前线和上海街道演出时，给她写信说：“你经过福建前线演出所受到的锻炼，回沪后继之街头演出所经历的感受，想得益非浅，从而也可想见你的进步，这些都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喜慰，对你来说，这种锻炼是异常需要的。”“自解放后你就在党的关怀和教育下成长，现在又是经过几年锻炼的共产党员。在解放前你有过独立苦斗的考验，战胜了你面临的一切困难，没有屈服。你特别要时刻紧记你是一个战斗的共产党员，要坚持为共产主义奋斗，一切个人的事情都要放在从属的地位来处理……。”这些信，对袁雪芬的教育是深刻的。在生活 and 工作中，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她想起总理和邓大姐的话就充满了力量。

上海越剧在50年代到60年代，创造了一批有较高艺术质量的优秀剧目，尤其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红楼梦》、《祥林嫂》这四大精品，蜚声海内外。这四大精品都是在周总理关心下产生的。

1953年，《梁山伯与祝英台》准备被拍摄为我国第一部大型彩色影片。周总理指定袁雪芬扮演祝英台。影片拍成后，周总理带到1954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放映，招待各国记者，并请梁山伯的扮演者范瑞娟到日内瓦与美国喜剧电影大师卓别林会面，产生了巨大影响。事后，周总理见到袁雪芬时曾说：“雪芬啊，向你恭喜啊！你们为祖国争取了荣誉！我们的‘两台’（指《梁山伯与祝英台》和茅台酒）在那里很受称赞。”

同年，周总理指示将王实甫的《西厢记》改编为越剧，由袁雪芬

扮演崔莺莺。这出戏风格清丽典雅,体现了王实甫原作的精神,后来在出访东德、苏联、朝鲜时受到高度评价,出访前周总理每次都审查演出,提出修改意见。

《祥林嫂》初演在1946年,尽管当时影响很大,但受历史条件限制,剧本还有缺陷。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时,影片《祥林嫂》(1948年拍摄)曾得了一面奖旗。周恩来当时就请夏衍捎话给袁雪芬:颁发奖旗是为了表彰在国统区里改编鲁迅的作品,但戏本身还是有缺陷的,希望把《祥林嫂》改好、排好,要把鲁迅原著的精神很好地体现出来。为落实周总理的指示,1956年、1962年上海越剧院两次对《祥林嫂》进行了重新改编加工,不但体现了鲁迅原作的精神,而且在艺术上相当精致完美,为越剧表现近现代生活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周总理对袁雪芬,平易近人,处处关心。他曾三次到袁雪芬的家中。一次是1956年,周总理参加了上海文艺界的晚会后,不带警卫员,来到袁雪芬的家中,和她的全家亲切交谈。第二次在1957年,袁雪芬在产假中,周总理在送走外宾回北京之前,专门到她家看望,叮嘱她:“要注意身体,你以前生过肺病,趁产假里把身体养好,以后才能更好地工作。”1963年1月20日晚上9时,周总理和邓颖超又来到袁雪芬家中,问起两个孩子怎么样,要看看孩子。袁雪芬的大儿子才5岁,已睡在床上,听说要看他,偏偏向被子里钻。袁雪芬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拉出来,给他穿好衣裳。孩子怕陌生,一动也不动。周总理一把将他抱起来,亲切地哄着他说:“你不是长大了要当解放军吗?给周伯伯看看,行不行?你会打枪吗?打给我看看,我教你瞄准。”孩子的情绪很快被感染了,无拘无束地跟周总理打起玩具汽枪来。周总理和邓大姐与袁雪芬有说有笑地交谈了两个多小时,他们除问起剧院的工作外,还对袁雪芬说:“妇女要多一层负担,生了孩子难免有一些分心,我相信你这方面会掌握得很好的。”

在文艺政策、文艺思想上，周总理更是关心袁雪芬。

1960年，当时的文化部有关负责人决定将上海越剧院一团调至北京，成立直属文化部的“北京越剧团”。袁雪芬当时就不同意这种做法。周总理知道后，对文化部进行了批评。他说：“这简直是乱弹琴”，指出地方戏如果离开生根的土壤就会失去生命，指示越剧团还是回到上海。

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左”风肆虐，上海越剧事业亦受其害。1961年中宣部派伊兵率调查组到上海越剧院进行调查，写了长达3万余字的调查报告，指出越剧院存在的问题的症结是：不按艺术规律办事，包括袁雪芬在内的一些艺术家长期处于不演戏和无好戏可演的境地，主管部门某些领导作风浮夸，搞“一平二调”。这篇调查报告送到邓大姐那里，邓颖超了解了情况，专门给袁雪芬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雪芬同志：

你前不久的来信，我已收到。

在接你来信前，我已看到伊兵同志关于越剧团的调查报告，使我对你院有一个较系统、全面的了解，我想此调查对工作的改进会起有益的作用。

一个月前，我住院进行大手术，一切经过都很顺利，详情由恩来同志面告。

在此不多赘述。

你的近况如何？身体好吗？很惦念！

现给你带去印尼华侨送的燕窝、鱼翅，请收。

代我问妈妈及海芽好！

握手！

邓颖超

1961年7月12日

在周总理、邓大姐的关心下，袁雪芬在艺术上继续努力创新，

翌年，就对《祥林嫂》作了又一次加工，使内容和形式结合得更加完美。

1963年上海市委的负责人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把社会主义文艺只局限于表现社会主义生活题材的作品，把越剧称为“挖社会主义墙角”。袁雪芬想不通，在到北京参加中国文联扩大会议时，她特意去问了周总理：只演十三年究竟对不对？周总理说：“也不能那样嘛！如果只能写十三年，那不连我们党的历史也否定了？现在文化部正在审定二百个剧目。”袁雪芬听后，心里觉得踏实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袁雪芬和许多著名艺术家一样，受到诬陷、迫害。周总理、邓大姐对她十分关心。1967年1月，在乌云压城的日子，陈丕显的夫人谢志诚约袁雪芬在锦江饭店的理发室见面，转达了周总理捎的话，要她经受住考验，说红线女被剪了头发还没有灰心，鼓励她挺住。横遭不白之冤的袁雪芬知道周总理还在关心着她，感动得热泪盈眶。1971年，周总理陪同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上海，专门向张春桥问起袁雪芬的情况。正是在周总理的过问下，袁雪芬才得到形式上的“解放”，避免了更恶劣的厄运。

1974年，袁雪芬的大儿子中学毕业去农场前，到北京去了一次。袁雪芬写了一封信，让他带去看望周伯伯、邓妈妈。这时，周总理已病重住在医院了，邓颖超把信读给总理听后，总理说：“好，她经受了这场考验。这是严峻的考验，她会沿着这条路——马列主义的路走下去。”袁雪芬知道这番话后，提起笔来想写封信，但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她有多少话想向总理倾诉啊！她含着热泪写道：“希望你早日恢复健康！”

然而，她最担心、最不愿听到的消息还是传来了。1976年1月9日，袁雪芬正带着越剧院学馆的孩子们在上海国棉九厂深入生活，周总理逝世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般震动了她的心。她悲痛欲绝，直觉得精神失去平衡。她当天就写了一封信给邓大姐，表达全家人对周总理的沉痛悼念，并希望亲自去北京看望邓大姐。这封信

辗转 20 天才到了邓颖超手里。邓颖超马上嘱咐秘书赵炜给袁雪芬回了一封信：

袁雪芬同志：你好！

你给邓大姐的信，今日中午收到，我已念给她听了。她嘱我立即复信给你。她说，收到你的信，她的高兴冲淡了她的悲痛，终于盼到你的来信了。

你的来京心情可以理解，谢谢你。将来会有机会见面的，这次不必前来。她的身体还可以，逐渐恢复劳累。自从丧事办完后一直没有见什么人，这是为了她的更好休息，因为想见她的都是一些熟同志，见面后难免又悲痛，大家也都理解，只是在电话上和信中来问候。谢谢你们全家！

大姐问你们全家好！

祝

春节好！

赵 炜

1976 年 1 月 29 日

袁雪芬见邓大姐的愿望终于实现了。1977 年 10 月底，袁雪芬参加中国音乐家代表团出国访问来到北京。一下飞机，接待的同志就对她说：“邓颖超同志要见你。”那天，她买了一束傲霜的菊花，来到周总理生前居住的西花厅。一进房间，她就感到那么熟悉、亲切。在这里，周总理、邓大姐曾多次与她交谈。她捧着菊花，举目寻找着总理的遗像。这时，邓大姐听到声音，走出内室，袁雪芬见到她禁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好像苦难的孩子回到母亲身边。邓大姐说：“我们今天见面，我叫你一个人来，是想互相谈谈，你这样激动的话，我们今天一句也谈不成了。”她让袁雪芬坐下，又说：“我们是马列主义者嘛，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嘛，我们不应该哭。我从电视里看到你比过去更坚强了，我很高兴。过去我跟恩来同志常讲，雪芬这孩子性格上总有悲剧的成分。通过这些年的锻炼，你坚强了，悲剧性

格去掉了,我很高兴。”接着,她又听袁雪芬谈了这10年是怎么过来的。邓大姐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坚强的革命意志,深深感动了袁雪芬。还有一件事值得袁雪芬高兴:邓颖超告诉她,“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抄袁雪芬的家时抄去的周总理、邓大姐写给她的几十封信,都找到了。原来这些信上交到张春桥那儿,后来又转给了周总理,邓大姐整理总理遗物时找了出来。她对袁雪芬说:这些信都是你的,要还给你。不过,现在先不给你,我要复印一份保留下来,原件通过组织还给你。果然,不久袁雪芬在上海收到了这些信件。她看着这些信,心潮澎湃,回忆起周总理、邓大姐对自己的关心、教诲,感到受益终生。一年多后,袁雪芬参加以邓颖超为团长的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去日本访问,在朝夕相处中,她从邓大姐身上更直接、更形象地看到了周总理的思想作风和外交才干。

周总理对袁雪芬的关心,影响超越了国界。1978年一位第三世界某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访华,希望了解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如何领导艺术家的经验。在上海,他听了袁雪芬介绍周总理关心越剧和她本人的情况之后,深有感触地说:“我想了解的问题得到了圆满的答案。我形象地理解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周总理的领导方法。”

关于斯诺最后一次访华的几件史实

熊 向 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曾三次访华。第三次是在1970年8月至1971年2月，同来的有他的夫人洛伊斯·惠勒。这是斯诺最后一次访华，见闻观感收入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漫长的革命》（1971年纽约兰多姆出版社出版，中译本于197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伍协力。）

这些年来，一些有关斯诺最后一次访华的记述颇多讹误，本文举出三项具有代表性的例证，分别剖析，借以澄清所涉及的史实，并就正于知情者和党史学界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者。

一

1969年8月中旬至11月初，英籍女作家韩素音来我国访问。周恩来总理指定龚澎和我主持接待。韩多次提及斯诺希望再次访华。龚澎和我报告了周总理。总理说（大意），本来有这个打算，有些同志说他在外国渲染中国搞个人崇拜，现在不好考虑了。这件事摆一摆，将来请示主席再说。

“有些同志”指谁？总理没有讲，却也不难想见。至于斯诺是怎样渲染中国搞个人崇拜的，不妨摘引斯诺自己的一段文章：

1964年秋到1965年初（冬），我隔了五年之后又来到中国，旧地重游，几乎每一个地方的情况都大有好转，这使我非常感动。……1959—1962年的“困难时期”过去了，粮食已比较丰富，消费必需品和服务的供应都更加充足。工业的损失开始得到了弥补，集

体农业看来进行得很好。除了日益担心越南战火扩大以至同美国发生战争外，显然普遍感到轻松和乐观。

这个国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看来在政治上空前地团结起来了。

我在离开中国前不久，单独和两位老朋友进餐时曾说：“在整个情况中，只有一件事使我迷惑不解，那就是在我看来过分地颂扬了毛泽东。”现在他的巨幅画像挂在街道上，半身塑像摆在每一间会议室里，他的书和相片到处都是，把别人的都排挤掉了。在长达四小时的革命歌舞剧《东方红》中，毛是唯一的英雄。作为这场有两千人参加演唱的、专为来访的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和王后演出的歌舞剧的一个高潮，我看到了一幅放大到30英尺高的画像，那是依照我在1936年拍摄的一张相片复制的。这使我产生了一种复杂的心情，一方面对摄影技巧感到得意，另一方面很感不安地想起了战时在俄国看到的对斯大林的类似的狂热崇拜。

……但当我见到主席时（按：1965年1月9日），我还是向他问道：“苏联批评中国在助长个人崇拜。这有根据吗？”毛回答说，也许有吧。据说斯大林曾是个人崇拜的中心，而赫鲁晓夫则完全没有个人崇拜。批评的人说，中国人民有一些（这种情感或做法）。有一点个人崇拜也许是有道理的（更多呢？）。他最后说，赫鲁晓夫垮台也许就是因为他完全没有个人崇拜（《漫长的革命》中译本第67页至69页。以下所引斯诺的话，均出自该书，引时不再说明书名，只注中译本的页数）。

1997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以下简称《年谱》）下卷1969年部分载有：“8月18日，会见埃德加·斯诺和夫人。”“10月19日，会见斯诺和夫人。”我看后致函《年谱》下卷副主编安建设，询问上述记载是否有误。安复信说：“周总理1969年8月18日、10月19日确实没有会见斯诺夫妇。这两次会见均依据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外交

活动大事记(1949—1975)》。周总理工作台历 1970 年 8 月 18 日(晚 10 时半)、10 月 19 日(晚 8 时半)记有会见斯诺夫妇。这是我们编写时发生的讹误。类似情况,《年谱》中可能还有,请随时予以指正,以便再版时修正。”这封信谦虚坦诚,激励我先就此事进一步查核。

1993 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以下简称《大事记》)1969 年部分载有:“8 月 18 日晚上,在首都体育馆接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和夫人。”“10 月 19 日晚上,接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和夫人。”对照安建设信中所述的周总理工作台历,我猜想可能是《大事记》的编者把 1970 年误为 1969 年。但《大事记》的《编后记》中说,这部《大事记》“编录了周总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外交活动共达六千余次。材料来源于外交部保存的周总理外交活动的档案和 1949 年至 1976 年《人民日报》有关周总理外事活动的报道。内容力求全面、翔实,有较高的资料价值。”经查,1969 年《人民日报》并无周总理接见斯诺和夫人的报道,而斯诺和夫人 1969 年确未来华。斯诺写道:“1960 年,我终于能重来中国,1964 年至 1965 年又来过,这一次是 1970 年来的。我的当演员的妻子洛伊斯·惠勒以前从未去过中国,……这一次她不等华盛顿的‘批准’就来了。……我们于 8 月初到达北京。”(第 5 页至 6 页)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已不复存在,难以查询,但可以设想,不会有周总理在 1969 年接见斯诺和夫人的档案。顺便指出,《大事记》最后一天是 1975 年 9 月 7 日:“在医院会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因此,《编后记》中“1949 年至 1976 年《人民日报》有关周总理外交活动的报道”的说法并不确切。

在斯诺 1970 年 8 月至 1971 年 2 月最后一次访华期间,《年谱》共有七处记载,现抄录或摘录如下(删节号、“略去”、“按”都是我加的):

1970年

9月(按:无日期,置于9月30日之后) 安排来华访问的斯诺夫妇参观北京反帝医院,……在林巧稚陪同下,斯诺在医院观看了两例针刺麻醉手术,并照了相,之后,周恩来针对“让外国人看针麻手术是泄密”的说法,指出:斯诺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是我把针麻向外公开的首发权送给了他,要他好好为我们宣传。斯诺先生说那天的时间太仓促,没有看好。应再给他安排一次,一定要满足他的要求。

10月1日 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二十一周年庆祝大会并检阅游行队伍。将斯诺和夫人引见给毛泽东。毛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

10月19日 会见斯诺和夫人,谈及中国针灸麻醉、核试验、自身健康情况等。……在谈到健康状况时说,在身体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败了,所以要打球蛋白了。因为睡得少,所以使我健康减弱了,近四年心脏有毛病,年纪已近七十三了。(按:这段文字极为感人)

11月5日 与斯诺及其夫人长谈。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中美谈判从一九五五年开始到现在,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为要解决问题,现在就要谈台湾问题,就是美国武装侵略和占领了台湾及台湾海峡,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对此,我们谈判的态度和方针不会改变,应改变的是美国政府。我们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按:略去关于中苏关系及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的内容。)我们反对强权政治,反对大国垄断。因为应该说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谈话中,还就有关核裁军以及其他国际问题阐述了看法。

12月7日 致信黄华,请他写一简单报告,说明斯诺夫妇来华后的访问情况,以便报毛泽东接见。并特别注明:“请你们在这样一个报告上,不要提请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接见了。”(按:这是非常重要的史料)

12月18日 毛泽东会见斯诺，回答他提出的有关“文化大革命”、中美关系等问题。……毛泽东还提出可由斯诺对外发表周恩来同斯诺的谈话。

1971年

1月15日 同斯诺就中国国内问题长谈，向斯诺提供了有关国内生产情况的数字，认为总的形势是好的，基础经济受到的损失是相当有限的。（略去关于精简机构、下放干部问题的谈话内容）

《年谱》中上述记载一开始就是“安排来华访问的斯诺夫妇参观北京反帝医院……”，使人看后感到突兀。据安建设信，“周总理工作台历1970年8月18日（晚10时半）记有会见斯诺夫妇。”据《大事记》：1970年“8月18日晚11时30分，在首都体育馆贵宾室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和夫人。”1970年8月19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在《周总理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和夫人》的标题下，载“新华社十八日讯”，内称斯诺和夫人“是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来我国进行访问的”，并称，会见时，该会“理事黄华在座”。《年谱》8月18日却是空白。

这段《年谱》及本文其他各节均涉及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同斯诺的谈话。这次谈话共五小时，翻译是唐闻生，记录是王海容。这次谈话记录印发范围很小，所列密级较高。但197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发给党、政、军、各部委及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的通知（未列密级）说：“现将《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发给你们。此件请印发党的基层支部，传达至全体党员。”“如非党员干部和群众……提出问题时，亦请以毛主席的谈话为准予以回答和解释。”中央转发的《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以下简称《纪要》）特别注明（已经毛主席审阅）。《纪要》未列密级。

斯诺将这次会见以《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为标题，写一短文，

发表于1971年4月30日美国《生活》杂志。斯诺以同一标题及该文除导语外的全部内容收入《漫长的革命》一书。(以下所引斯诺的话,均据该书中译本,引时不注书名,只注页数。)

对照《纪要》,《年谱》中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斯诺”一段概括得不够确切,而最后一句“毛泽东还提出可由斯诺对外发表周恩来同斯诺的谈话”则完全错了。据《纪要》,毛主席同斯诺谈话开始不久就说:“我看你发表跟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比较好,同我的不要发表。意大利杂志上的这一篇我看了,我是看从外国文翻译成中文的。”毛主席是指1970年12月13日意大利《时代》周刊上发表斯诺写的《同周恩来的谈话第一部分》(谈外交问题)。在西方国家,杂志的发行日期常比标明的出版日期早几天。12月13日出版的意大利《时代》周刊12月10日就发行了。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1970年12月11日下午版就以《外电纷纷转播〈时代〉周刊发表的周总理同斯诺的谈话》为题,刊载了[合众国际社]、[美联社]、[路透社]10日自意大利米兰发的电报,在导语中,多引用周总理所说中、美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电讯中有的突出说明“这是文化革命以来共产党中国领导人同西方记者的第一次谈话”;有的着重指出斯诺是“美国作家、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有的则提到“《时代》周刊说它对这篇谈话拥有世界版权”。在此后几天的《参考资料》中,还相继刊载了《法报报道斯诺发表的周总理同他的谈话》,《日报报道周总理会见斯诺并发表述评》,乃至《伊拉克赞比亚报纸报道周总理同斯诺的谈话》。日本《产经新闻》转载法新社米兰电,并以《从外交上动摇美国》为题,发表述评说,“周总理对闻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是重申中国过去的态度,再次说明美中之间的最大障碍是台湾问题”,“华沙会谈自今春美军进攻柬埔寨以来中断,至今没有恢复”,“即使华沙会谈恢复,如果美国不改变它的对中国政策,谈判也不会有进展。因此,可以说周总理的谈话是从外交上动摇美国”。

《参考资料》1970年12月18日上午版在《意〈时代〉刊登斯诺报道周总理同他的谈话第一部分全文》的标题下，载“[新华社日内瓦十五日意文电] 意大利《时代》周刊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三日刊登了埃德加·斯诺报道周恩来总理接见他的谈话。这家意大利杂志在文章中刊载了两张周总理的照片，一张斯诺的照片和两张描写中国生活的照片。下面是斯诺报道周总理同他的谈话的第一部分的全文。”现摘录一些段落：

下面是我同周恩来总理进行的四小时谈话的第一部分，这次谈话是在我到达北京后同他进行的一系列短暂的谈话之后进行的。

我们的谈话是以分析中国的新的国际关系开始和结束的。中国外贸的扩大，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特别是同意大利和加拿大建交——以及很快就要同另外一些国家建交，决定了中国新的国际联系。在中国，人们认为，这些突破的结果是，福摩萨政权孤立了，美国和日本在联合国及其成员国中在福摩萨问题上更孤立了。

在中法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时，北京热烈地欢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第二次到中国正式访问，这是华盛顿包围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失败的又一明显的证明。

中国总理说，(对美国的)反叛到处都有。在西欧，同蒋介石保持关系的国家已剩下不多几个了。在另外一些承认中国的国家中，意大利的承认实际上是结束了想在“两个中国”上妥协的幻想。在争夺中国市场的竞争中，意大利的竞争现在不仅为联邦德国所重视，而且也受到日本的重视，也许可以说日本更为不安。

中国人从人们激烈反对五角大楼在亚洲及其他地区的军事冒险，从军费开支毫无限制而美国国内的一些重大问题却被忽视的情况中得出结论说，美国人民已经得到了有益的教训，特别是从越南的灾难性战争中得到了教训。

目前，中国已经摆脱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长期严重的“倒

退”，恢复了自己同外界的联系，很明显，中国要建立一个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按照毛主席五月二十日的声明，这一战线并不排除美国人。

西方观察家们今天说，中国的态度是“开放的”，这种态度可以说是谨慎的革命乐观主义同高度警惕以及预防不幸的混合物。

显然，毛主席并不期望美国革命很快会发生，中国的对外政策也不是建立在这样的推测之上的。中国寻求别人支持的政策是很有限的。……它不仅要求美国军队从亚洲大陆和福摩萨撤出，而且要求所有的外国军队都从他们占领的地方撤回，这样就使得各国人民都能享受在不受外来威胁和干涉的情况下解决自己问题的权利。

只要认真地读一读中国的正式文件，就会从中得出很多初看时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周恩来在几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非常严肃的和以其他方式的谈话之后，同意同一个美国作家谈话，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现在，我周围的人们在如下这一事实中看到了一个吉兆：在现代化的交通时代，马可波罗的祖国同古老的“中华帝国”的后裔重新建立了关系。

为行文方便及避免重复，斯诺在这篇报道中关于周总理谈中美关系的两段话，将放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叙述（其要点在上述外电中已作了勾勒）。这里要指出，毛主席对斯诺的这篇报道非常重视。前已提及，毛主席在同斯诺谈话不久就说：“意大利杂志上的这一篇我看了。”对这次会见，斯诺写道：“当主席在他的书房门口迎接我时，……我对要主席等候这一点表示了歉意。他没有预先通知我，传唤我时我已经入睡了，那是在清晨。我们共进了早餐，一直谈到下午一点钟光景。主席稍微有点感冒。”（第167页）在清晨，《参考资料》上午版还不会送到。一向认真阅读《参考资料》的毛主席当然注意到此前《参考资料》有关斯诺的报道的电讯。新华社常将重

要电讯专门即时印送中央领导人，对意《时代》周刊的那篇报道全文可能就是如此处理的。据《年谱》，12月7日周总理函告黄华写有关斯诺访华的简报，“以便报毛主席接见”。毛主席在12月18日不顾“稍微有点感冒”，于清晨突然把斯诺请来，很可能是在看到斯诺那篇报道全文后临时决定的。毛主席对斯诺所讲的关于尼克松访华的那些话，很可能也是由斯诺的那篇报道引发的（下节再作探讨）。

还应补充一点：1971年2月28日意大利《时代》周刊（与美国《时代》周刊不是一家）发表了斯诺写的《同周恩来的谈话（第二部分）》（即国内部分），该刊编者按说：“这篇文章具有极大的文献价值——在文章里，十多年来第一次正式报道了有关中国国内形势的数字和材料。”4月25日，该刊又发表了斯诺写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医疗革命》，介绍了中国针灸、保健组织、赤脚医生及大规模的节制生育运动。

《年谱》内容丰富，但也不能包罗过多。以上并不是要求《年谱》再版时酌情补入，而是借此提供一些史料，并试作一些探讨。

二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的《百年潮》（双月刊）自1997年1月面世以来，受到广泛的注意和许多专家学者的好评。该刊稿约中提出“以‘信史、实学、新知、美文’为衡文标准”、“真实视为最高准则”，尤其值得称道。在众多稿件中难免有不够真实之处，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该刊的处理是严肃的。该刊1997年第二期载有汪向同写的《我的丈夫冀朝铸：中美关系的见证人》。文末说明：“本文原为《我的丈夫冀朝铸》一书（山西教育出版社近期出版）中一章，这次发表前经作者同意，适应本刊需要对原文作了一些调整增删，并重拟了大小标题。”该刊第四期发表了编者写的《我们的信心和希

望》，谈到读者对该刊“除了热情的鼓励，也有恳切的批评”时，提及我曾口头指出“《中美关系的见证人》一文”中的“一些不够全面、不够准确、甚至错讹之处”，“作者已赶在该书出版之前改正了……某些错讹”。编者和作者的这种态度是可佩、可贵的。

有些同志问我，《我的丈夫冀朝铸：中美关系的见证人》一文有哪些“不够全面、不够准确、甚至错讹之处”？这里我只谈与斯诺最后一次访华有关的问题。汪向同的文章（以下简称汪文）在第一部分说：“1970年国庆，朝铸被召到天安门上去当翻译。”“正当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检阅游行队伍时，朝铸忽然看到周总理带着斯诺夫妇向毛主席走去。朝铸赶忙走过去，为主席和斯诺做翻译。”汪文的第三部分有以下一段：

朝铸说，1970年《人民日报》刊登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和斯诺在一起的大幅照片，就是给全世界、特别是美国一个信号：中国要同美国和解。当时林彪也在天安门上，但是他一见斯诺便躲开了，这一行动被解释为他反对同美国有任何和解。不过毛主席送出的信号当时并没有生效，因为美国并不重视这次会晤，认为斯诺是亲共分子。斯诺回国后写了有关中国的长篇文章给《纽约时报》，也没有被刊登。

在这里，我无意对这段文字进行挑剔，而是借此写出我所知道的有关史料：

（一）1970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报头右侧《毛主席语录》栏刊载“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下面在《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的通栏标题下，以将近半版的篇幅并排刊登一段文字和一张照片。照片约占版面的四分之三，照片左侧（约占版面的四分之一）横排分行刊印“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最近会见了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先生，并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下面是照片的说明：“毛主席、林副主席今年十月一日同斯诺在天安门

城楼上。新华社发”。照片上共四人，第一排自左至右为斯诺、毛主席、林彪；第二排在斯诺和毛主席后面中间是冀朝铸。

有些文章说，这张10月1日的合影刊登在10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这是“想当然”。斯诺则写道：“在主席七十七岁寿辰那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第2页）。这也不正确。毛主席的生日是12月26日，而12月25日则是圣诞节。美国《生活》杂志1971年4月30日发表斯诺写的《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一文中，也刊登了一张照片，照片的说明是：“去年秋天埃德加·斯诺和毛及一位译员一起检阅十月一日的游行。”照片自左至右为斯诺、毛主席，中后为冀朝铸，而没有林彪。

（二）汪文说，《人民日报》刊登这幅照片，“是给全世界、特别是美国一个信号：中国要同美国和解。”乍一看，似乎如此，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中国要同美国和解”的论断不正确。按照这一论断，不是美国要同中国和解，而是“中国要同美国和解”，那就意味着，是“中国”首先向“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发出这样的“信号”。历史事实如何呢？请看1969年1月20日就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的回忆录。尼克松写道：“我认为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非常重要这一想法，是我在1967年为《外交季刊》写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我在就职演说中提到了这一点，……不到两个星期以后，在2月1日，我写了一个备忘录给基辛格，主张我们竭力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尼克松回忆录》中译本，197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册，第229页。以下所引尼克松的话，均出自该书中册，引时不再注明，只注页数。）在严格的命令下，1969年12月3日，美国驻波兰大使不顾外交身分，在华沙的一次时装展览会上，紧追中国驻波使馆的译员，说奉尼克松总统指示，要和中国进行重大的会谈。这就使中断已久的第一三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得以举行。稍后，又举行了第一三六次会谈。但尼克松对此还不满意。他说：“1969年这一年，中国人没有理睬我们几次在低水平上发出的

重要信号。……对华主动行动的第一个认真的公开步骤是在1970年2月采取的，那时我向国会提出了第一个外交报告。”(第229页)基辛格则说：“总统的这个报告是在二月华沙会谈之前两天公开发表的：‘中国人是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的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基辛格：《白宫岁月》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二册，第339页。以下所引基辛格的话，除另有说明外均出自该书第二册，引时不再注明，只注页数。)这是尼克松第一次公开发出“美国要同中国和解”的信号。1970年3月18日，美国乘西哈努克亲王出国之机，策动柬埔寨政变。不久，中国方面宣布，鉴于美帝悍然侵柬，按原定日期举行第一三七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已不适宜。接着，北京向“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发出“信号”，并非“中国要同美国和解”，而是5月20日毛主席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美国的反应是出人意料的。尼克松写道：“10月初，我接见了《时代》杂志的记者。我说：‘如果说我在死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第230页)这是尼克松第二次公开发出“美国要同中国和解”的信号。10月26日，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到达华盛顿。基辛格写道：“尼克松在国宴上致祝酒词时谈到美国和罗马尼亚的许多共同利益，其中突出地列举了罗马尼亚和美国一样都希望和苏联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良好的关系。一位美国总统用中国的正式名称这还是第一次。”(第353页)尼克松更为坦率地说：“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来进行国事访问。……在欢迎他的宴会上祝酒时，我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有意地用正式名称称呼共产党中国，即称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第231页)这是尼克松第三次公开发出的信号。此外，尼克松私下还通过一些途径向周总理传话。据《年谱》，1970年10月，“尼克松

分别向正在访美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表示,中美和解十分重要,……并提出愿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华。”(下卷,第406页)11月10日,来京的叶海亚·汗向周总理转达了尼克松的口信;11月21日,来京的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勒杜列斯库向周总理转达了尼克松的口信。周总理请示毛主席后,分别请他们向尼克松转达口信。因此,1970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的版面,只能说是对尼克松多次发出的美国要同中国和解的信号的首次公开回应。

(三)汪文说,“毛主席送出的信号当时并没有生效,因为美国并不重视这次会晤,认为斯诺是亲共分子。”这里所说的“信号”应是指“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和斯诺在一起的大幅照片”和“这次会晤”。美国的反应如何,这里只引用基辛格和尼克松的话。基辛格写道:“十月一日,中国国庆节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老朋友)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游行队伍,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第352页)姑不论基辛格的理解是否正确,但这说明他对这张照片很重视(基辛格没有说斯诺是“亲共分子”,而说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老朋友”)。尼克松写道:“12月18日,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会见了他的老朋友毛泽东(按:这与基辛格的上述称谓相同)。毛告诉他,外交部正在考虑允许左、中、右各派政治色彩的美国人访问中国。斯诺问,会不会允许像尼克松这样一个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右派来?毛回答说,我将受到欢迎,因为我是总统,中美之间的问题毕竟还得同我解决。毛说他将乐于同总统谈话,不论作

为旅游者或者总统来都好。毛的这些话，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第 232 页）姑不论尼克松对毛主席的话引用得是否正确，但确实表明了他对“这次会晤”的重视。

（四）斯诺和夫人 1971 年 2 月结束访华，并未像汪文所说“回国”，而是回到斯诺从 1959 年起就定居的瑞士。那时斯诺是否“写了有关中国的长篇文章给《纽约时报》”，是否“没有被刊登”，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美国《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的创办人亨利·卢斯是坚决支持蒋介石、反对新中国的人。他于 1967 年逝世，但到 70 年代仍有影响。基辛格不无幽默地说：“尼克松是在十月间在和《时代》周刊记者的谈话中第一次公开表示愿意访华，而毛泽东则在后来由《生活》杂志刊载的他的谈话中第一次表示欢迎尼克松访华。这两次谈话无疑使亨利·卢斯心神十分不安。”（第 357 页）。基辛格还谈到“詹姆斯·赖斯顿的戏剧性事件”。1971 年 7 月 9 日基辛格秘密抵达北京，对此毫无所闻的《纽约时报》副社长詹姆斯·赖斯顿在 7 月 8 日到达广州，12 日到达北京。基辛格写道：“到七月十五日，赖斯顿才获悉我曾去北京，这使他身感剧痛。……那不是新闻记者因未赶上报道大新闻而懊恼欲死，其实是急性盲肠炎。他于七月十七日开刀，割去了盲肠，是在北京反帝医院动的手术。……想到近在身边都错过时机，不能抢先报道这样重大的新闻，这种内心的痛苦是什么药都治不了的，就是中国人也没有办法。”（《白宫岁月》中译本，第三册，第 29 至 30 页）

由汪文引起的话题到此结束。现就 1970 年 12 月 18 日毛主席同斯诺涉及中美关系的谈话提供一些史料和看法。前已提及，尼克松在回忆录中说：“毛的这些话，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基辛格对此提出异议。他写道：（毛）“当时把翻译唐闻生所作的记录给了斯诺，但是在几个月内不容许在他的文章中发表”，“我们过了几个月后才得悉这个谈话”（第 357 页）。基辛格还加上很长的注释，注释的最末一句是：“尼克松所说的想必是指，他在我秘密出访之前

已知道毛泽东的谈话。这是对的。”(第397页)斯诺所写的《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一文发表于1971年4月30日,基辛格“秘密出访”是在1971年7月。说斯诺的文章发表了两个多月以后,尼克松才“知道毛泽东的谈话”,这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斯诺在《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中说:“毛主席强调,他不希望进行接见记者式的谈话。我们进行的是一次交谈。不过,后来我得到证实,他将不反对在不直接引用原话的情况下发表他的某些意见。”斯诺是在何时、通过何人“得到证实”的,他没有讲,现也难以查考,但斯诺并未说“在几个月内不容许在他的文章中发表”。

为了澄清此事及有关问题,现将《纪要》的开头部分摘录如下:

斯诺:我经常想给你写信,但我真正写信打扰你还只有这一次。

毛主席:怎么是打扰呢?上次,1965年,我就叫你找我嘛。你早找到我,骂人,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按:这表明,斯诺1969年要求访华,未获允准,他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让他来。)……到处打,分两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斯诺: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

毛主席:就是那个时期。……多数还是好的,也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五·一六”。

斯诺:有一个问题我不清楚,即主席对我讲这些,是供发表用,还是作为介绍背景材料,还是朋友之间的交谈,还是三者兼而有之。

毛主席:不供发表。就是作为学者,研究者,研究社会情况,研究将来,研究历史嘛。我看你发表跟周恩来总理的讲话比较好,同我的不要发表。意大利杂志上的这一篇我看了,我是看从外国文翻译成中文的。

斯诺:你看写得可以不可以?

毛主席：可以嘛。……

在这里，毛主席说“不供发表”，但又说“作为……研究将来，研究历史嘛”。

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约见斯诺，主要不是同他谈“文化大革命”，而是在看到12月13日意大利《时代》周刊刊登斯诺写的《同周恩来的谈话第一部分》全文后，着重同他谈中美关系问题。比照斯诺的这一报道，可以看出毛主席在肯定周总理谈话的基础上，提出了极为重要的新方针：

（一）斯诺的报道说：“周恩来对美国人民表示了友好的感情，他强调说，他的政府总是根据具体情况处理‘中国的朋友’的访华要求，‘具体问题具体解决’，他举了我和我的妻子的访问作为例子。”

毛主席对斯诺说（据《纪要》）：“今天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的产业高于世界各个国家，文化普及。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尼克松解决。”

（二）斯诺的报道说：“一九六〇年周恩来向我谈过解决福摩萨问题（即台湾问题—引者）和中美建立关系的条件，一九六五年又说过一次。现在，总理肯定说，这些条件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中国的政策要求：第一，美国承认福摩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要从福摩萨岛和福摩萨海峡撤出它的武装部队；第二，中国和美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要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实行和平共处。

“尼克松担任总统之后说，愿意和缓中美关系，要跟中国谈判。确实，十五年来，中美在断断续续地进行大使级会谈。但是，为什么没有结果，这是很清楚的。福摩萨问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关键问

题。周恩来这样对我说：‘福摩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国人民有权利解放这个岛屿。美国在那个地区的武装侵略是另一个问题，是国际问题，我们愿意对此进行谈判。’总理还说，‘门是敞开的，但是这完全要看美国是否打算认真解决福摩萨问题’。”

按：这段话的重点是：解决中美关系“完全要看美国是否打算认真解决福摩萨问题”。

据《年谱》，1970年11月14日，周总理“在回答叶海亚转达的尼克松的口信时说：因为尼克松通过阁下调告的是口信，我们也应该通过阁下作口头回答。阁下清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谈了十五年还没有结果。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指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

按：这个口信和斯诺上述报道是一致的，都是毛主席同意的。口信中说：“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但前提是“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指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

12月18日毛主席同斯诺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很难概括，现按《纪要》摘录重要的段落：

毛主席：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有，但比较少一点。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口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所以，我说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斯诺：有一、两件事想跟你探讨一下。第一是尼克松来华的问题，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目前他来是不现实的，但尼克松来华被认为是理想的。第二是关于美国人访华的问题，我能作为一个例外，感到格外高兴。

毛主席：但你代表不了美国，你不是垄断资本家。

斯诺：当然，我也刚要这么说。

毛主席：那是尼克松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外交部知道，不要通过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不要公开，又是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他选举是哪一年？

斯诺：一九七二年。

毛主席：我看，七二年的上半年他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搞的。然后又是一个总统，那里他也有一份就是了。然后又是肯尼迪。尼克松当过副总统，他那时跑过台湾。他说台湾有一千多万人。我说亚洲有十亿人，非洲有三亿，都在那里造反。

……

斯诺：尼克松在南亚陷得越深，就越是发动人民起来反对他。

毛主席：好！尼克松好！我能跟他谈得来，不会吵架。

斯诺：我不认识尼克松，但如果我见到他的话，是否可以说……（按：这里的删节号是《纪要》原有的，意味着斯诺尚未说完。）

毛主席：你只说，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这个勃列日涅夫不好，勃兰特也不算怎么好。

……

斯诺：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

毛主席：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 Long Island（长岛）。

以上说明，毛主席说，“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

也行,谈不成也行”,这里的“谈”,当然是指斯诺所报道的“周恩来向我谈过解决福摩萨问题和中美建立关系的条件”,首要的是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要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武装部队,这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中美关系,实现中美建交。如果尼克松同意这样做,就是“谈得成”。毛主席估计到尼克松虽一再表示访华的愿望,但难以很快迈出这样大的步子,因此一面向斯诺讲,“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搞的”,同时又指出“尼克松当过副总统,他那时就跑过台湾。他说台湾有一千多万人”,“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毛主席从战略上考虑,没有以“谈得成”作为尼克松访华的先决条件,而是以“何必那么僵着”,为尼克松留下“谈不成也行”的余地。刚发表了《同周恩来的谈话第一部分》的斯诺,当然看出了毛主席所说与周总理所说的不同之处,当然理解毛主席这番话的极端重要性,当然懂得这是多次公开发出“美国要同中国友好”的尼克松所急于知道的。鉴于毛主席在讲话中一再提到尼克松要求严守秘密,因此,经验丰富的斯诺没有问毛主席可否发表,而是问:“我不认识尼克松,但如果我见到他的话,是否可以说……”毛主席不等他讲完,就打断说:“你只说,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虽然毛主席的答话有点海阔天空,实际上是同意了斯诺的愿望,何况在开始时毛主席就对斯诺说,“你就捎个口信”。在看到12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的版面后,斯诺更加心领神会:毛主席就是要他将上述谈话内容通知尼克松。

这是主观臆测,牵强附会么?非也!请看论据:

《漫长的革命》一书有两篇附录,其中一篇是斯诺写的题为《山南海北》的文章,副题是《1965年1月9日:同毛泽东主席的谈话》(第190至230页)。文中记述了毛主席对中美关系、越南战争等重大问题的看法。斯诺问毛主席:“我从未见过约翰逊总统,但是我想,如果你有什么信息要给他,我也许能够带去交给他。你有什么

话要对他讲吗？”“主席停了一下说：不需”（第 225 页）。虽然如此，斯诺却另有理解。他写道：“1965 年我们谈话的那天，《人民日报》登载了一幅毛主席和我的大照片，我只被介绍为《西行漫记》的美国作者。……发表了这次谈话，在政府和党的机关刊物上又刊载了这次会见的报道，这显然加重了这件事的分量，它绝不是什么普通的旧友重逢。在我看来，多半是毛想通过这种方式，把中国对战争与和平的见解尤其是对越南问题的看法通知美国。”（第 194 至 195 页）

斯诺在谈到他 1970 年的中国之行时，说他的夫人“以前从未去过中国”，“过去几次，美国国务院拒不‘批准’她申请去中国旅行的护照”。斯诺接着写道：“我自己在 1960 年和 1965 年旅行中国的护照，只是在我的出版人向华盛顿的高级官员施加了压力以后才‘批准’的。后来我的访华报告当然也受到这些高级官员的忽视。但十多年来我未能把我的报告中的一些有用的消息渗透到高层决策部门中去（还有 1963 年约翰·肯尼迪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所说的‘同中国开始新关系’的可能性，未等实现就被他忘掉了，而在他的总统任内，反而陷我们于越南战争的丛林之中）。这些情况我已在别的地方谈过了。”（第 5 至 6 页）

斯诺并不讳言他曾向美国高级官员提出访华报告，并称上述的“有用的消息”未被美国决策部门采纳。然而，1970 年的美国处境不同于 1965 年或 1960 年，尼克松的政治胆识也不同于约翰逊或肯尼迪。因此，尼克松说，“毛的这些话，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至于斯诺采取什么办法这么快地就使尼克松知道了，这是难以查考也无需查考的事。至于基辛格为什么对尼克松的说法提出异议，也许尼克松没有对他讲，也许另有原因，这都不必深究。

应该指出，如果斯诺及时发表毛主席同他的上述谈话，必然会比他在意大利《时代》周刊发表同周总理的谈话造成更大的轰动效应。但是斯诺并未这样做。这并不是由于某人“在几个月内不容许

在他的文章中发表”。实际上,1971年4月18日,意大利《时代》周刊就发表了他写的《我们同毛泽东谈话》,文中披露了毛主席讨厌对他的个人崇拜以及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委与经过,而毫未涉及尼克松访华一事。4月30日,美国《生活》杂志发表了他写的《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文中谈及尼克松访华只是短短两段:“外交部正在研究让左、中、右各派的美国人都来访问中国。是否应当让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尼克松这样的右派来呢?应当欢迎他来,因为,毛解释说,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各种问题需要跟尼克松商量解决。毛将高兴同他晤谈,他作为一个旅行者也行,作为总统也行。”(第171页)“我(按:指斯诺)代表不了美国;我不是一个垄断资本家。我能够解决台湾问题吗?何必那么僵着?蒋介石还没有死。但是台湾关尼克松什么事?这个问题是杜鲁门和艾奇逊搞出来的。”(第172页)这篇文章已不具有多少新闻价值。《生活》杂志将它排在这一期的第三篇,刊在第46至48页。这一期的封面及头两篇都是应邀访华的美国乒乓球队的照片和报道。

1972年初,斯诺病重。1月22日,毛主席、周总理派出医护小组去瑞士斯诺住所。2月8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奉周总理指示专程到瑞士探望斯诺。2月15日(中国春节)斯诺逝世。2月16日毛主席的唁电说:“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周总理的唁电说:“斯诺先生的一生,是中美两国人民诚挚友谊的一个见证。……甚至在他病重期间,他仍念念不忘为增进中美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而工作。……”

斯诺曾对毛主席说:“我不认识尼克松。”但1972年2月12日,尼克松在行将访华之前,给生命垂危的斯诺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内有“你那举世瞩目的卓越事业”的赞语(罗斯·特里尔著:《毛泽东的后半生》,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83页)。1972年2月21日,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时说:“所以,我跟早几

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一定要谈成？”尼克松说：“他的死是很令人悲伤的。”尼克松总统应邀访华，在中美关系史上和国际关系史上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斯诺对此所作的贡献是不应湮没的。

三

《年谱》称，“毛泽东会见斯诺，回答他提出的有关‘文化大革命’、中美关系等问题。”这一概括并不确切。从上面引述的《纪要》看，“文化大革命”和中美关系问题，都是毛主席首先主动地向斯诺讲的（中间斯诺有几个插问）。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也是如此。据上面引述的《纪要》，当毛主席讲到“意大利杂志上的这一篇我看了”，斯诺问：“你看写得可以不可以？”接着就是下面一句：

毛主席：可以嘛。你的那些什么错误有什么要紧？比如：说我是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哥伦比亚区。

联系到《纪要》开头斯诺所说：“我经常想给你写信，但我真正写信打扰你还只有这一次”，可以推想，斯诺在信中似乎承认所谓毛主席助长个人崇拜的说法是个错误。但斯诺没有提到这些，在《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一文中，他对个人崇拜问题是这样写的（删去一些无关的话）：

我们谈到了我写的关于我们上次1965年1月谈话的报道，在那篇报道中，我写道，他承认中国确有“个人崇拜”——而且有理由搞“个人崇拜”。因为我写了这一点，有些人曾批评过我。

他说，就是写了在中国有“个人崇拜”，又怎么样呢？有这样一回事嘛。为什么就不能写呢？它是事实嘛……毛继续说，在我们1965年进行谈话的时候，许多权力——各个省和各个地方党委内，特别是北京市党委内的宣传工作的权力——他都管不了的。正

因为如此，他那时曾说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以便鼓动群众去摧毁反毛的、党的官僚机构。

当然个人崇拜也搞得过火了。今天，情况不同了。……所谓“四个伟大”——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多么讨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Teacher”（导师）这个词——那就是教员。毛历来是当教员的，……其他的称号将一概辞去。

我说：“我常常想，不知道那些喊拥护毛的口号最响、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就象有些人所说的，在打着红旗反红旗。”

毛点点头。他说，这些人分三种。一种是真心实意的。第二种是随着大流的——因为别人喊“万岁”，他们也跟着喊。第三种是伪君子。我（按：指斯诺）一定不要受这一套的骗。

我说：“我记得，就在你1949年进北京之前，中央委员会曾通过一个决议，据说是根据你的建议，禁止用任何人的名字来给街道、城市或地方命名。”

他说，是的，他们避免了这种做法；但是，其他的崇拜形式出现了。有那么多标语、画像和石膏像。红卫兵坚持说，如果你周围没有这些东西，你就是反毛。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应当降温了。

他接着说，但是，难道美国人就没有自己的个人崇拜吗？各州州长、各届总统和每个内阁成员，没有一些人去崇拜他，他怎么能干下去呢？总是有人希望受人崇拜，也总是有人愿意崇拜别人。他问我说，如果没有人读你的书和文章，你会高兴吗？总是要有点个人崇拜嘛，这也适用于我（按：指斯诺）。（第168至170页）

以上就是斯诺在《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据中译本）中所写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全部内容（未按《纪要》校正）。

据原记录，斯诺认为毛主席谈的很坦率，他提到两位定居北京的美国朋友，说他们谈到这个问题时不像毛主席这样坦率。对此，

毛主席说：“你们有点迷信，还有一点恐惧，怕说错了话；我不怕说错话，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唐闻生翻译时说明，“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意思是无所畏惧。

《生活》杂志刊登的斯诺的文章中没有提到这些，却在该文倒数第二段写了一些无中生有、生编硬造的话。《参考资料》1971年5月2日所载“美《生活》杂志刊登斯诺文章《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把这一段删掉了(《纪要》中也未将原记录中的那段话纳入)。

斯诺将这篇文章收入《漫长的革命》一书，该书的中译本记载了原文的倒数第二段：

当他亲切地送我到门口时，他说他不是一个复杂的人，而实在是简单的。他说，他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罢了。(第176页)

斯诺1928年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工作了十几年。按照他的中文水平，即使没有翻译，也会理解“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含义。但他故意利用“和尚打伞”这句话编造出一段文字，实在是不应该的。当然，到1971年4月30日才发表毛主席1970年12月18日的谈话，已失去新闻的时效性，他可能出于不损害中美高层接触的考虑，在文章中对毛主席所谈的尼克松的访华一节写得平淡无奇，没有引用毛主席的“尖端”语言，甚至未提“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利用“和尚打伞”一语进行编造，可能是为了增加一点吸引力。《生活》杂志在刊登该文时，就以“一个带着把破伞的孤僧”作为末一节的大标题。斯诺在这段编造的文字中，没有加上引用号，而是采取“他说，他不过是……”的表达方式，也是留了余地的。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抵京。周总理和他会谈时，提到斯诺的这篇文章，指出其中有一部分不那么准确，个别地方还有错误，但基本上是对的。“个别地方还有错误”就是指上述那一段。

中译本将原文的“monk”译为“僧”(通俗的译法是“和尚”)，将

原文的“walking”译为“云游”（本可译为“漫步”）。

斯诺绝不会料到，在他逝世 18 年以后，他的这一错误竟一度在中国的传媒上传播开来。

1990 年夏，由“中央宣传部策划、深圳市委宣传部摄制”的“电视政论片”《世纪行》在电视台黄金时间播映。这部长约 160 分钟的电视政论片由许多报纸进行宣传，说它的主旨是“以艺术形式系统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形象和有关言论。《人民日报》1990 年 8 月 16 日刊载《播响奋进的心鼓——电视政论片〈世纪行〉的艺术特色》一文，文中说：“这部片子运用了一百多年来的有关文献资料。编摄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立场，他们严肃地精选客观存在的史料，没有把历史当做任意打扮的天真小姑娘。”该文还特别“称道”《世纪行》的解说词，说“解说词热情而朴实，……沸腾着、流动着滚烫的形象化‘语言’，它从多角度地、带有浓烈感情色彩地阐明了当代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1990 年 8 月 15 日，《人民日报》刊载了《真理的召唤——〈世纪行〉解说词选登》。其中有以下一段：

1970 年，毛泽东再一次见到老朋友斯诺，30 多年前在陕北窑洞前，他就是戴上斯诺递过来的红军帽才拍了一张最好的照片。30 多年后北京天安门上，毛泽东已被人们尊崇为“神”，就在千百万人流着泪，淌着汗向他山呼万岁的时候，毛泽东忽然对斯诺说：我就像一个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社会主义要改革，但路子怎么走？地动山摇的欢呼却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艰难、孤独和不安。当年，从他面前走过的你、我、他啊，有谁曾体察过这位伟人的心境。

《世纪行》被称为“电视政论片”，这段解说词的“政论”显然是“被人们尊崇为‘神’”的毛泽东“感到从未有过的艰难、孤独和不安”。“政论”总得有论据，这一段“政论”的主要论据就是“毛泽东忽

然对斯诺说：我就像一个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论据是两句，出自何处呢？

“我就像一个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显然是取材于斯诺写的《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的中译本：“他说，他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罢了。”但不是照抄，而是作了艺术加工，把“不过是”改为“就像”，相应地删去“罢了”；把“带着把破伞”改成“手执雨伞”；把“云游世间”改为“云游四方”。这些“加工”可以说是“艺术”，但把主语“他”改成“我”，那就超出“艺术”范围了。

“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是斯诺的那篇文章中所没有的，从《纪要》里也找不到。只能是取材于原记录。既然看到原记录，必然会发现斯诺那句话是编造的。但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还是搬出来，而又不是照搬，把“和尚打伞，无法(法)无天”改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辞海》对“无法无天”的解释，在此就不抄录了）。

把这两句互不相容的“论据”凑在一起，这能说是“严肃地精选客观存在的史料”吗？

不久，听说胡乔木发现《世纪行》存在的错误，在他的建议下，成立了由当时的中宣部王忍之部长负责的小组，核对史实，修改了解说词，重新配音播放。上述那段解说词据悉也改为“30多年后，他们同登天安门，斯诺问他对眼前的一切印象如何？毛泽东回答说，不满意。事后他对斯诺说，他对中国的进步慢不满意，‘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我因病未看重新配音播放的《世纪行》。在这个问题上，我很敬佩胡乔木，也赞成中宣部知错即改的做法。遗憾的是：刊登过《世纪行》原解说词的报纸，没有刊登修改后的解说词。不久前，仍有人引用杜撰的毛主席的那句话来贬损乃至丑化毛主席。

4年后，《党的文献》副主编田松年向我约稿，我把1990年写成而未能发表的《毛泽东是否说过“我就像一个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一文稍加修改交给他，开头只说“1990年有关单位拍摄

了一部轰动一时的电视政论片”，文中未提片名、单位名、报纸名及评论者名。该文在《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发表，对此，我很感谢田松年和该刊编辑部。该文较短，半叙半评。这里则着重提供有关史料。从中可以看出，连斯诺这样高尚的人，在特殊情况下也写过不实之词。因此，鉴别史料真伪的工作不容忽视。当然也不能因此而怀疑一切。

我的一点补充

龚育之

熊向晖同志的文章中讲到《世纪行》解说词中一度出现过一个人令人难以理解的情况，即在叙述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时，一方面，正确地引用了毛泽东的原话：“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另一方面，却又错误地沿用国外流行的斯诺误传的所谓毛泽东自己说过：我就像一个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我知道，或者说，我可以猜到这个情况的由来。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1990年最初拍成的《世纪行》，其解说词只是说：1970年国庆节在北京天安门上，“毛泽东忽然对斯诺说：我就像一个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明明是亿万人簇拥着他，他却感到孤独；明明是地动山摇的欢呼，他却听来悲凉。当年，从他面前走过的你、我、他啊，有谁曾体察过这位伟人的心境。”

我看了电视片，听到这段解说词，给这部电视片的总策划和总监制分别写了同样内容的信，一方面称赞这部片子，一方面告诉他们，所谓“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是斯诺对毛泽东所说的“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这个歇后语的误解。而且毛泽东不是在天安门上向斯诺说的，是后来在同斯诺长谈时说的。因此，不合事实，必须删去。我还说，我查过原始的纪录，我这个判断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出乎我的意外，我没有收到任何回音。

以后，8月间报上发表了《世纪行》的解说词，是经过修改

的。我提出意见的那一段，没有删去，仍然保留了那句执伞孤僧，但是，在那句话之后，加了八个字：“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我猜，这就是对我那封信的回应。

然而，我认为这样的处理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不相信我提供的材料，不相信毛泽东当时说的是“和尚打伞，无法(法)无天”，那就没有理由加上这八个字。如果承认毛泽东讲的是这八个字，那么，斯诺所说的执伞孤僧云云，只能是误解，没有理由再加以引用。把原文和对原文的误解，一起引上，这在逻辑上是违背同一律的，在文词上，只能使人不知所云。

于是，我又写了一封信，给全文发表了修改后的《世纪行》解说词的那家报纸的主编，请求发表。

依然是没有发表，而且没有回信。

然后，就有了熊向晖同志文章所说的胡乔木同志对《世纪行》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批评以及对《世纪行》的认真的修改。那句云游孤僧，当然是删去了。

不过，还是没有在相应的报刊上对此事加以澄清。

这一年的10月，在第五次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上，我发言，讲了这个例子，借以说明使用国外提供的材料，一定要经过鉴别。

这一年的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电视台放映了一部讲毛泽东的短片（不是《世纪行》），其中又说，毛泽东说，他是一个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

这个不是事实的、基于误解的所谓毛泽东对自己心境的自白，仍然在中国流传着！

为此，我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是从那个短片说起的，希望这样的误解不要继续在中国流传。

很高兴，也很感谢，人民日报发表了我这封信。

在香港出版的《紫荆》杂志对这件事发生了兴趣，我把我那个

发言中详细说明毛泽东的原话和斯诺的误解的那一段话，写成短文，送给它发表了。

以上这些经过，写下来，算是对熊向晖同志文章的一点补充。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邓小平亲笔填写的一张履历表

薛 街 天

1997年夏,笔者赴俄罗斯作学术考察期间,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发现了邓小平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填写的一张履历表。原件全部内容如下:

1、中文及俄名

邓希贤 ДОЗОРОВ

2、生年及月日 社会出身

生于1904年7月12日^①,学生,父业教育,同时又是军政界中人,同时又是一个小地主。

3、所受教育及思想变迁

受过中等教育。至于思想的变迁亦甚简单,我16岁以前在中国,小孩子当然无思想可言,及到法国后,受了经济的压迫,致不得不转到工厂作[做工](原件如此——编者注)工,变成了工钱劳动者。生活的痛苦,资本家的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的或间接的受了很大的影响。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虽略有感觉,然以生活浪费之故,不能有个深刻的觉悟,其后,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知识,一方面又受了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同时再加上切身受的痛苦,于是遂于192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总上所说,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

4、何时何地入党? 如入过团(应二须)(原件如此——编者注)

^① 该日期为农历,公历是8月22日。

说明时与地

1925年4月^①入党——在法国“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

1925年6月^②入团——在法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

5、在何处做何种党的工作？如入过团须说明

在法国，曾入过团，在党中曾任过组书记（旅欧支部之下）即支部候补委员，在青年团中亦曾作过相当的工作。

6、与何俄国同志有关系？

无

7、受拘禁否？

未。

以上履历表为邓小平亲自填写，钢笔字写得十分清楚秀丽。履历表并非印制的表格，是普通笔记本用纸。履历表未标明填写日期，按邓小平于1926年底入中山大学，填写时间应为1926年底。原件存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号为ф. 495, оп. 225, д. 1623, л. 5。抄件经笔者反复仔细核对，文字与标点均准确无误。

以上文献有两点应引起注意：

1、邓小平在履历表第三栏内写道：“总上所说，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这段文字对研究邓小平早期思想和他一生中的思想与实践十分重要。众所周知，邓小平革命的一生，几次大起大落，都未能改变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强信念。上引文字是说明他之所以成为伟大的共产主

^① 原件如此。按照当时“只要参加了青年团的领导，就算自动转入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规定，邓小平1924年7月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被选入执行委员会书记局，所以邓小平的入党时间应是1924年7月。

^② 原件此处时间与前述“于192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不一致。据邓小平后来回忆，他的入团时间为1922年夏季。

义战士的最好注解。

2、建党时期,我党旅欧组织和旅欧团组织有不同称谓。履历表中称旅欧团组织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这对弄清当时旅欧党团组织称谓的沿革提供了原始材料。

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一份鲜为人知的建议书

资 中 筠

10 多年以前,笔者曾撰文阐述在尼克松政府决定采取行动打破中美关系僵局之前,美国政界与精英舆论界对于转变对华政策至少已有 10 年的酝酿和准备(见《缓慢的解冻》,《美国研究》1987 年第 2 期)。后来,笔者在另外一些论述美国学者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的文章中又曾提到,在尼克松 1968 年当选总统之后上任之前,有一批以哈佛大学教授为主的学者提出过一份有关对华政策的《备忘录》,通过基辛格转交尼克松,其中有一些建议与后来实际执行的极为相似,但是这份意义相当重要的文件不知为何在美国很少有人注意到,尼克松和基辛格等人的回忆录中更是只字不提。在我国当然更鲜为人知。由于篇幅关系,那些文章都未能详述这份《备忘录》的内容,现将全文译出以飨读者。

从这份文件的内容和措辞可以看出几点:

一、到那个时候,美国对华政策必须有所转变这一前提已经很少疑议,所以《备忘录》的重点不在于阐明应该转变的理由,而是就适当的时机、方式和美国可以作出的让步提出建议。

二、显然,美国人那时对中国情况了解甚为模糊,对中方——也就是毛主席——的意图完全不摸底,所以每提出主动采取的步骤,都作被中方断然拒绝的准备。但是认为即使这样也值得一试,把希望寄托在毛以外的领导人或其继承者身上。殊不知当时正是毛主席本人正在考虑打开中美之间的僵局,而且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中也只有他本人能作出这样的决定。在今天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在当时双方似在捉谜藏,而且从那时起,直到实现基辛格秘密访

华,双方又继续了一年半的互相摸底。这说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确起步维艰。

三、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走出第一步煞费踌躇。最值得注意的是《备忘录》中的一条建议:“您应该认真探索以下可能性:安排一名您所信任的人员与中共领导人进行秘密的——甚至是可以加以否认的——晤谈”。这与后来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刚好相符。尼克松、基辛格的这一决策是否受到这份文件的启发,现已无法证实。不过当时反对此举的右派议员认定是这批哈佛学者的“绥靖”思想产生了影响,在国会提出此事,并要求载入国会纪录,因而这份文件得以正式公开。可能这也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本人后来对此违莫如深的原因之一。另据《备忘录》作者之一的一位教授称,这批作者绝大多数亲民主党,基辛格既然参加了共和党政府,自然就得和过去的这些校友拉开距离。不过基辛格秘密访华已是在乒乓外交之后,多少对中国方面的积极意向有所了解,而《备忘录》提出此建议时却是对中方可能的反应完全心中无数的,因此更为难能可贵。

四、当时美国国内反越战运动已经兴起,有一批比较激进的大学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已经对美国的亚洲政策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必须改弦更张。《备忘录》的作者显然不属于激进派,而是基本上与政府认同。从其进言的小心翼翼的语气中可以看出他们不仅对中国不摸底,对当时美国国内的接受程度也顾虑重重。因此对于必须打开对华关系僵局的态度虽然很积极,而在实质问题的建议上却比较保守。特别是在关键的台湾问题上,其主张还是“台湾地位未定论”、“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并没有超出10年以前《康伦报告》的建议,也没有超出肯尼迪政府内部一直在探讨而未公开提出的设想(详见《缓慢的解冻》一文)。而尼克松访华达成的《上海公报》正是在台湾问题上有所突破才得以打破僵局,开始正常化的进程。这是由于中方态度坚定,以及双方通过各种渠道反复争论、磋商,互相了解对方的底线而获至的成果,这是1969年的《备忘录》

作者所预见不到的。

五、自《备忘录》出台以来,已过去近30年,中美两国关系已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与那时当然不可同日而语,这期间的长足进展和曲折不必赘言。但是有一点令人遗憾的是,就基本态势而言,似乎尚未有根本的变化,也就是尚未像一般的双边关系那样达到真正的正常化。《备忘录》基本上是把中国作为不可捉摸的、一支潜在的扰乱国际秩序的力量来看待的。主张减少敌对、打开僵局是鉴于中国之大、可能成为强国的前景以及中共领导的政权将长期存在的现实,美国的遏制与孤立政策行不通,因而认为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更能减少危险性。实质上就是60年代中期一些谋士们已经提出的对中国的“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经过80年代中美关系的积极改善和1989年之后的部分倒退,现在美国官方对华政策定位在“接触”(ENGAGEMENT)上。这个词的含义一直众说纷纭,但是基本态度还是一方面承认必须善处对华关系的现实,一方面对强大起来的中国可能起的作用充满疑虑,因此除了谋求改善关系的积极方面外,另一方面即使不是“遏制”,至少也是“限制”和“防范”。尽管中国与1969年处于“文化大革命”高潮时的情况相比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尽管两国之间的交往和信息相通与那时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似乎美国对中国离真正的了解和信任还有相当的距离。在《备忘录》中已经充分否定的对华经济制裁政策,到90年代又一再被提出来。更有甚者,那个时候美国一般舆论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走在政府前面,而今天,对舆论起很大作用的传媒对政府的对华政策却起着扯后腿的作用。《备忘录》的作者除个别外,自那时以来都在中国和东亚研究方面继续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是这一界的知名专家,其中不少人仍不断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提出促进性的建议。但是如果在1969年时他们需要顾忌国内反对派的指责,在措辞上小心翼翼的话,现在这种气氛有过之无不及。出于对客观情况的理解而提出持平之见的中国问题专家受到很大

压力,以至于不止一个人将这种气氛比之于“麦卡锡主义”时期。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完全是时代的错位。但愿这是暂时现象,理性的呼声终将占上风。

致当选总统尼克松关于对华关系的备忘录

签署人:杰罗姆·柯恩(Jerome Alan Cohen),哈佛大学法律系教授,系主任;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罗夫·霍夫海兹(Rov Hofheinz),政治系助理教授;帕金斯(Dwight Perkins),经济学教授;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教授;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历史学与政治学教授;詹姆斯·汤姆逊(James Thomson),历史学助理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社会关系学教授;鲍大可(A. Doak Barnett),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鲁恂(Lucian Pye),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除来自哥伦比亚和麻省理工学院各一人外,其余都来自哈佛大学,由肯尼迪政治学院主其事。)

1968年11月6日

我们作为研究东亚的学者,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政治研究所的主持下,就美国与东亚关系完成了为期一年的不公开的讨论后,今将我们对美国与中国关系这一关键问题的想法以书面形式向阁下申述:

美国的目标

过去二十年来统治美国与东亚关系的中心现实是中美的敌对与僵局。显然,越南问题的解决不论性质和时机如何,中国问题将继续在新政府的任内乃至整个70年代统治着我们与东亚的关系。

共产党中国的幅员、意识形态、相对孤立状态、潜在的力量以

及当前的国际动荡,增加了世界这一常年不稳定的地区的危险性。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目标一直是,并应继续是避免与中国作战和尽量减少它对周围地区的扰乱(重点号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

自从朝鲜战争结束以来,前几届政府大体上执行一种双重政策以达到这一目标:一方面进行军事遏制以威慑其可能的扩张企图;一方面努力通过大使级会谈与大陆中国沟通,并不时提出进行非正式接触的建议。当然,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第一种政策占压倒优势,盖过了第二种政策的作用。

我们觉得现在已经到了应该在这两方面之间取得平衡的时候了,这样,在避免与中国作战而又使它不敢轻易对外进行干涉的同时,我们可以更加积极地走向中美关系缓和并最终达到和解。

为达到上述目标,我们提出以下具体建议。不过同时需作一些重要的提醒:尽管中国过去三年来国内动荡混乱所造成的后果还不清楚,我们现在并不预期中国有改善与美国关系的愿望,所以很可能我们所提出的建议中的任何一条乃至全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都会被中国领导人当即拒绝。

但是我们还是提出这些建议,是出于这样的信念:美国向中国提供一种明确的对外部世界较少敌意的政策选择是最符合美国的利益的。至少,这样可以使北京的决策过程复杂化,这一决策至今一直是简单地建立在美国敌视中国不可改变的理论基础上的。同时,我们还能以我们的言词和行动向那些对毛泽东对世界的看法有所怀疑的现在或将来的其他中国领导人传话。除非我们采取更加平衡的作法,否则我们轻则可能失去一个使北京的行为温和一点的机会;重则可能为与中国打一场没有一方有希望“获胜”的战争打下基础。

建议:A. 与大陆中国关系

1)探索性会晤。您应该认真探索以下可能性:安排一名您所信

任的人员与中共领导人进行秘密的——甚至是可以加以否认的——晤谈。您的特使应传达这样的意思：新一届政府有兴趣倾听中国人对一系列广泛问题的看法，包括越南、裁军等问题，并在比华沙更加非正式的场合对建立正常关系的前景进行非官方性的试探。中国人很可能拒绝接受这样一位特使；但是作这样的努力，显示美国的态度有所改变，还是值得的。

2)越南谈判。解决越南问题的曲折过程很可能为改善对华关系和把中国纳入世界秩序提供一个机会。尽管中国目前对谈判解决持敌对态度，新政府应该敏锐地抓住机会以使北京以某种状态卷入越南谈判的进程——或者通过重新改组的论坛，或者通过一项一揽子最终方案把中国、两个越南和其他分裂的国家都纳入联合国。主要考虑是：应把越南谈判视为通向更广泛的亚洲问题解决的一个步骤，因而是可能使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一种手段。

3)降低论战的调子。不论北京的言词如何敌对，所有(美国)政府官员在评论中国时应避免挑衅性的说法，这是至关重要的。过去，我方诚意的“和解”希望往往为那种把中共比作德国纳粹的新闻发布所破坏。特别使中共反感的是美国表面上把台湾当做唯一的中国的态度。新政府应及早找到机会消弥这一言词和现实之间的差距。自从1955年以来，在两党、三届政府下，美国在日内瓦、华沙和台北与自称为“中国”的两个政权都在打交道。您或者您的国务卿找到某种场合，不事张扬地指出一个事实：我们给予北京“事实上”的承认已经有十五年了，而“法律上”的承认显然是一个复杂得多的问题，需要进行讨论，这样做当收益良多。

4)反导弹体系(ABM)。新政府需要决定是否继续最近批准的“稀薄”ABM体系。我们认为现政府对这样一种体系对中美关系可能产生的后果欠考虑。撇开美苏军事平衡的问题不谈，建立ABM的计划不但在军事上作为对北京的威慑是不必要的，而且很可能被中共视为美国有意进攻北京的证据。我们敦请重新考虑

建立 ABM 体系的决定。

5) 贸易。新政府应及早寻求机会改变对华贸易禁运政策, 这项政策是朝鲜战争遗留下来的, 并没有剥夺任何中国所需要的东西, 我们的主要盟国都不支持, 经常在我们与第三国关系中造成麻烦, 剥夺了美国最起码的可能改变中国的经济杠杆, 并阻止我们的商人分享中国的市场。在这方面, 新政府应以其前任的试探性的说法为基础, 将我们与中国的贸易与苏联和东欧同等对待(非战略性物资)。

6) 旅游与其他接触。新政府应该取消控制美国人访华政策的最后残余, 同时应表示愿意接纳北京政府同意派来的任何中国人入境。这些步骤不但反映出一个自由社会的自信和力量, 而且将向未来的中国领导人可能作出的“非孤立化”的选择打开大门。在官方的接触之外, 新政府应鼓励中美记者、教育工作者、科学家、艺术家和其他各界之间私人的和非官方的会晤。

B. 与台湾关系

上述步骤涉及重新建构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的初步尝试。与此同时, 重组华盛顿与台湾的关系自不可避免。在这个问题上的宗旨仍应是消弥言词和现实之间的差距。美国承认中国国民党是中华民国政府, 名义上统治着大陆和台湾以及澎湖列岛; 但是华盛顿早已把他们作为仅限于台澎的政府来对待, 默认国民党不会重新征服大陆的事实。自从 1951 年以来, 历届政府都明确表示台湾在法律上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其地位留待将来事态的发展。新政府现在应以这一现实为基础。它应重申保卫台澎的承诺, 只要在台湾的人愿意保持与大陆中国分离的身分。但是应采取以下四点措施以预先防止国民党使华盛顿为难的潜在可能性:

1) 您的政府应派一名理解、并能传达政府对华大战略的人作为大使到台湾。为了显示您对政治考虑的重视高于军事考虑, 此人

不应是一名军人。

2)只要台湾海峡相对和平,政府应利用此机会重新迫使国民党人从金门、马祖及沿海岛屿有秩序地撤退(只要这些岛屿为国民党所占领,就可以被任何一个“中国”作为杠杆把美国牵入不必要的亚洲冲突中去)。政府还应敦促国民党结束对大陆的挑衅性行动。

3)政府应通过与中国国民党人坦率的讨论,为美国逐步转变对北京的关系作准备,特别是为定将出现的关于联合国席位的复杂问题作准备(见下文)。

4)最后,政府应对台湾潜伏在表层以下的政治力量的活动有所警觉,在机会到来时应促使蒋介石及其继承人给 11,000,000 台湾人和 2,000,000 大陆籍人以更多的充分参政的机会。

C. 更广泛的问题

1)联合国。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可能要到 1969 年秋才会提到新政府的面前。到那时,谋求解决越南问题的努力以及早些时候所采取的与中国有关的措施可能已经试探出关系正常化的前景。看来这些前期的步骤不大可能对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产生结果,联合国的问题大约也会与此相似。不过,我们还是坚信,政府不应该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在联合国的席位,其明显的理由如下:北京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无疑会实现在中美关系改善之前,而且很可能是中美关系改善的前提。我们认为,为实现中国的非孤立化,要求中国尽可能参加国际论坛以及这种接触可能产生的“社交化”。因此美国决策者应该接受北京参加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而同时为台湾谋得联合国大会的席位,不论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还是作为中国的一个自治区。这样的目标通过默认比通过华盛顿的积极活动更能达到;但是需要预先仔细准备。

2)中国的邻国。我们对华政策的逐步转变可能受到我们主要

盟国的欢迎；但是可能引起某些中国的邻国的不安，它们原来是按照我们对华政策的遏制这一面制订其行动的。我们必须让这些国家及时了解我们在这方面的进展情况和计划，并保证我们继续关心它们的福利，以消除它们的疑虑。

3)日本。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将每一步战略都坦告日本。虽然日本是会同意我们战略的实质的，但是如果我们先不通知而猝然换挡，将会给日本政府造成极大的难堪。

4)与第三国的接触。我们应该欢迎诸如日本这样的第三国与大陆中国发展日益增进的关系，以期使中共政权更加在实质上加入国际社会。

5)华盛顿—莫斯科—北京。以上的建议含有这样的希望：新政府设法把中美关系与苏美关系分开对待，尽管这两个问题不可避免地是有关联的。中苏分裂使我们有对二者分开对待，并在与二者分别的关系中仔细审视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敦促新政府在理所当然地关心超级大国双边关系的均势的同时，避免从莫斯科的观点来判断中国及其发展情况。苏美反华联盟可能符合俄国的利益，但并不会自动给美国的国家利益带来好处。

我们认为以上所勾划的各项建议既表明了美国对所宣布的目标坚定不移的姿态，又能表现出通情达理、深谋远虑和为解决政治问题而互谅互让的意愿。这样一种姿态将赢得美国广泛的中间选民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支持。

* * *

附： 众议员卢斯洛对此方案的讲话

(1971年8月6日，众议院)

议长先生：

最近我们官方对共产党中国政策的大逆转使我至为关切。以

下这份注明日期为 1968 年 11 月 6 日的《备忘录》首次发表在 1969 年 2 月 20 日《策略》上。它明确地勾划出与这个共产党独裁政权关系取得“平衡”所应采取的步骤。该《备忘录》是写给“当选总统尼克松”的，据我了解，是基辛格博士在尼克松先生于 1968 年当选之后亲自把它交给他的。

我敦请同事们仔细研究这份文件。它对我们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已经产生的影响是令人吃惊的。基辛格博士的“谋划”同这件文件的立场如此相合，因此我再强调也不为过：每一位议员都必须意识到，早在 1968 年 11 月 6 日，正当我们还深深卷入越南的时候，今天所执行的对中共侵略者绥靖的计划已经提交给总统了。

苏中领导人眼中的1960年

[俄]米·尤·普罗祖緬希科夫 著 闻一 译

编者按：1960年是中苏关系史上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苏联从中国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从而使中苏关系走向全面破裂。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结局？本文作者米·尤·普罗祖緬希科夫利用俄罗斯近年解密的档案资料，试图对这一年苏中两国领导人的言论进行客观描述，以为寻找这一答案的人们提供一个系统的资料。需要指出的是，文中的某些观点和立场未必客观和公允，但它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近年来俄罗斯学者对那段历史的看法，我们应该了解它，以为今后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个参考。原文1.6万字，我们在编发时略有删节。

1960年的开始并没有预示在共产主义世界中会发生严重的冲突。去年（即1959年），由于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过程中的中立立场和中国对苏联领导人访问美国的消极反应所引起的苏中关系上的问题，看来已经在毛泽东和尼·谢·赫鲁晓夫于庆祝中国革命胜利10周年期间的私人会晤中得到消除。照苏方的说法是，从1959年秋天起开始了两国间关系进一步改善的过程，而用苏联政治术语来讲，这就意味着中国的观点向莫斯科的观点接近。

然而，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并没有出现立场的接近，两党也没有走向妥协。首先，这涉及到对裁军、和平共处以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不同形式、在核时代预防战争的可能性的问题上的观点的分歧。在中国，以毫不掩饰的怀疑态度看待赫鲁晓夫和西方的调情，按照他们的观点，这种调情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的。在莫斯科也不

愿意接受“毛泽东的算术”。中国人关于原子弹是“纸老虎”的声明，以及他们要和帝国主义作无情斗争的好战呼吁打乱了苏联领导人的计划，苏联想使西方伙伴相信共产主义阵营是热爱和平的，只准备在两个体制的经济竞赛的领域内进行战斗。

除了争论的纯理论方面外，两党的分歧还有极为严重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潜台词：因为，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都认为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忠实的追随者，所以他们对当代一些基本问题看法的重大分歧就可能意味着，或者是这一学说本身的不明确和不完善（自然，他们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没有指出过），或者是其中的一个已不再是马列主义政党这一事实。两个共产党都积极地引用列宁的话，从他的丰富的书信遗产中巧妙地引用那些能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语录，这一做法使情况更为严重。例如，在中国，是在要证明帝国主义的本性不可变更以及只有世界革命才可以消灭战争时，就引用列宁的经典著作，而俄国的共产党人则是在要证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和平共处的思想只属于列宁时才加以利用。

当这些分歧还处于双边关系的狭小范围内时，莫斯科对此是相当克制的。就在中国暂时认为不和苏联代表讨论现有的分歧时，苏联相反却力图立即就所有不明确的问题进行同志式的讨论，不要让它们积累起来^①。2月，访问北京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彼·尼·波斯别洛夫和苏联外交部长安·安·葛罗米柯表示相信，两党始终“可以找到符合我们共同的伟大事业利益的共同决定”。^②

所以，《人民日报》、《红旗》和中国其他大众媒体工具上在庆祝列宁诞辰90周年时一系列文章的发表，对苏方来说则是完全出乎

^① 苏共中央致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情况通报，АПРФ. Ф. 3, ОП. 65, л. 597, л. 152。

^② 同上。

意料的事。在这些文章中，双方立场上的分歧实际上是被大加张扬了。虽然，在这些文章中，没有提及苏联，而修正主义者通常暗示的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然而，批评的矛头首先指向苏共所捍卫的观点，这是相当明显的。中国也不隐晦这一点，就在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曾直率地对苏联驻中国大使斯·瓦·契尔沃年科说，这是“中共对苏联错误观点的反应”^①。

1960年5月1日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击落美国间谍飞机和此后发生的高级会晤的流产暂时分散了莫斯科对中国行动的注意力。不错，后来赫鲁晓夫证实，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保持和中国同志的团结”，而苏共中央却打算在两党代表的双边会晤中来研究现有的全部分歧^②。与此同时，作出下述推测是正确的：苏联在当时，除了不愿在自己的阵营中出现派别外，还极需要曾经充分得到过的中国盟友的支持。在中国，曾经开展过支持苏联的行动和赫鲁晓夫在巴黎的讲话的强大的宣传运动，在北京曾举行过支持苏联立场的300万人的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

然而，“美国因素”却不能不反映到这些原则分歧上来。在中国，5月事件被看成是说明他们的下述观点正确的又一证明：任何谈判也不能改变帝国主义的本性，帝国主义将是发生任何战争的不变的根源。但是，赫鲁晓夫并不想放弃和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是美国寻求妥协和协商的信念，只不过是把这些打算的实现放到美国新总统选出之后。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认为可以把分歧带到更为广阔的舞台上，为此选择了一个很合适的机会：1960年6月初的北京世界工联理事会的会议。

^① 5月17日举行的契尔沃年科和邓小平会谈的报告最初是由大使馆用电报发回莫斯科的。而在6月这份谈话的纪要由外交邮袋送到苏共中央，不知为什么其中没有邓小平的这句话。ЦХСЛ. Ф. 5, ОП. 49, Л. 327, Л. 129—133。

^② 苏共中央致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情况通报，ЦХСЛ. Ф. 3, ОП. 65, Л. 597, Л. 2。

在理事会会议开始前夕，中国代表在世界工联内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工会活动家尖锐批评了准备提交大会的报告的主要内容，并声称，如果不听取他们的理由，他们将不得不“揭露右倾机会主义”。还有一点并非不重要，在会议开幕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不在北京，让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来解决所有的问题。然而，当弄清楚世界工联的大部分领导持亲苏立场并坚决反对中国的警告时，“返回”北京的刘少奇进行了干预，他于6月6日召开了有40名外国工会的共产党领导人参加的早餐会，邓小平也出席了这个早餐会^①。

尽管这一次中国领导的立场没有得到支持，中国领导人还是声明，他们将不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上阐述自己的观点，这样的发言已经有过了。从此时起，双方实际上开始了正式的论战，这场论战时而沉寂，时而炽烈，常常成为相互的指责，其中包括个人的指责，所以实际上也就停不下来了。

还有一个事实令苏联方面感到特别的不快：这种对苏共的批评是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一系列委员会的工作中进行的，“出席会议的有许多其他党的代表，以及非党的工会活动家”^②。所有这一切，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宣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一系列极为重要的国际问题上缺少明确性的做法使赫鲁晓夫忍无可忍。这位苏联领导人在确信通过双方的谈判和协商已无法弄清是非之后，就决定把主动权抓在自己的手里。

此后不久，苏共中央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夕向出席大会的各代表团散发了“情况简报”，其中尖锐批评

^① 1960年11月，刘少奇解释说，这次会见的组织工作是得到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格里申的赞同的，而米高扬却断言，最初所谈的只是同志式的晚餐，没有谈到将其发展为一次会议。见米高扬、科兹洛夫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谈话纪要，ИКСЛ. Ф. 3, ОП. 65, Л. 610, Л. 118—119。

^② 情况简报，ИКСЛ. Ф. 3, ОП. 65, Л. 597, Л. 154。

了中共的立场。在这份 50 多页的文件中，苏共向世界的主要共产党介绍了在当代性质问题、裁军和预防战争等问题上与中共的主要分歧。苏联共产党人还批评了中共不仅在世界工联而且在其他社会组织中所持的立场，说这些组织被中共利用为宣传自己的观点的讲坛。

应当指出，这份“情况简报”是事先准备好的，但散发却是在 6 月 17 日苏共中央和赴罗马尼亚参加大会的中共代表团会晤过之后。赫鲁晓夫最后的希望是，中国人最终会承认自己有了误解和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上的错误，从而就不会来全面地讨论争吵的实质，但事与愿违：领导中共代表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不仅不同意这些意见，反而继续坚持中国以前的立场。

还有其他一些事实证明中共不打算改变自己的看法。在 6 月下旬，苏共中央得到情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局局长傅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在中国的苏联军事专家的党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讲话中再次谈到“对帝国主义不能存在幻想”，并且含有对“以小资产阶级的，多愁善感的立场对待战争的”同志的暗示^①。如果说前者的发言稿没有直接送交苏共中央，后来也没有经过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的话，那杨成武的报告一开始就送到了苏联国防部，国防部长罗·亚·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加了许多批评性边注后又送给了赫鲁晓夫本人^②。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这位苏联领导人要采取强硬的立场，而他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结束后立即召开的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就采取了这样的立场，从而使这次会议成为讨论苏共中央在“情况简报”中所阐述的理论的会议。

① 苏联驻华大使馆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局局长傅钟在中国的苏联军事专家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的报告，ИКСЛ. Ф. 5, ОП. 49, Л. 238, Л. 24—25。

② 关于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在中国的苏联军事专家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的报告，ИКСЛ. Ф. 5, ОП. 49, Л. 238, Л. 52—64。

我不想详细分析双方的立场,尤其是相互指责的实质,只想指出一个事实:在两党分歧日益发展的过程中,赫鲁晓夫越来越经常地把争论的主动权掌握到自己方面来,而毛泽东却总是宁愿置身于背后,让中共的其他领导人有可能在国际讲坛上来讲述他的思想。因此,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独特的局面,相互的批评总是情不自禁地和直接地落在那些阐述双方在原则问题上的立场的人的身上。但是,如果从中国方面说,这就是除了毛泽东以外的所有人,而在苏联方面,批评的火力就越来越多地落在了主要的和最积极的行动者——赫鲁晓夫的身上。

共产主义世界出现分裂的威胁促使苏联提出了召开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建议,莫斯科期望在这一会议上利用自己在共产主义世界的威望和影响,来迫使中共承认自己的错误,追随苏联的政策。中国人的革命思想会在一系列共产党,尤其是年轻的、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中获得适宜的土壤,这不能不使赫鲁晓夫感到担心。

与此同时,通过了详细通报苏联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分歧性质的决议,尽管苏联社会的闭塞,这份通报还是广为人知了。在1960年7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弗·罗·科兹洛夫就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总结作了专门的报告。科兹洛夫称中国方面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观点是宿命论的观点,而他们的“第三条道路”的建议(既不是和平共处,也不是热核灾祸,而是局部战争和冷战的道路)——沿深渊边缘的冒险主义道路^①。

在苏联,除了中央全会,还举行了秘密的党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苏共中央的观点被传达到基层党员。这是尤为需要的,因为有几千名中国公民在苏联继续工作和学习,他们是苏联共产党员不

^① 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于1960年7月16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ЦХСР. Ф. 2, Оп. 1, Л. 476, Л. 105。

可能同意的消息的来源。在一系列情况下,常常出现失误:吸收待在苏联的中共党员来参加国际生活某些问题的讨论的企图总是以辩论和论战而结束,对此苏联的党组织看来并不总是有准备的。

如果苏联领导的这些行动是在他们所宣布的“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器纯洁”和与中国同志的错误作斗争的愿望范畴之类,那莫斯科正式用作堵塞中国信息进入苏联的其他一系列行动就可以公正地被北京说成是将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至两国关系的领域,并对中国施加压力。如:停止在苏联出版《苏中友好》杂志和禁止中国杂志《友谊》在苏联的发行^①;要求将扩散新闻公报的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召回国内;最后,对中国最不利的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这无疑是对中国经济的沉重打击)都应属于这一类行动。虽然,赫鲁晓夫有一定的理由作出召回专家的决定,因为这些专家的活动在近一个时期在中国遭到了经常的、来自各方面的攻击,然而苏联领导人所选择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时间和方式未必是成功的^②。

在苏联,密切注视着中国的反应,希望捕捉到自己对手政策中的某些变化。但是,注视并没有带来太大的希望。尽管中国代表团在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工作总结的公报上签了字,但它明显暗示这是在压力下被迫签的。就在第二天,在中国的报纸上又出现了这样的论断:为了达到真正的和平,“必须砸碎美国帝国主义的脑袋”。罗马尼亚驻中国临时代办巴什基尔对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

① 苏共中央各部关于停止《苏中友好》和《友谊》出版的报告,ИКСЦЛ. Ф. 5, ОП. 49, Л. 329, Л. 166—167。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代表一开始对苏联的建议怎么也没有反应过来,继续向苏联提供《友谊》杂志,还顺便向苏联同志打听:“《美国》还继续在苏联发行吗?”

② 尽管在苏联致中国的1960年7月16日的照会中关于从中国召回苏联专家的原因说的是:中国政府“会正确理解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苏联和中国,文件资料集》第一卷,1985年,第269页),使馆还两次就这一问题发出照会,解释苏联的立场,而最后一个照会是在11月6日,即莫斯科会议开始前夕发出的。

导人在北京机场迎接来自布加勒斯特的代表团的“冷淡和走过场”感到惊讶——甚至谁都不愿意和罗马尼亚的外交官谈话，更不用说对在罗马尼亚给予中国代表团的关注表示起码的感谢了^①。

照苏联的说法，这一时期“中国同志(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实质上没有发生变化，而对在和兄弟党之间存在不同意见的某些问题的回避证明了他们不愿在今年 11 月的共产党会议前公开自己的立场”^②。尤·安德罗波夫正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来评论 1960 年 7 月 16 日《人民日报》有关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开幕的文章的，称它是“蛊惑宣传的样本”^③。

与此同时，在苏联人们不能不注意到，从 8 月起在中国开始出现了和平共处政策是可能的，甚至是必要的声明。周恩来在 8 月 1 日瑞士大使馆的招待会的讲话中开了这个头，其后在中国的报纸上发表了中国政治家们的文章和讲话，他们论证说中国早就实行和平共处政策，还举中国和缅甸的相互关系为例。

安德罗波夫将中国宣传中的新情况通报给赫鲁晓夫，并建议他和刘宁一讲话中的两段话加以比较。在世界工联理事会的会议上，刘宁一在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维·瓦·格里申的谈话时说，“有关和平共处可能性的论断只能使美帝国主义高兴”，所以，在 8 月于日本举行的禁止原子弹和氢弹国际大会上，他换了口气说，“中国人一贯拥护和平共处；对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我们也希望和平共处”。按照安德罗波夫的说法，中国宣传中的这种转变是

① 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苏达里科夫和罗马尼亚驻华临时代办巴什基尔的谈话纪要，ЦХСЛ. Ф. 5, ОП. 49, л. 329, л. 125—126。

② 苏联驻华使馆关于中共和兄弟党联系的报告，ЦХСЛ. Ф. 5, ОП. 49, л. 327, л. 224。

③ 苏共中央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概述 1960 年 7 月 13 日—20 日中国报刊的报告，ЦХСЛ. Ф. 5, ОП. 49, л. 327, л. 188。

因为中国同志试图证明在布加勒斯特对他们的指责是不正确的^①。

然而,总的来讲,双方都停留在原来的立场上。9月12日,即约三个月后,中共中央把对6月21日的“情况简报”的答复交给了苏共中央。在中共中央143页的信中(中俄两种文字),否认了对中方所提出的指责,并详细分析了中共对所有未解决问题的看法^②。此外,在夏天,两国之间在博孜艾格尔山口第一次爆发了严重的边界冲突。双方交换了抗议照会,其中实际上相互指责破坏了国界^③。根据驻中国大使馆的情报,几名为使馆服务的中国工作人员被中国当局以各种借口开除,仅仅是因为他们对苏联人表现得过分友好,用指责者的话来说,变成了“中国的俄国人”。除了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下述情况并没有引起注意:谈起苏联外交官来,中国人第一次使用“外国人”这个名词,而在以前从来没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使用这个词^④。

和过去年代不同,苏联外交官已不可能指望从中国的官方人士那里获得可信的消息。虽然在各种招待会和会见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对苏联外交官还是有礼貌和友好的,但苏联外交官开始确信(他们向莫斯科谈过这一点),中国领导人在“有其他国家的代表参加的”这种招待会的情况下,“装出注意的样子,和我们外表上打招呼,是力图在外交使团和舆论界造成一定的印象,而在内部会见时,他们的表现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① 苏共中央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关于中国宣传中新观点的报告,ЛХСЛ. Ф. 5, ОП. 49, Л. 328, Л. 178—80。

② 邓小平和契尔沃年科1960年9月12日谈话纪要,ЛХСЛ. Ф. 5, ОП. 49, Л. 327, Л. 255—257。

③ 《苏联和中国,文件资料集》第一卷,第269、278页。

④ 苏联驻华大使馆关于在苏联使馆工作的中国工作人员的状况的报告,ЛХСЛ. Ф. 5, ОП. 49, Л. 332, Л. 303—308。

——孤傲和外表上装模作样^①。

在这一时期，两党和两国间相互关系的严重问题之一就是苏中领导人个人间关系的问题。1960年1月，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讲话说：“最近时期的经验完全证实，领导人之间的个人交往和接触是在复杂条件下改善关系和在无法协调的国际问题上达成协议的最有效的和大有希望的方法。”^② 尽管赫鲁晓夫在这里主要指的是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接触，这句话在苏中分歧越来越尖锐的背景下是再现实不过的了。

与此同时，苏中两国领导人恰恰是在个人关系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其实，这一危机的前提在前几年就形成了：尽管总是在说“伟大的友谊”，社会主义世界的两个大国的主要领导人在最近几年已不十分渴望彼此间的交往，而且也不渴望和兄弟国家保持更紧密的联系。从1958年起，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中只有赫鲁晓夫（两次）和M·A·苏斯洛夫访问过中国，其中只有赫鲁晓夫的一次访问没有与举行节日庆祝活动有关系。而在同一时期却有大量的中国领导人访问了苏联：到过莫斯科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陈云、李富春、彭德怀、周恩来、康生等。然而，这些访问为期很短，并且通常总是和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联系在一起。毛泽东一次也没有来过，他只是在1957年秋天访问过苏联，但也是没有走出过苏联首都的地界。外交部部长一级的情况就更糟：苏联外长在中国建立后去过，不超过三次，而在1958年被任命到这个职位上的，他们的中国同事陈毅一直也没有到过苏联^③。

从1960年起，主要是苏联方面为了讨论所争论的问题，曾数次“召”中国领导人来苏联。此外，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在指出“中

① 周恩来和邓小平与契尔沃年科谈话纪要（1960年9月），ЦХСЛ. Ф. 5, ОП. 49, Л. 327, Л. 212。

② 1960年1月15日《真理报》。

③ 苏联驻华使馆关于发展关系的报告，ЦХСЛ. Ф. 5, ОП. 49, Л. 332, Л. 192—193。

国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精神时说，在举行这些会见的过程中，应当利用列宁的经验，尽力用劝说、说服、同志式讨论的方法来影响中国人。

苏联领导人认为，让中国领导人更密切地了解苏联人的生活可以多少帮助敲开在两国之间出现的疏远的冰层。1960年11月底，还在莫斯科会议召开期间，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阿·伊·米高扬就劝说中国代表团的代表在会议结束后到全国各地去走一走，“参观工业企业，了解农业情况，到科研机构和大中学校去，会见广泛的各阶层人士……，在劳动者集会上发表讲话”^①。科兹洛夫附和他的话，肯定地说，这样一来中国同志“就会亲眼看到苏联人民对中国怀有怎样的兄弟感情”^②。中国代表支吾搪塞地回答，暗示，他们的决定将在许多方面取决于会议的结果。

在缺少苏联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积极接触的情况下，大使馆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和承担了相当大的责任。然而，这方面的情况也很不顺当。还在50年代末，当时的苏联驻中国大使帕·费·尤金就指出过，他越来越难于受到毛泽东的接见，甚至在对中方有着很大利益的问题上也是如此。1959年，尤金尽管数次吁请，始终也未能和这位中国领导人会见，事情就这么终了了。当借口毛泽东生病或不在北京拒绝会见时，而毛泽东恰恰在这些日子里和这些时刻在会见其他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时，这种情况就引起苏联病态的反应^③。

在庆祝中国革命胜利10周年的活动中，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举行了最后一次会晤，这稍微缓和了这一问题的尖锐程度。此前在乌克兰工作的契尔沃年科接替尤金，被任命为大使，11月5日递交

① 米高扬和科兹洛夫……会谈纪要，АПРФ. Ф. 3, ОП. 65, Л. 610, Л. 100。

② 同上，АПРФ. Ф. 3, ОП. 65, Л. 610, Л. 101。

③ 苏联驻华使馆关于中国国庆十周年前中国情况的政治信件，ЦХСЛ. Ф. 5, ОП. 49, Л. 239, Л. 221。

了国书。在此之前毛泽东在长期中断之后第一次有可能会见了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谢·费·安东诺夫,并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①。

然而,后来一切又依然照常。契尔沃年科长时间不能会见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到中国的南方去了几个月。3月7日,毛泽东到底还是接见了苏联大使,但在这次会见之后契尔沃年科要直接和毛泽东进行谈判的努力都没有获得成功。当时送给莫斯科的标准报告是:尽管有中央的任务,苏联大使只能会见毛泽东的某个助手,而这位助手又是不是不在,就是生病。因此,如果以前契尔沃年科的类似的请求是被当成公务而加以研究的话,那现在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拖延,而大使对此就只能向中共中央详细报告他计划要进行会谈的题目。

中国如何对待苏联大使于1960年1月和8月作出的要和毛泽东会谈的两次请求,这方面是引人注目的。1月12日,契尔沃年科请求与毛泽东会谈并将赫鲁晓夫的涉及到苏联即将就裁减自己的武装部队的私人信件转交毛泽东。这位中国领导人在上海开会,但是,契尔沃年科受到了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的接见,而且通过他在两天后接到了毛泽东给苏联领导人的书面答复^②。

契尔沃年科8月8日的类似请求得到的却完全是另外的结果。一开始,大使不得不就将要举行的会晤的内容作出答复,并解释说,莫斯科责成他将信件转交给毛泽东,并建议在莫斯科会议前举行中共和苏共代表团的会晤。其后,是三天的沉默,只是在8月11日,大使才被告知,就这一问题陈毅可以接见他。尽管契尔沃年科提及苏联方面希望尽可能早的得到回答,但回信直到9月3日

^① 毛泽东1959年10月14日与安东诺夫谈话纪要,ЛНЦЛ.Ф.5,ОП.49,Л.235,Л.81—94。

^② 契尔沃年科1960年1月13日与伍修权谈话纪要,ЛНЦЛ.Ф.5,ОП.49,Л.327,Л.22。

才由彭真递交。信中表述了对邀请的感谢,并表示准备在9月中旬派代表团去莫斯科^①。

中国在这方面对苏联方面也有要求。8月初,陈毅表示遗憾说,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刘晓处境极为艰难,他和契尔沃年科不同,契尔沃年科有可能和中国的最重要的人士打交道,而刘晓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接触^②。苏联外交部从公务角度对这一抱怨作出了反应,写了一份专门的情况通报给苏共中央。通报中断言,刘晓得到一切必需的帮助和苏联外交官的协助,而他从未表示要和苏联高层领导会晤的任何积极性^③。我们掌握的文件不能单方面证实或否定这一说法,但是,它大概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苏联外交官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状况和他们的这些国家的同事在苏联的状况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苏联的大使们拥有一种特殊的地位,这种地位使他们能够即使不去干涉所在国家的政策的话,那至少其行事也相当独立于这些国家的最重要的人士。这也不排除陈毅的讲话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中国大使应在莫斯科享有较之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大使们更大的权利。

而这时分歧的主要的、决定一切的力量无疑是两国领导人——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关系。斯大林死后,世界无产阶级领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理论家的位置还空缺着。尽管赫鲁晓夫是世界上一个共产主义大国的领导人(顺便说一下,这在中国也不否认),但这全然不是说他就能自动得到个人领导者的地位。还在50年代中期,这位苏联领导人就得到暗示,在中国并不准备把他说过的一切当作终极真理。在斯大林执政的年代,人们已经习惯于

① 契尔沃年科1960年9月4日与彭真谈话纪要,ЦХСЛ.Ф.5,ОП.49,Л.327,Л.215。

② 苏联外交部致苏共中央关于对苏联驻华大使和中国驻苏大使态度的报告,ЦХСЛ.Ф.5,ОП.49,Л.327,Л.247。

③ 同上。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对苏联领导人的一切行动都表示完全的赞同，而在苏共二十大后不久就惊奇地发现，“中共中央在对斯大林作用的评价问题上一开始就不完全和苏共中央意见一致”^①。毛泽东还在其他许多问题上，包括在共产主义世界里规定事先要和苏联商量这一问题上表现出独立性。“百花齐放”、“大跃进”、1958年台湾危机、在边界上和印度的武装冲突——中国领导的所有这些和其他的一些行动事先都没有通报苏联，这无论如何也不能使赫鲁晓夫满意，并且立即把他置于一种尴尬的地位：西方继续认为中国以及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处在苏联的强硬控制之下，中国实施其所有的行动都是和苏联协调过的^②。

毛泽东对中国领导人意识形态的优越和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作出贡献的追求使赫鲁晓夫特别的不快。还在不久以前，只有苏联领导人才有创造性发展这一理论的权利，因而在中国所不断鼓吹的毛泽东创造了新的“中国式的或亚洲式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在莫斯科引起了难以抑制的愤怒，但不知为什么却将这种愤怒伪装了起来。在1956年底的中共八大上，苏联代表团团长米高扬不得不对中国人关于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的声明作出反应。苏联代表团团长找到了摆脱这种情况的出路：在谈到中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成就时，他立即指出，所有这一切都是列宁早就预见到的。这似乎是在暗示中共没有对这一理论的实质作出任何新的贡献^③。

一年后，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重又出现了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坚决反对所提出来的一种说法，即苏共二十大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中共和其他共产党只是

① 苏联驻华使馆1956年工作报告，ЦХСЛ. Ф. 5, ОП. 28, Л. 409, Л. 107。

② 苏联驻华使馆1959年工作报告，ЦХСЛ. Ф. 5, ОП. 49, Л. 240, Л. 95。

③ 苏联驻华使馆关于中国舆论对中共八大的反应，ЦХСЛ. Ф. 5, ОП. 28, Л. 485, Л. 44。

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代表团声明,这种说法实际上意味着,除了苏联共产党,其他的党都没有发展理论的才能。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争论后,毛泽东还是同意保留苏联的说法,其主要原因正如后来中共所说的是以此来表示对赫鲁晓夫的支持,当时赫鲁晓夫刚刚结束了和苏联领导中“反党集团”的艰难斗争^①。

1960年初,中国越来越经常地开始谈论毛泽东的新思想,遵循这些思想的这个国家正在沿着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前进。与此同时,关于苏联和苏共在创造性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作用的说法开始消失。在中国对苏共中央十二月全会的反映中第一次没有了必须研究苏联经验的话^②。

在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中国广泛和隆重进行的对列宁诞辰90周年的庆祝。在中国各地都召开了群众大会和各种集会,组织了一系列电台转播,出版了纪念诞辰的小册子和一套特种邮票。在北京召开了隆重的大会,许多党政领导人出席了会议。但是,在所有这些庆祝活动中,近几年已经习惯的关于苏共在发展马列主义理论方面的贡献的话不知为什么消失不见了,一次也没有提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O·B·库西宁在克里姆林宫的类似隆重大会上的讲话。直到4月27日才在《人民日报》的第6版上刊登了《真理报》4月22日社论的简短摘要,并且删去了谈及苏共对理论的贡献和在苏联的实践中实现了列宁的思想等所有文字。

中国领导人甚至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不应当把某个党的决议作为制订属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件的基础。正如邓小平不无讽刺地说:“如果我们把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二

^① 米高扬和科兹洛夫……会谈纪要,АИРФ. Ф. 3, ОП. 65, л. 610, п. 6。邓小平还提醒苏联同志说,如果毛泽东当时支持赫鲁晓夫和“反党集团”作斗争的话,那这位苏联领导人就敢于对失势的高岗和彭德怀讲支持的话。

^② 苏联驻华使馆关于在中国对1959年苏共十二月全会的反应,ЛХСЛ. Ф. 5, ОП. 49, л. 327, л. 13。

十三大,二十四大以及其他代表大会的决议写进国际的文件,结果会怎样呢?这只能证明我们缺少兄弟党之间的平等”^①。

赫鲁晓夫对中共政策和毛泽东本人的长期隐藏的愤怒终于在1960年7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爆发了出来。如果在布加勒斯特的讲话中,这位苏联领导人还不得不遵守一定的规矩的话,那他在自己党的官员和积极分子面前就一任感情的迸发了。在赫鲁晓夫看来,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我要说,现在在中国具有了广泛的,危险的形式。在那里,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毛泽东同志每句话都被抬高到了永远正确的绝对真理的程度。他的每一个指示都被当成了法律”^②。而在谈到毛泽东讲话的不容反驳时,赫鲁晓夫说他本人不怀疑这一点,他把毛泽东和斯大林作比较,对毛泽东说了一句独出心裁的恭维话:“我看毛泽东,就像瞧见了斯大林,一个模子出来的”,他还进一步说:“自然,斯大林在所有的方面都要站得比毛泽东高得无法相比”^③。

在意识形态对抗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当然不可能越过毛泽东的理论活动。他以公开挖苦的语气评论了毛泽东为了从事理论问题的研究离开中国领导人岗位的决定。赫鲁晓夫从克里姆林宫的讲坛上说:“我不知道别人怎样,但我觉得奇怪,一个人竟自己宣布自己是世界理论家,甚至都没有想过那些他想以自己的理论新发明来使其‘幸福’的人们是否接受这一点”^④。赫鲁晓夫把这一切称之为“胡说八道”,公开暗示,他绝不会认为毛泽东是有责任对马列主义作出某种创造性发展的人。

① 米高扬和科兹洛夫……会谈纪要,АПЛФ. Ф. 3, ОП. 65, Л. 610, Л. 116—117。

② 赫鲁晓夫在1960年7月16日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ЦХСЛ. Ф. 2, ОП. 1, Л. 476, Л. 197。

③ 同上,在全会上,赫鲁晓夫的讲话要尖锐得多,他声称,斯大林是比毛泽东“更聪明和更有教养的人”,但后来他在加工自己的讲话时,使这种说法不那么刺耳了。ЦХСЛ. Ф. 2, ОП. 1, Л. 476. П. 198。

④ 同上,第199页。

中国领导人对苏联领导人的反应是对等的,但比较谨慎,而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含糊不清的。邓小平在1960年不止一次地提到,中国人在1957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过程中与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一起工作是如何的好和富于成果,当时中苏两国同志间完全开诚布公,无所不谈^①。然而,这些回忆又是和讨论当时出现的分歧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些话中不难看出与赫鲁晓夫行为的相对立,不但如此,邓小平还谈到了历史事件是既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也不以某些集团或党派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自然会对某种观点或看法作出结论——它们是否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②。

在北京的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上,刘长胜公开声称,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不可能想象“所谓的没有战争和没有武器的世界”。尽管这只是中国关于这一问题的立场的一种解释,但是这一说法明显是直接反对赫鲁晓夫的,因为他刚刚出版了他的题名为《没有武器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的讲话集。

但是,只是在莫斯科会议上,中国代表才有可能相当公开地不仅讲述了有关争论的问题,而且讲述了自己对苏联领导人言论和活动的态度。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在和米高扬与科兹洛夫会见时尤其直言不讳,这次会见是根据苏联领导的建议在11月26日会议工作结束前不久举行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对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和莫斯科会议上的发言,以及这位苏联领导人在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工作期间的讲话作了极其尖锐的反应。除了指责苏联的批评没有证据外,中国共产党人还暗示,他们认为正是赫鲁晓夫要对莫斯科会议变成了指责中共的有计划行动负责。中国代表断言,莫斯科会议上的气氛是不正常的,“如果其他党遭到这样的攻

^① 邓小平1960年9月12日和契尔沃年科谈话纪要,ИХСЦЛ. Ф. 5, ОП. 49, Л. 327, Л. 256。

^② 同上,第257页。

击,他们未必经受得住”^①。

在和中国共产党人会谈时,米高扬和科兹洛夫自然不可能绕过这一尖锐的问题,尤其是中共代表团的成员试图让其他的苏联领导人来反对赫鲁晓夫。科兹洛夫对中国的对话者声明说,这些企图是和中共渴望友谊和团结的言论不相容的。他继续说:“我们不止一次地说过,赫鲁晓夫是苏共和苏联人民公认的领导人,他的发言和讲话反映了我们党及其领导的权威意见。我们呼吁你们放弃类似的行动”^②。米高扬承认,中国对苏联领导人个人的批评得罪了苏共中央的所有委员,并坦然声称,苏联方面本可以采取类似的行动,但苏联共产党人不允许在自己的讲话和文件中对毛泽东和刘少奇进行个人攻击^③。与其同时,为了在某种程度上消除赫鲁晓夫的行动和讲话所造成的印象,这两位苏联领导人还解释说,他在会议上的讲话是建设性的,其中没有直接批评中共,尽管列举了中共的错误观点。

尽管存在严重的分歧,在莫斯科会议上还是得以避免了共产主义世界的分裂。起草会议声明的起草委员会用了约1个月的时间终于达成了正如会议参加者所说的95%的一致同意^④。中国代表团坚持除了提到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的话(在其决议中可以找到中国共产党人最不能接受的表述),还要从声明中去掉有关宗派活动和民族共产主义的段落,认为这些段落是直接反对中共的。俄国共产党人也作出解释说,有关宗派活动的一段应当看成是对所有的党,包括苏共的警告,而对民族共产主义的指责是指的南斯拉夫。在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大量的编辑修改后,这些段落被写进了声明中,但是说法要缓和得多了。

① 米高扬和科兹洛夫……谈话纪要,АПРФ. Ф. 3, ОП. 65, Л. 610, Л. 113。

② 同上,第119页。

③ 同上,第120页。

④ 同上,第112页。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利用已经在布加勒斯特得到赞同的方法——在会议代表团中间散发了一封专门的信件，来向其他党介绍分歧的实质（自然，是莫斯科的看法）。所以赫鲁晓夫11月10日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在很多方面是相当克制的（苏共的代表们也承认这一点）^①，而邓小平的讲话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看上去就像是和在这封信里阐述的那些原理进行论战。

必须指出，在共产主义世界人数众多的代表大会上，弄清两个最大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的做法无论给哪个党也决不会增添威信。何况，在论战的火气中双方立即离开了理论的争论，并开始相互向对方提出各自的要求，而这些要求离讨论的实质已经相当远了。苏联领导人突然想起，刘少奇还在1945年就说过毛泽东“得以顺利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其艰难的工作”，这表明还在国民党时代的中国“毛的个人崇拜”就萌芽了。邓小平也对会议的参加者谈到了赫鲁晓夫在1958年对毛泽东提出的建立联合舰队的错误的建议。重提这个在苏联正在努力忘却的往事引起了苏联领导的严重不满^②。

会议的结果双方只是暂时得以调整了有争论的问题，并呼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优秀的理论家来解决这些问题。问世的声明是相当调和的，其中的一些段落中共和苏共都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在不放弃原则”的情况下来加以利用。与此同时，展现在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们面前的这场争论也不由自主地将那些一直站在一旁或者只是对争论道听途说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员拖进了对抗的轨道。

然而，重要得多的问题是，愈益尖锐的苏中矛盾破坏了共产主义世界的统一和团结，有利于公开担心两个共产主义巨人结盟的

① 同上，第112页。

② 同上，第112页。

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和苏联都理解这一点，因而暂时都不想把事情做绝。在会议的发言中，两党的代表都表示相信所有的误会都将消除，而中苏间的团结将恢复和巩固^①。会议上达成的相互妥协（尽管中方作出的让步更大些，使得共产党人们寄希望于此。

在1961年的上半年，这种希望一直保持着，当时两党努力哪怕是在对外关系上也要在莫斯科声明的框架里行动。苏联对莫斯科不同意的中共政策的那些领域避之以沉默。中国在这一时期也“没有发表一篇触及争论问题的文章”^②。然而，还在1961年的夏天，分歧就又表面化了（对此，每一方都归罪于对方）。1960年11月，本来可以弥补的共产主义世界的裂缝，在不愿作出更大让步的两国领导人的傲慢和政治虚荣心的影响下开始迅速扩大。

① 刘少奇像是要证实这种情况，刘少奇同意了苏联领导人的劝告，在会议结束后到苏联各地进行了访问，苏联的报刊对这次访问作了极其广泛的报道。

② 邓小平1961年3月1日和契尔年科的谈话纪要，АПРФ. Ф. 3. Оп. 65, л. 620, л. 2—3。

新 书 选 介

《周恩来传》(1898—1976):该书由金冲及担任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它运用翔实可靠的资料,记述了周恩来光辉而艰难的一生,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世纪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真实进程。该书分新中国成立前和成立后两部分。前一部分反映了周恩来从青少年时期到投身革命参与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丰富多彩的人生历程;后一部分反映了周恩来作为开国总理,为建设一个新中国所走过的艰辛路程。全书150余万字,1998年2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周恩来旅日日记》:本书是周恩来旅日期间近一年的真实记录。它既记录了周恩来在日求学、读书、报考大专以及交友、参加社会活动等方面的情况,也记录了他的情绪和思想方面的变化,为周恩来早期思想与实践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全书12万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

《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该书收录了周恩来和邓颖超1938年至1971年间的通信73封。这些通信披露了两人共同生活和工作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也首次向世人展现了他们的爱情故事和精神世界,并为深入学习、研究他们的革命理想和高尚情操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全书8万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

《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西花厅工作人员的回忆》:本书是建国初期至周恩来逝世期间曾经在西花厅周总理办公室工作过的秘书、警卫、医生、护士和其他行政工作人员的回忆集。这些回忆,记下了周总理对他们的言传身教以及他们在周总理身边的所见所闻,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周总理的爱戴、敬重和怀念。它们绝大部分

是首次发表,其中不少鲜为人知。全书54万字,1998年2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周恩来与北京》:该书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回忆集。这些回忆,从作者们亲历的角度,记述了周恩来关心首都的建设,为北京的发展所做的大量工作。书中许多情节都是前所未闻的,其中张治中、卫立煌、梅兰芳等的回忆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全书36万字,1998年2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周恩来与将帅》:本书以丰富翔实的史料,记述了周恩来在抗美援朝、炮击金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以及“文化大革命”等重大事件中与共和国元帅、将军们之间的情同手足,生死相依的深情厚谊,展现了周恩来为着共同的理想和事业团结战友、携手并肩、努力奋斗的高尚情怀以及赢得战友拥戴和尊敬的真正魅力。全书30万字,1998年1月将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位保健医生的回忆》:本书是一本回忆周恩来生命历程最后10年的回忆录。作者,张佐良,为周恩来的保健医生。本书分三篇:上篇“来到周恩来身边”,讲述了作者成为保健医生并来到总理身边的经过;中篇“风风雨雨西花厅”,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浓缩在中南海西花厅;下篇“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记述了周恩来被确诊患有癌症直到逝世的日子。全书30万字,1998年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阴谋充分暴露,毛泽东及时识破并给予了打击。该书作者作为亲历者,根据当时记下的资料,把跟随毛泽东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后的活动以及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经过记录下来,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全书12.5万字,1997年11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六十五辑

作者 =

页数 = 2 1 2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